

目 录

哦，山茶花！（代序）	《山茶花》编委会	4
霍口油茶场历史沿革	王金康	6
林月婵——霍口场的骄傲	霍青	9
霍口场英雄谱	林涵	13
霍口场人，好样的！	霍知	21
我的简历	蒋楨	33
在战火中成长	张利清	35
我们有颗火热的心	沿山行	40
军工足迹	林有庄 高娟娟	50
痛苦的记忆	刘树业	55
辛苦的运输队	许如基	58
知青与桥牌的故事	邹海秋 张亚淦	60
一场生命的接力	赵振华	67
逮鸭记	赵庆森	70
踏遍青山	陈浩胜	73
我为围垦出过力	陈行焘	78
我这六十年	张亚淦	81
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队	陈宝霞	87
怀念几位“先睡”的友人	意戈	91
罗溪琐记	高荣光	99

难忘徐重·····	二指禅	104
夜闻虎啸·····	陈永健	111
不寻常的外科手术·····	陈行焘	113
我成了一名知青·····	孙朝和	115
回忆好友林发仪·····	孙天臈	119
借用的日子·····	林 涵	122
百里骑行归家记·····	高荣光	128
老赵二三事·····	张亚淦 孙朝和	131
回眸霍口场·····	黄 听	136
路遇“嫌疑人”·····	杨典炜 卓本文	137
搏击风浪·····	许 琛	139
珍贵的回忆·····	彭潭安	141
我这一路·····	孙朝和	151
忆朱山·····	鸣 虹	153
蟒宴记·····	陈永健	156
往事几则·····	高士中	158
我的两次患病经历·····	谢劫生	163
天然的大学校·····	许如基	166
警惕的目光·····	刘兆驹	169
扛管琐记·····	林有庄	172
诗词几首忆当年·····	戈 宁	174
捕蛇记·····	壮 壮	180

在罗溪的一二事·····	孙天幢	182
火的考验·····	罗文	185
难忘 1963·····	彭潭安	188
福州，我回来了·····	壮壮老太婆	192
从霍口到三尺讲台·····	高士中	196
我们村的福州知青·····	万宜钦	201
词二首·····	章影	206
《岁月如歌》节选·····	翁爱诚	208
知青林碑文·····	原霍口场全体知青	209
碑文评说·····	林涵	210
知青之家碑文·····	原霍口场全体知青	211
知青之家展厅前言·····	原霍口场全体知青	213
山茶花，藏在知青心里的花（歌曲）·····	刘与文	215
后记·····	《山茶花》编委会	217
附件：原福州霍口油茶场知青上山六十周年活动捐款名单		218
艺术珍品选·····	刘与文 杨典炜	

哦，山茶花！（代序）

一群老人，为了筹备上山下乡六十周年的日子，做了一件让人有点吃惊的事，自己集资，自己创作，自己编印，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山茶花》。六十年前，在油茶场徐重工区，几位业余文青办了一个墙报周刊，也叫《山茶花》。两“花”一脉相承，都是知青写自己的故事。当然，这本《山茶花》无论在作者代表性、题材广泛性、形式多样性还是制作精良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山茶就是油茶，但知青们说到她的花时，却对“山茶花”情有独钟。这本《山茶花》，收编了三十三位作者、五十五篇的故事、回忆、趣闻、轶事、诗歌，还有百多帧历史照片……内容丰富多彩、五光十色。书中：有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模范人物的《林月婵——霍口场的骄傲》；有虽只是指上小小技艺，没承想成就问鼎之功的《知青和桥牌的故事》；有缅怀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的知青妹的《痛苦的回忆》；有赞颂兄弟情谊，抢救烫伤小伙子的《一场生命的接力》；有皮开肉绽，强忍无麻手术和屈辱的《不寻常的外科手术》；有农转军工，享受人的尊严和幸福的《军工足迹》；有小番鸭变飞天鹅，围堵截物归原主的《逮鸭记》；有骑单车百里旅游，沐秋风逍遥自在的《百里骑行归家记》……真可谓：秉浩然之正气，取天地之精华，集生活之点滴，呈世人以评判。

山茶花貌不出众，香不袭人。姹紫嫣红，不见她寻常的面容；名

贵花卉，难觅她卑微的身影。她和知青一样，同属“草根阶层”，奉献多，索取少。油茶一生不需浇水施肥除虫松土，照常开花结果。坊间有句老话，一朵花三滴油。有经验的老农从山茶花开放的情况，就能预测油茶的收成好坏。上一年山茶花开烂漫，来年山野里便到处是寻珍觅宝的人群。人们把琥珀色的油茶果装入篓中，送往晒场。这时候尘封了一年的油作坊开榨了，轻烟袅袅，油香四溢。过年回家时，知青带一两斤茶油是当时最奢侈的礼品。用茶油烹调一桌美食犒劳自己和家人，是山茶花特别的馈赠。

《山茶花》不是鸿篇巨制，但会是霍口知青重要的书本之一。有了《山茶花》，往事并不如烟，也许你辛苦操劳了一生，也许你命运多舛如梦幻，也许你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论怎样，你现在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大部分的精力和生命都已献给我们平凡的事业。《山茶花》可以作证。

《山茶花》编委会

霍口油茶场历史沿革

王金康

福州市霍口油茶场，1957年12月由省粮食厅创办，主要为解决福州市食用油不足的问题，规划占地3万多亩，以种植油茶为主。1959年9月至1961年8月转归罗源县粮食局主管。1962年1至7月由福州市公安局8科主管，后因战备需要转移撤离。同年7月移交福州市农场管理局（即后来的农垦局）经营，在场人员50余人。1963年3月与9月，霍口场先后安置了两批来自福州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此，全场员工达360余人。

霍口油茶场位于罗源县西部山区，距离福州百来公里，场部设在罗汉洋，下设罗汉洋、船头、仙洋、徐重、后洋、罗溪、牛垵湾、朱山等工区，工区分布在方圆十几里的地域内。油茶场以油茶种植为主业，有8000余亩油茶油桐林地，兼植茶叶、果树等作物。劳动工具是原始的锄头、砍刀、扁担，及箩筐等，没有机械作业。

1965年场长肖锦华带领部分骨干往福州筹办寿山果牧场。同年底，有18人调往三线军工单位宁化县省建设机器厂。1967年又有一批人调往福州八一拖拉机厂。1970年因罗源县划为宁德地区管辖，霍口场遂改属罗源县林业局主管，更名为罗源县霍口油茶林场，从垦复油茶林转为营造杉、松林，并上报要求改农垦企业为林业事业体制，



场 部



场部一队



船头工区



仙洋工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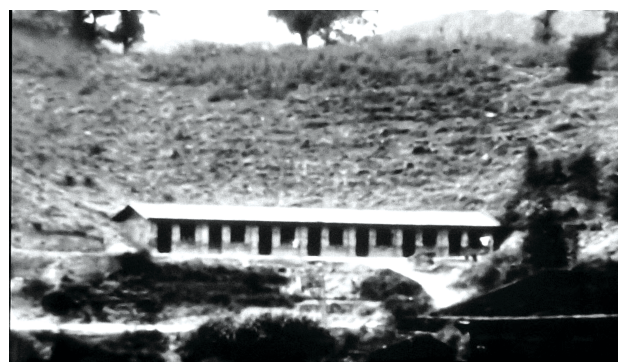


罗溪工区



徐重工区

未得批准。不久改归县农业局主管。随后罗源县又划归福州市，霍口场成为罗源县农业局（块块），与福州市农垦局（条条）双重管辖。1971年后罗源县多批次调（含借调）场里员工到县造纸厂，车队，



后洋工区

银行，粮站、供销社、商业局、剧团、百丈水电站、松山围垦工地，及茶叶系统等单位工作。文革期间，员工不断上访，要求返城，省市县三级也多次派调查组进场了解情况。1984年8月，上级有关部门终于决定关停并转霍口场，人员转场。霍口场一分为二，归县林业局和农业局管辖。除留下少量人员，72名老员工调往福州红庙岭、恩顶、优山及市农垦总公司等农垦系统管辖的单位，直至退休。



林月婵——霍口场的骄傲

霍 青

1963年9月，福州女中高中毕业生。19岁的林月婵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来到罗源霍口油茶场，任团总支书记。

1965年底，调福州柑橘耕读学校，任团委书记。

1970—1973 被推荐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省市妇联任职。

1993年起，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区办主任兼扶贫办主任。

1997年，福建、宁夏（简称闽宁）两省区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建设一个对口扶贫移民示范区，这个地方被命名为“闽宁村”。2002年2月闽宁经济开发区设立闽宁镇。2003年7月，附近的玉海经济开发区并入，闽宁镇正式成立。闽宁镇辖1个社区，6个行政村。经过十几年两省区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2021年8月闽宁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2021年9月闽宁镇入选全国千强镇。林月婵是第一批到宁夏的福建扶贫干部的领头人，在闽宁镇十余年的扶贫工作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热播电视剧《山海情》中的福建省代表吴月娟主任就是以林月婵为原型。

2016年7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对林月婵有这样一段描述：福建闽宁办原常务副主任林月婵先后40多次来到宁夏，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修路架桥”，是名副其实的“闽宁使者”，是宁夏干部群

众念念不忘的“林大姐”。

2016年7月18日《宁夏日报》在题为《你的身影，是我心中最美的珍藏》的文章中这样描述林月婵：说起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就不能不提林月婵，这个名字多次出现在闽宁协作的大小事件里，被山区群众亲切地称为“闽宁友好使者”。

1997年3月，为使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开出成效，福建省派出先遣组赴宁夏考察。这支队伍里，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干练中透着南国妇女的贤淑温婉。她在贫困户的窑洞里嘘寒问暖，了解农民生活生产的真实情况，要求救助失学的儿童，她就是林月婵。

十几年里，林月婵每次赴宁，一下飞机总是直奔第一线，检查项目实施情况，给工作在那里的福建扶贫干部打气鼓劲，协调解决困难，走村串户摸底调研。多年来，她提交给福建省委、省政府翔实严谨的第一手资料，成为百多扶贫项目的重要决策依据。

为表彰她在闽宁对口扶贫工作中的突出贡献，2005年，林月婵被评为“感动宁夏十大人物”之一，获得特等奖。2004年10月至2007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聘任林月婵为自治区政府顾问。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简称）曾被联合国专家评价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地方，这里“天上无飞鸟，地里不长草。举目少人烟，风吹沙石跑”，是宁夏最贫困的地区。林月婵从1997年起直到退休，十余年主持闽宁对口扶贫工作，在西海固从“移民吊庄”到“坡改梯”工程，从“井窖建设”到“劳务输出”，从“菌草推广”到“招商引资”，从“联办医院”到“援建学校”，无不倾注了她的

心血。当地干部群众有事就找林月婵，她被称为“救火队长”。退休后，还在尽力为之奉献余热，关注着宁夏的建设与人民福祉。

二十几年来，林月婵当年在宁夏牵头成立的福建省企业家协会从最早的 13 人发展到现在有 80000 多人（含家属）在宁夏经商从业。2000 年闽商在宁夏投资不到 10 亿元，现在上升到 800 多亿，对接 5700 多家企业，每年解决当地 3 万多人就业，输送 4 万多宁夏贫困山区农民到福建从事劳务，每年有 11 亿元的收入。西海固的 GDP 增长了 21.3 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67 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11 倍，成为宁夏自治区增长最快的地区。昔日苍凉贫瘠的“戈壁荒滩”，如今已变成寸土寸金的“塞北金滩”。闽宁镇绿树成荫，马路宽敞整洁，水电，交通、商场、银行、学校、医院等配套齐全，农民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林月婵功不可没！

二十几年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林月婵及福建扶贫干部与宁夏同志们总结了保证工作成功的根本是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两省区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团结一致，一任接一任干，一年接一年抓。坚持不懈地深化“联席会议、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现在，闽宁对口协作，依然按照这个机制推进各项工作。

2004 年，世界扶贫大会在上海召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成果作为中国的范例材料，在会上发布，林月婵作为嘉宾出席了大会。

2021 年央视隆重举办“时代楷模”表彰大会，林月婵是闽宁扶贫协作“时代楷模群体”的领头人，是央视大会主持人第一个采访的对

象。

最近，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授予林月婵“八闽银发先锋”荣誉称号。

前些日子，我们探访了与病魔抗争中的老同事月婵，她笑着说：“霍口场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站，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在后来工作生活中，只要想起霍口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霍口场，我终生难忘！”

林月婵——我们霍口场的骄傲，向您致敬！



霍口场 英雄谱

林 涵

英雄得比照着看。近来刚好看了央视重播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该剧脍炙人口、赞誉如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片中叙述以周家三兄妹为代表的“光字片”典型人物近六十年的上下浮沉人世情怀。蓦然回首与我们霍口场人何其相似！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人物场景，细细追忆都如身临其境，而霍口场的人与事，情与怀相较于《人世间》绝不逊色，甚至更加精彩！

周家老大周秉义，建设兵团知青，通过不断进取，走上仕途之路。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官至省会城市的一把手，最后抱病退休。与之对应的是我场林月婵同志，凭借自身努力逐步升迁，当上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区办主任兼扶贫办主任，不仅是我省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也是闽宁协作扶贫的领军人物。她行为处事也与周秉义极为相似。秉义亲弟弟秉昆吃官司，单位领导人千里迢迢找到身为副市长的他，只要他出面说一句话，即可保住其弟公职，但直至弟弟被判刑入狱他始终不肯动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说情。记得十几年前，笔者有幸受霍口乡政府邀请，组织过一次场友与乡亲的恳谈会，想为第二故乡发展出谋献策，曾托联谊会成员胡敏美同志几次电请时任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参加，均被其婉言谢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与周秉义一样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深怕动情而公

权私用！

彼时林月婵正致力于中央号召的脱贫攻坚工作，扶真贫、真脱贫，牵头始创闽宁镇、创建了山海协作的对口扶贫先进模式。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阐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剧中著名演员姚晨扮演的“吴月娟”主任，原型即是林月婵。现在宁夏卫视每周轮番播放《纪录宁夏》栏目的“闽宁协作”专题，可以看到记者采访退休后的林月婵，她回忆道：“选在那个地方，就是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定的，他当时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月婵，我们是不是搞个试点，有了示范的点就能使更多没有生活生产条件的农民迁下来，搬下来……’”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闽宁村现已发展成为容纳6万多人口，街道整齐划一，交通四通八达，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齐全的漂亮小城镇！镜头中白发苍苍的林月婵在溪流旁凭栏北望，画外音“如今，林月婵依然惦念着宁夏的扶贫工作……”我以为，林月婵的政绩足以惠及后代，彪炳青史！

第二个典型的剧中人物是姚主任，他起点很高，一出场即是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转业后，历任某厅处长、副厅长等职，自己觉的升迁缓慢，仕途并不顺畅，但他始终未脱离公职。在开放的香风中，他未能守住底线，触犯了党纪国法。他人脉广泛，游走于政商两界，很吃得开。与之对应的是霍口场蒋桢同志，起点倒是较姚主任低得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油茶场普通员工，文革之中人生转折，从此叱咤风云，成为我场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离场后，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南湖宾馆，那时他已是省旅游局的中层干部。之

后，又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时是在《福州晚报》上，报纸刊登的一篇《北方飞来了吉祥鸟》文章，介绍说北方集团副总裁蒋桢大校长期军旅生活练就了坚毅的性格……我鄂然了，而后也就释然了。改革开放的事，谁也意料不到！蒋桢不仅在政界、商界，甚至军界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他的身份也经常变化，一会儿是某集团总裁，一会儿是省政府某办主任，一会儿又是东南亚某国中将顾问，却都是真实的。他率领北方集团把军工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各国，为我国军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退休后的路也比剧中姚主任精彩得多，姚主任年老退休，在反腐的高压下，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向组织自首。我们蒋桢兄弟全家移居香港，退而不休，至今仍是香江的风云人物。

第三个，周家老二周蓉。是一个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前夫是她崇拜追求的“右派”诗人冯化成，后夫是始终追求她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周蓉瞒着父母兄弟追随前夫到贵州山区插队落户，创办单人小学。后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又攻读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定格在某高校副教授职位上。这三人是剧中文教界人物的代表，我场对应人物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黄听离场后，任罗源县闽剧团团长，回榕后当上福州市著名小百花艺术团指导，在音乐专业上有很高造诣。曾任福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士中，出身名门，自学成材，当上小学英语高级教师，参加英语教材编写，还获得福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孙攸生厦大毕业后，曾任罗源西兰中学教员，回榕后任福州杨桥中学教务主任。刘与文，聪慧过

人，曾被调到罗源县参加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文艺队转型为闽剧团，任剧团团委会成员负责剧团乐队和编曲。1978、1979两年均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调到铁路福州火车站工会工作后，多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并当上了站工会副主席。他的书画和篆刻都颇有造诣。郑德麟调省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工作，被评为“建校模范”，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62届世界图联大会，是省高校情报工作委员会会员，成绩傲人。还有柳珍妮、顾同清、林有庄等，他们均和剧中人物一样，在文学艺术、教书育人方面有所建树。

第四比，周家老三周秉昆。他是《人世间》中男一号。属于多子女上山下乡可留一人的留家人员。哥哥姐姐上山下乡了，他毅然承担起整个周家的生活重担，替哥姐尽孝、为父母送终。他的一生充满正气和担当，冒风险帮助并不认识的骆士宾，给死刑犯老婆郑娟送钱送物，替骆士宾认了是郑娟私生子的身生父亲。当骆士宾入狱后，他变卖祖传玉镯，毅然承担起郑娟孤儿寡母盲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最终与郑娟结为夫妻。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与发小兄弟结成“六君子”，在工作生活中相互扶持、相互帮衬、共渡难关，真诚地帮助身边每一个有困难的人……我很难找到一个霍口场的具体人物与之比较，但我觉得我们联谊会集体与之有得一比！从联谊会已故负责人胡宝铭、毛文标、林发仪、翁爱诚、刘祥荣、王连陞、孔永生、陈和生、陈国瑞的身上，可以找到周秉昆的影子。他们为人排忧解难，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死而后已！联谊会现任

负责人孙朝和处人办事与周秉昆颇为相似，深得老干部喜欢。剧中马院长曲书记夫妇病痛时得到周秉昆无私帮助，真心地喜欢他，与他结为忘年交；文革时期下放到霍口场的老干部马承岱，受过孙朝和的细心照料，也与之结成忘年交。已97岁高龄的原副省长、省政协主席游德馨至今仍与孙朝和经常联系，通过他关心霍口场人，还为我们纪念上山六十周年活动立碑题写了碑名并捐款10000元。孙朝和为寻找历届场领导以及离场后失散多年的场友们，费尽心血，四处奔波，北上南下，细查细询，尽可能地让大家一个不漏地聚齐。其认真执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动！联谊会每一个成员如孙明沁、高士中、胡敏美、陈敦良、陈必贞、陈明金、陈浩胜、王金康、王健生、林海、林涵、危孝宝、陈宝霞等也都在尽心尽力地为全场兄弟姐妹服务。我们有些困难职工，回榕后无家可归，联谊会同志找门路、想办法帮他们住进福州市首批廉租房。联谊会每年组织一次全场职工聚会活动，逢五逢十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平时求医寻药，探病问苦，尽可能地为大家排忧解难。

此外还有许多热心人如：郑双梯、危孝宝时常自掏腰包，邀请场友回场凭吊遗迹、怀念战友。许如基每次活动，都义务为大家拍照录像。赵振华至今仍组织场友外出旅游，尽力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虽然做的都是琐事小事，但一件件一桩桩都闪耀着真情光芒！可以说我们的所做所为与周秉昆比较毫不逊色。

最后说的是《人世间》中的“六君子”，是“光字片”芸芸众生小人物的代表。他们与我们大多数的场友一样，被动又无奈地在工作

中拼搏，在生活中沉浮，在苦难中成长。即使是在动荡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善良底色！“六君子”除吕百川考上大学，深造后进入党政部门，其余的都没有太大的建树。可是霍口场人不一样，我们活的比他们更精彩！在艰苦动荡的生活和工作中，时不时还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光彩夺目。桥牌，原是上层人士的娱乐。文革后期，由霍口场职工邹海秋组织指导的林孔森、王石宁、邹海秋、官希宣、陈长金、刘一敏、黄礼坦等组成的知青桥牌代表队冲出罗源、杀出福州，参加全省桥牌大赛，荣获冠军。其中林孔森、王石宁进军全国联赛，取得双人赛东西组第二名的好成绩。林孔森与另一福州人组对成为第一个全国男子桥牌双人赛冠军。林孔森被国家体委授予“中国桥牌终身大师”，王石宁被授予“中国桥牌大师”。危孝宝，辞职后回乡自主创业，白手起家，历经磨难，创立了福州美食著名品牌“孝宝酱鸭”，深受百姓喜爱；陈必显，我场最年轻职工，勤学苦练武术，硬打出一个“福州市演武大会冠军”的桂冠来，还三次获得全市宗鹤拳表演一等奖。蒋亨达，上山后自学医疗，手中经常带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为当地农民无偿医病，是我场的土医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达哥”。退休后移居北峰山区，现已八十多岁高龄，仍为缺医少药的农民开药治病，深受欢迎。黄雅贞，借用罗源县人行。她仅凭在工区当过二年多事务长的财会经历，通过勤学苦练，一年后竟能在县人行会计专业三项比赛中获二项第一名，又在宁德地区比赛中获一项第一名，从而轰动全县。调马尾工行后，先做会计综合，后任工会副主席，还兼任多项工作，干一事，精一事，成一事。她边干边学，考取经济师职称。

后调市工行房地产公司任财务部经理，又调入拥有 1300 多名编外员工的市工行定诚公司任财务部经理，都干出突出成绩。荣凯中，水利监理工程师、经济师、中国水利学会会员，参加了援藏技术专家团；林淇，水工程管理工程师，闽江管理处书记、副主任，为整治福州河道沿岸脏乱差、绿化及治理闽江河水倒灌三大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亲切接见；范光盛，市林业局工程师，为第二故乡的林区建设，修路建桥做出重大贡献。张利清 1965 年应征入伍。半年后，进入越南前线，成为援越抗美的勇敢战士。他所在连队同心协力浴血奋战，两次击落、击伤美战斗机各一架，无人机一架，因而两次受到中央军委嘉奖，获记两次集体二等功。张利清火线入党，当上班长，五年來受五次嘉奖，並荣获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签发的援越抗美证书和勋章。他是我场直接与美军正面交锋入死出生而荣归的战斗英雄！叶启荣 1969 年参军入伍，表现突出，入团入党当班长，受到部队十次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我们有二十多名场友挤身于国家公务员行列，当上科级以上干部。还时不时地冒出几个“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文明优质服务标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来。当然，难免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人与事：因文革迫害，被示众游街者有之；因积劳成疾，长期与病痛斗争者有之；因经受不住煎熬，死于非命者有之；因生活所迫，出洋谋生者也有之。但这都不是我们的错，是历史的误会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霍口场的英雄！

霍口场人的生活，虽岁月蹉跎，却精彩频至。社会百业、人生百

态应有尽有。最终不论精英翘楚也好、芸芸大众也罢，都要渐渐地在人群中消失，走向永恒。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前者、无愧于今者、也无愧于后者！

时值纪念上山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场因国家水利建设需要，将永远沉入湖底变成水库！我们尚在人世的二百余名场友均已达耄耋之年，在霍口场遗迹湖畔植树造林、立碑勒石，既为纪念自己，也为激励后英！兴许有些人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并不理解，以为是无鲜花无掌声无喝彩被遗忘的一代人。别介意，无鲜花我们自己植树献花，无掌声我们自己撰文呐喊，无喝彩我们自己勒石喝彩！正如碑文所叙：我们的虬根深扎于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末梢向广袤的天空延伸，长留天地间、闻听八达外！

霍口场人，好样的！

霍 知

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霍口深山曾经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福州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学历，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勤奋好学。从踏上油茶场这人生旅途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而知识只有靠努力学习方能获得。

多年来，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并且学出了名堂来。

1964年3月，福建函授广播学校（省电大前身）罗源分校来我场



招收高中语文函授学员，报名学习的有 50 人左右。函授学习原定学制三年，文革开始，学业中断。学员们虽未能结业，但多多少少学了点东西。有的学员从此养成勤于学习的良好习惯，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能不断钻研精益求精。

学员范光盛，1965 年起边学边干，参加了霍口、飞竹周边路桥的设计和修建。1985 年经南平林业干部学校两年培训，后评为福州林业局工程师。

学员王石宁，离开霍口场后开始创业。他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摸爬滚打，历尽千辛万苦，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战斗力，终于完成了从小商贩到企业家的华丽转身，成为港台投资商争相竞聘的合伙人。

学员陈增官，参军入伍不久就被提拔为文化干事，退伍转业后任福州某化工店负责人。

1964 年 4 月，福建农学院开办函授教育。刘兆驹、黄承东、翁尧坤、陈宝霞、谢劫生、林海、薛聿彰、郑琿、林琴等人参加植保、果蔬栽培及农学专业学习，学制三年，每学期到福州参加面授和考试，时间为半个月。文革开始，学业中断。1984 年经福建农学院组织复习考试获得大专文凭。

此外，有几位优秀知青先后被推荐上了大中专学校。

孙攸生 1965—1970 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林月婵 1970—1973 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

梁婉贞 1971—1975 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张训清 1966 年福建机电学校毕业，获中专文凭。

陈祥忠 1966 年南平师范学校毕业，获中专文凭。

林昌明 1966 年南平师范学校毕业，获中专文凭。

张利清 1972 年湖北江汉石油学院地球物探专业毕业，获中专文凭。



魏金水 1976 年宁德财经干部学校毕业，获中专文凭。

1979 年 2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霍口知青踊跃报名参加学习。

邹海秋 1982 年取得电大电子专业大专文凭，1984 年评为经济师。

林涵 1984 年获电大中文大专文凭。

黄听 1985 年获电大中文大专文凭。

王祖贞 1985 年获电大中文大专文凭。

张亚淦 1986 年获电大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经济师。

还有的知青通过组织选送或自学考试等形式，获得文凭，取得职

称。

林淇 1984 年获福建工程学院自动化工业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水工程管理工程师。

林祖渝 1986 年获福州大学金融统计专业大专文凭，后被评为会计师。

荣凯中 1988 年获福州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经济师、监理工程师，后又成为中国水利学会会员。

翁尧坤 1984 年又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自考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经济师。

刘兆驹 1987 年评为工程师。

陈宝霞 1987 年评为经济师。

郑 坤 1994 年评为统计师。

高士中 1989 年获福建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考教育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小学高级教师。

刘与文 1994 年获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治专业大专文凭，后评为政工师。

林有庄 1985 年获中等师范教育专业中专文凭，后评为小学一级教师。

林足展 1985 年获中等师范教育专业中专文凭，后评为会计师。

陈浩胜 1991 年获福建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企业管理专业中专文凭。

黄雅贞 1981 年获电大英语专业单科结业证书，后参加福建省首

次经济师“评改考”考试，获经济师职称。

洪挺秀 中专毕业，1984 评为工程师。

陈由贤 中专毕业，后评为工程师。

王重光 中专毕业，后评为助理工程师。

林海 1987 年评为助理统计师。

郑德麟 1990 年评为图书馆馆员。

许如基 1992 年评为二级技师。

谢劭生、黄承东、许琛、陈行焘、孙明沁等后来都考得助理会计师证书。

孙天幢获省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标准化人员资格证书。

.....

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只有勤奋才能达到胜利的高峰。霍口场人靠得就是这种励志奋发的精神！

有诗为证：

奋发励志不敢闲，

日日夜读寒窗前。

何惧漫漫荆棘路，

雄心攀顶苦亦甜。

偷师学艺 无师自通

艰苦的环境造就人。霍口场的蹉跎岁月培养了众多人才。伟大的

科学家爱迪生曾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的确，霍口场这个大熔炉淬炼了济济一堂有些天赋的人才。请看：

黄听 他在音乐方面特有天赋，会各种乐器，还善于写诗作词。1964年霍口场有8人代表罗源县参加闽侯地区文艺汇演，其中一个表演唱的词曲就是他创作的。那时，他才18岁。后来，霍口场演出的词曲多出自他的手。前几年《福州晚报》还发表了他创作的词曲，他是一名音乐家。

刘与文 绝顶聪明，多才多艺之人。1963年他才16岁，在“霍口大学”里耳濡目染，触类旁通，几年下来琴瑟书画无所不通。后来一发不可收，既会画画，又能谱曲，还悉心研究起篆刻。现在是福州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

林孔森 福建省桥牌第一高手。他率领霍口知青桥牌队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大赛好成绩。1983年与王石宁组对获宁波全国桥牌邀请赛双人赛东西组第二名。1985年在厦门全国桥牌大赛上林孔森与一福州牌手组对获双人赛第一名，成为桥牌第一个全国男子双人赛冠军，载入中国桥牌史册。1996年林孔森被国家体委授于中国桥牌终身大师称号，王石宁被授于中国桥牌大师称号。

陈必显 身轻如燕，苦练武术，曾荣获福州市演武大会冠军，三次获全市宗鹤拳表演一等奖，功夫了得！

毛祚国 他特有表演天赋，18岁被福建电影制片厂录用，参演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一年后电影厂下马，他又回到二中续读。由他导演的场宣传队几个“草根演员”演出的独幕话剧《解放干部》在场部

演出时收到很好的效果，还让场长门长松淌下热泪。足见其导演功底了得！后来在许多职工要求下又重演了一场。他是霍口知青多次文艺演出的总导演。

李榕 利用文革中闲暇时光，在家观看邻居老裁缝做衣服。看着看着竟然学会了量体裁衣，在霍口场为几十个要参加县里演出的宣传队队员赶做了制服。后来调到永泰车队，也是看着师傅们修车，偷师学艺，从当配件采购到成为车队里技术最好的机修工，每天客车出场，都需要他把好这关键的一关，真是了不得！

高士中 从没接触过少先队工作，竟然一边教英语，一边当起师大附小总辅导员，还一干就是十年，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辅导员。作为诗词写作爱好者，他几年下来，写了近百首诗词。

蒋桢 学唱京剧第一人。天生一副好嗓子，他唱的高音比普通人高三度。同样是学样板戏，唱京剧，大家是唱“京歌”，唯独他京味十足，字正腔圆，当年在罗源县无人可及。他没有经过商，却在商界游刃有余，为省旅游局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主持国防工办系统“中国北方公司福建分公司”期间还筹款为经营困难的军工单位发放工资。真是奇才！

陈永健 凭着天生的鲁班之手，打造出的时尚家俬，让霍口场上上下下赞不绝口。他六十年代就会开汽车、推土机，在我们这代人里也是少有的。

柳珍妮 不但能歌善舞，演技出众，还具有一个“特异功能”：面对完全陌生的歌曲，她能一边看谱，一边看词，直接唱出来，一气呵

成，简直不可思议！

陈浩胜在霍口场缺理发师的情况下，大胆尝试，最终成了理发师傅，为罗溪、后洋工区兄弟们无偿服务。

危孝宝在名牌林立的福州饮食业，靠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的“孝宝酱鸭”成为福州著名美食品牌，深受百姓欢迎。

.....

泥沙俱散 金玉呈现

由于文革的原因，罗源人对霍口场的印象几乎全是负面的。1971年夏，由30名知青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带着十几个小节目进县城，三场演出引起一场大轰动。它让罗源人对霍口场有了新的认识。它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之后，罗源县多批次调动或借调近80名场里的员工到剧团、罗一中、公安局、农械厂、饮服公司、邮电局、电厂、汽车运输队、车辆管理所、供销社、木材公司、林业局、农业局、农机局、商业局、造纸厂、印刷厂、糖烟酒公司、鞋社、茶叶公司、粮食系统、百丈水电站、财政局、工商局、围垦、第一塑料厂、五金交电公司、人民银行、化纤厂和烟草公司等30个单位工作。出来的人都非常争气，因为他们知道机遇来之不易，而且还肩负改变罗源人对霍口场的成见“融雪化冰”的责任。

林涵，二十出头就在《福建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一报针》渐

露头角，被县林业局借用。后凭电教片《有个党支部，兰田迈大步》，引起县委注意，被调入县委党校、县委组织部，再以党建论文《试谈基督教的侵蚀及对策》，被中组部《组工信息》摘发，选派挂职锻炼后调入福州市委组织部，完成了人生道路逆转。县里干部很羡慕，说：“霍口场人，真有本事！”

孙朝和 凭着精明的生意头脑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多次上省到市为县化纤针织厂跑项目、筹资金、寻原料，为化纤厂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立下汗马功劳。1982 年经转干考试，成为国家干部。

最为精彩的是，化纤针织厂筹办初期向县人行贷款 16 万元购买涤纶长丝，贷款到位却不知道货源在哪里。经多方努力查找，获知省华福公司有 4 吨多涤纶长丝被长乐某企业购去。孙朝和运用高超的公关技巧，竟将已售长丝冻结，转售罗源化纤针织厂。这“截和”的牌技，令人无比佩服。罗源人感叹：“还是霍口场人有办法！”

张亚淦 1976 年借调到百丈水电站工程指挥部。1984 年正式调入水电站，不久调入电力公司。1987 年电力公司走企业现代化道路，公司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升级办”，亚淦任负责人。经过几个月努力，上等级工作卓有成效，利润明显增加。第二年通过上级部门考核，实现了上等级目标。

亚淦自幼喜爱习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福建日报》《福州晚报》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公司领导用其所长，调为公司秘书（中层管理人员）。之后他连续两年被评为省市电力系统优秀通讯员，成为《福建电力报》《福州电业局通讯》的编外记者。1987 年他的论文《评

价小水电站应侧重考核投资效益》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电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应邀出席在四川省都江堰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格之高，令罗源这个小县城非常震惊。没想到咱这“小洞竟爬出了大螃蟹”！螃蟹从哪里来，霍口场呀，“霍口场厉害啊”！

范光盛 1965 年起，为霍口、飞竹周边设计、修建公路近 70 公里。参与霍口乡 140 米跨江大桥、福湖畲乡 156 米跨江大桥及闽东后宦 42 米最大单跨石拱桥设计与施工，造福了山区广大的民众，得到广泛的赞誉。1985 年后，作为林业工程师的他，参加了县林业局在霍口西峰川边筹建福州地区最早面积达一万多亩的国社合作林场和福州多个公园的景观设计 & 施工，成绩斐然。

彭潭安 霍口场才女，既能歌善舞，还会谱写乐曲，写一手好文章。她精明能干，还特能吃苦。1974 年被抽调参加“路教”，1976 年借调县印刷厂，她努力学习捡字排版，没有几天就能非常熟练掌握这门技术，让她的师傅望尘莫及，感叹：“霍口场人，好样的！”之后，她又分别在商业局下属的饮服公司任出纳，在糖烟酒公司做政工文秘。

1978 年底，黄雅贞和邹海秋被县人行借调，两个霍口场人很快就脱颖而出。海秋成为新职工业务培训班的老师。雅贞先后参加罗源县及宁德地区人行系统会计业务竞赛，均获得骄人的好成绩。

1982 年霍口知青桥牌队获全省桥牌冠军，在罗源又引起一阵骚动。桥牌是冷门体育项目，因为邓小平、万里等国家领导人喜欢，得以普及。县工会、体委曾组织桥牌学习班，报名 200 多人，培训没几天，人越来越少，最后没剩几个。他们说，还是霍口场人脑袋瓜厉害，

我们学不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人武部政工科孙科长在福州街上遇到蒋桢，他说要到九三医院看病，不知道怎么走。那时候没有的士，也没手机，蒋桢却在几分钟内拦下一部黑色小轿车（不知是哪位首长的坐骑），蒋桢交代司机把他送到九三医院。孙科长非常感动，回到罗源后逢人便说：“蒋桢太牛了！霍口场人侠义！”

文革结束，罗源也掀起“四人帮”“李李叶周”。工会副主席叶业善就是那个“叶”。专案组人找了几位霍口场叶的“次密接者”，想收集他反党证据，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专案组成员和叶业善本人都夸：“霍口场人仁义！”

几年以后，正式调出来的谢金宝等人担任了单位负责人。郑德麟在罗一中任总辅导员、教师民兵连连长、球队教练及体育、地理老师等职，并转为国家干部。林新官等共产党员在各自岗位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初步改变了当地人对霍口场的印象。借用出来的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全都经历过各种困扰，其中是非曲折，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中明白。不几年，刘云祥被提为县林业局副局长，林涵提为县组织部组织员。黄听为县剧团团长。王金康为茶叶公司经理。毛祚国为汽车运输队队长。程惠民为西兰乡副乡长。林发仪为县政协委员。孙朝和、张亚淦、黄雅贞和邹海秋等为单位中层干部。林发仪、陈行焘和许琛等评为先进工作者。其余同志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成绩。从此，霍口场在罗源人心中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改变。

再到后来，40后的霍口男知青，竟成为50后罗源姑娘的择偶热

门。“导渠可奥敦滴，丫元写浪董”（嫁给霍口的吃两餐都情愿）不信你数一数，罗源的女婿知多少！

霍口场人才济济，在罗源县可谓名扬四方，真是：

高手现民间，

英雄出少年。

罗川卧龙虎，

霍口第一先。



我的简历

蒋 楨

离开霍口场已四十五年了，想当年在霍口场我是属“可改造好的子女”，受尽不公正的待遇，时常莫名其妙地遭来横祸，连内人也无辜受累，回忆在霍口场这十五年真是无语！

对“上山下乡”现在毁多于誉，许多优秀青年被逼得走投无路，悲剧惨案时有发生。我虽文化水平不高，但自学中文、历史、哲学，后组织两次送我进高等学府深造。这四十五年间我自己不懈努力，还得到许多长辈的同情和帮助。特别是祖父在东北军的老袍泽、后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帮助。可能是祖宗积德，每到困难关头都有一股神奇力量帮我化解。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场里许多知青纷纷外调或外借，我心中无限惆怅。一次在后洋山上锄草，我跟好友谢祥明相互鼓励安慰。我对天发誓：“我蒋楨绝不相信会一辈子埋在霍口场，请老天作证”！

多年的磨练使我逐渐成长起来。从福州市仪表公司的“以工代干”，到调省旅游局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我努力工作，这之中得到原福建常务副省长后为物资部常务副部长蔡宁林的帮助和支持。外经贸部郑拓斌部长，海关总署戴杰署长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曾包下福日彩电、万宝电冰箱的两年产品，为省旅游局、省海外旅游总公司创造了可观的利润。

由此名声在外，恰逢国防工业推行“军转民”政策。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属国防工办系统）希望将我调入，负责组建福建分公司。刚接任的省旅游局明敏局长不愿意让我走。最后在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王照华推荐下，有关部门为我办好调动手续。

在北方工业公司十年，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六年被系统评为优秀党员，1994、1995年被评为国防工业口的标兵，由于多年的无私奉献，我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因为在北方公司工作，常出国接触许多国家军警首脑，



也参与了友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受到高度评价，经北京有关方面批准受聘为柬埔寨王国国防部军事装备高级顾问，成为东南亚几国军警方的座上宾。有关部门执行中央 61 号文件征调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率命带家属移居香港，直到现在。我是第二届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会长是迟浩田。我现在还任总装备部新时代集团高级顾问。

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军人的牺牲精神，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花，但我尽力了。霍口场的历练，已经变成我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成功，靠机遇，更靠自己的奋斗，靠坚强的意志，靠无畏的拼搏！——这就是我对人生的领悟。

在战火中成长

张利清



九月三十日，国家烈士纪念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我想起了 50 多年前那场永生难忘的援越抗美战争，想起在惨烈的搏斗中，牺牲在越南高山雨林中的战友们，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965 年 9 月，入伍仅半年的我作为 4000 余名铁道兵中的一员新兵，接到命令隔断与亲人的联系，清除一切与军人有关联的物品，登上南下的列车。部队夜里从湖南进入广西，下火车前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在国境边界迅速地登上越南小火车，悄然无声地驶过“友谊关”，进入当时称作“同志加兄弟”的邻邦——越南。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胡志明主席要求中方以秘密方式进入越南。所以援越战争不像抗美援朝那样“雄赳赳，气昂昂”高调宣传。我国先后派遣 23 个支队、共计 32 万余军人进入越南北方，以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解放战争。

援越抗美是继抗美援朝之后又一场大规模、长时间与美军的交锋。在这场对抗中，我们援越部队所抢建抢修的铁路、公路、军事设施工

程及担负的防空作战，为确保越南北方战时运输、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将美军牢牢地阻隔于北纬 17 度线以南，挫败了美国向北扩张的战略企图。

越南地处热带，气候非常恶劣。一年有六个月雨季。下雨时战壕里、帐篷里都是水，常常个把月难见太阳。天气闷热，帐篷里 40 多度是常事。衣服一个星期都凉不干，而且为了避免驻地暴露，凉在树荫下的衣服更难干，这样没干的衣服就穿在身上靠体温来焐干它。因为潮湿、高温，多数人皮肤都长癣，甚至糜烂，加上蚊虫叮咬，常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越南蛇特多，不时发生战友被毒蛇咬伤中毒的事件。我们高射机枪连驻扎在山顶，旱季时用水紧张，加上高温，每天汗流浹背，洗澡很困难，只能用毛巾擦擦身子。在越南前线吃饭也是不小的考验：因为当时国内搞文革，很多公路不能通车。没有新鲜蔬菜，吃的是军用烤干的小白菜（我们称之“鸡毛菜”），平时就是菜干配米饭。好不容易从国内运来的大白菜因为天热，一路折腾到了阵地，外边的叶子都烂了，只剩下中间一点菜心。偶尔用难得一见的南瓜做馅包顿饺子改善伙食，就是很开心的事了。伙房只好自己用绿豆发豆芽。没有鲜肉，都是吃罐头，还有就是压缩饼干。吃一两餐没事，天天吃可就受不了。为保证战斗力吃饭当作任务，难吃也要咽下去。幸好我是霍口



场出来的，面对艰苦的环境有思想准备，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我们在越南经历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每天都有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每个人都抱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生死话题不再沉重，“献身”成了中国军人崇尚的人生价值观，脑海里根本没有名和利的概念，只有使命和担当。无私无畏，勇敢忠诚，信念坚定，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的品质。1966年夏日的一天，我们一个高炮团部遭美机轰炸，保护雷达的高射机枪排除一人生还外全部阵亡。战斗中有个战友肠子都流出来了，可他把肠子掖在衣服内继续战斗，直至最后倒在阵地上……为保障战略物资运输，我们常常冒着鬼啸般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抢救公路、铁路及大桥等设施，很多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正是依靠战友们的牺牲精神，才打造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战斗发生在1966年8月。那天黎明，上级通报有敌机活动，我们连立即进入阵地。7点多一架F105美军侦察机超低空掠过我们的阵地，不一会儿几架飞机呼啸而来，投下炸弹，瞬间尘土飞扬、爆炸声响彻山谷。我连三名战友（卫生员、副班长及一名战士）当场壮烈牺牲，还有十几位战友负伤。面对疯狂的敌人我们怒火中烧，高射机枪复仇的子弹射向擦着树梢飞过的敌机，“打！给我往死里打！”山在摇，地在震，眼睛都打红了……只听“咣”的一声巨响，一架敌机带着火光一头栽进了丛林，另一被击伤的飞机冒着烟仓惶逃命。这次战斗我们全连官兵齐心协力，浴血奋战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一架的好战果，受到中央军委嘉奖，荣获集体二等功。

1967年我连又击落无人驾驶飞机一架，第二次被中央军委嘉奖，再获集体二等功。

1966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签名授于我们每个援越战士抗美勋章及证书，以表彰我们的贡献。

1968年我当上班长，8月我在援越抗美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年里获5次嘉奖。

1969年3月，我们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光荣使命回到了亲爱的祖国。

1970年2月我退伍，成建制转业到石油战线，参加国家三线建设。

1970年3月，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组织推荐到湖北江汉石油学院（当时叫五七石油学校）。通过两年学习，获地球物探专业中专文凭。毕业后，继续在石油战线工作。

1978年调回罗源县工作，直至退休。

回顾自己这一路走来，霍口场锻炼了我，给了我幸福，援越抗美战争让我在战火中淬炼、成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只要是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一切，这辈子就没有虚度。



原解放军总参谋长、援越抗美部队总指挥杨得志上将在《铁血雄狮》风云录中题词：“在我军的斗争史上，还有一段震撼世界却又鲜为人知的援越抗美的光辉历程，这段不寻常的历程无疑在史册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很欣慰，我亲历了这段历程。



我们有颗火热的心

沿山行

1963年，福州市知识青年离开家乡，分赴国营农、林场落户，对这件大事，当时报纸曾广为宣传。8月31日《福建日报》在较显要的位置以《福州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创业》为题写道：“春天，福州市七百多个知识青年和街道居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分别到罗源、连江、福州市郊参加国营农场、林场、水产养殖场劳动”。9月24日又报道：“9月初，福州市热烈欢送13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乡青年纷纷表示决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把毕生精力献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知青在农村落户十几二十年，虽少有惊天动地之举，但少男少女们以自己的宝贵青春和艰苦创业的经历留下一篇篇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

那时的青年学生，单纯、天真，毫不犹豫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我和不少同学从福州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后，听过两场动员报告，就自己拿了户口簿将户粮关系迁到罗源县霍口油茶林场（当时场属福州市农垦局）。9月1日上午7时半，母校敲锣打鼓送走2辆客车约七、八十名青年，他们中最小的仅15岁，最长的20岁出头。同车的同班同学有翁爱诚、林海、陈行焘及女同学郑一津。许多家长送行，其中有我的大姐、姐夫及二哥。校方派留典田、蔡敏华二位老师带队（次年初他们返校）。同行的除40名左右应届高中毕业

生外，其余是非应届中学生及少数小学文化程度的小青年，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关系与我们一起投入“广阔天地”，准备在那里“大有作为”。

霍口油茶林场于 1957 年底由省粮食厅创办，尚未形成规模即因国家经济困难下马。后改作福州市公安局八科管辖的劳教场所（也因此知青上山时曾一度被当地农民误认为是劳改犯），不久又因备战紧张而停办。1962 年场由市农场管理局（即后来的农垦局）接管，先后招收了一些福州“精简”人员及我们这批知青。

霍口油茶林场位于罗源县西部山区，距离福州百来公里。场部设在罗汉洋，下设若干工区（管理区），散布在方圆十来里的地域内。油茶场以油茶种植为主业，兼植茶叶、油桐、水果等。据当时省报记者报道：“来到霍口油茶林场的青年们，看到满布山岗的八千亩油茶、油桐，一下子便被这好地方吸引住了。”说是几千亩，也许只是账面统计数据，而且大多油茶尚未成林。这里条件相当艰苦，交通不便就是其一：当年公路只到飞竹为止，送我们的客车到飞竹就回转了。学生们在飞竹公社吃了离家后的第一餐饭，甜粥、米粉猪肉。对于尚未摆脱困难时期饿肚子痛苦的我们而言，这餐饭十分可口。饭罢，望着前面的高山峻岭，有年纪较小的同学问“有三轮车送吗？”回答当然令人失望，大家背起行囊，重行李请人挑走，步行 45 里山路到场部。

两天后，福州七中、女中、二十中学生陆续到达，加上 3 月进场的，共 300 多名知识青年成了油茶林场的新主人，平均年龄不上 20 岁。领导我们创业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场长肖锦

华，为人严肃，生活俭朴，爱打赤脚，去飞竹几十里山路也是光脚板走路，到了车站再穿鞋上车。他的继任李光钦，结实的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飞挑的眉眼，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农村干部，生产之余，喜欢组织大家搞文化娱乐活动，“文革”中遭批斗吃了不少苦头。前些年知青组织返场纪念活动，曾邀请他参加。经过几年锻炼，一部分知青成长为场、工区领导。原鼓楼安泰街道青年陈国瑞，曾任后洋工区主任。1966年调场部任团总支书记，以后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多次被评为劳模；1975年开始担任副场长。他的前任团总支书记林月婵，原女中高中毕业生，在场两三年就上调省城转了干，后曾任省民政厅副厅长。

几天后，稍经休整的知识青年被安排到各工区劳动。女中及二十中学生留到场部罗汉洋工区。这里条件最好，有电灯、电话，有供销社，住二层木楼，青菜长鲜，电影常看，被知青们戏称为“京城街”。以后每次开职工大会时，我们成群结队，欢声笑语，步行十几里到场部，真象农民哥进城一样。二中、七中学生到17里外的仙洋工区，其他知识青年分到后洋、船头、罗溪工区。仙洋工区和别的工区一样，条件很差，没有电，宿舍也还没有盖起来。我们暂住在旧农舍，男生二十多人一大间，打地铺；女生四、五人一小间，睡床板。伙食没有青菜，也很少肉。到仙洋十几天遇到附近农民杀猪，食堂买了四斤肉，分三餐炒豆腐皮，一人分到一点儿，才算开了荤。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3斤，这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年青人是不够的，开始劳动后，常感到饿。晚饭后有时几个人买个南瓜，清水白煮，也吃得津津有味。

过了半年，场为我们在徐重盖的新房落成，仙洋的职工都搬进新居。这里按山势高低错落建着四座石砌单层集体宿舍，还有一间木建大食堂(兼会议厅)。每座石房8-9间宿舍，每间住4-5人。第二座是女生宿舍。徐重新工区比仙洋条件强，离场部近5里地不说，周围环境也好。工区在半山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能望见四、五里外的鸡公岭。场部方向如有人来，远远便可看见。闲暇时间，我们常常以此排解寂寞。山下是清清的霍口溪，成了我们嬉戏沐浴的好去处。搬到徐重工区后不久，带队老师返校了。老师走后，知青中产生了工区领导，余惠孝、赖桂贞、孙攸生、陈贤达、孙明沁、翁爱诚等先后担任过工区主任、指导员，他们多是高中的原班干部、团干部。工区下设小队，基本按原高中班序编排，我在一队。各队队长由工区领导指定。在徐重工区，生活劳动走上正轨，我们也渐渐适应了新生活。

油茶林场成林的油茶树不多，不少油茶还在苗期，有的需要补种，有的需要垦复。油茶树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小乔木，秋季开白花，次年夏秋结果。果实暗红色或青色，当地农民叫做“槽”。果实采摘下来之后，经晒裂、剥壳，其籽可榨油(山茶油)。榨油要经过晒、烘、粉碎、蒸、榨等多道工序，榨出的茶油清冽芳香，可食可入药，当地农民十分推崇。但油茶生产缓慢，培育油茶长大成林是很费力的。山区土质肥沃，茅草长势旺盛，几个月不锄就草高过茶树。在场十多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草打交道。给茶树锄草，为油茶劈草、烧草积肥，挖茅草根开荒……初到林场是修路、打防火道，也摆脱不了草的纠缠，草成了我们的头号“敌人”。大多劳动场地离宿舍很远，有时要爬很

高的山，所以中午常常不回来，得送饭吃。一小段咸带鱼是菜，竹筒里的冷开水是汤。锄头柄是新的，很粗糙，没干几天就手心打血泡，染在锄头柄上星星点点红血迹。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叫作“黑叮”的小飞虫，特爱欺生，而且叮你没商量。常常几十头一齐袭击，吸血时无声无息，饱食后皮肤留下一片红疱，痛而且痒，甚至糜烂。面对种种困难，知青们毫不畏怯，只有一位高中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干了两个月返城走了。但这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场的建设迅速发展。几千亩油茶垦复完成后，次年，又种植了果木 530 亩、茶叶 850 亩、林木 700 亩；每年各工区还分别试种棉花、花生、白地瓜、甘蔗、番薯等，都获得成功。知青们为自己的业绩而自豪，林场处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周围农民也开始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劳动不久工资民主评级(名义工资，只在请病假或做点工时用)：一级日资九角八、二级七角五、三级六角。我被评为一级。第一个月劳动所得近 30 元，加上政府补贴 10 元(初中生补贴 8 元)，赶上当时一般干部的工资，很满足了。一年后，政府取消补贴，此时工资已定级，我定为农垦 4 级，月工资 26 元 6 角，只要完成生产定额就能领到全工资，仍是工区里较高的。最低一级工资只有 20 元。当时徐重工区食堂包伙食每月 9 元，其他花销很少。工资虽低，多数人仍可维持自己的生活，未见什么人家里寄钱来，大家都以能自立而自豪。这里物价比较便宜：活鸭一斤六角、“龙骨”四角、猪肉不分等七角。我们年轻胃口好，两人合宰一只鸭改善生活，放在食堂蒸烂了，一餐吃光，花不上二元钱。记得一次山洪后，山下农民到溪里网到一条 10

斤重的鳊鱼(俗称“溪滑”)一斤八角卖给我。因为是稀罕物，大家闻讯赶来，一人切一小块，顷刻间瓜分净。我们还吃过不少山珍野味：野猪、豪猪、鹿、蛇、穿山甲、山鸡，各种溪鱼、菇类，甚至连猫、田鼠也不放过。

知识青年给这片物质贫乏的土地带来了文明、欢乐和生机。徐重工区自打来了我们，这里天天歌声不断。发现好歌大家就传唱，喜爱中外名曲，但最流行的是革命歌曲，有一首这样唱道：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是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不管劳动多累，只要一唱这首歌，顿感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工区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饭前列队唱歌，迟到要罚唱。为了快快结束惩罚，最常唱的短歌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古巴必胜美帝必败。”知青中不乏文艺人才。柳珍妮，我的邻班同学，工区的文娱委员，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在她以及几位骨干的组织和指导下，仙洋(徐重)工区的业余文艺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这种文艺活动最初以自娱形式出现，以后常在松明映照下为当地农民宣传演出，逐渐发展为场的文艺宣传队，多次走出霍口，在市农垦系统、在地区、在县城都留下一定的影响。演出队的乐队成员最初仅限于本工区，以后吸引全场的音乐爱好者参加。乐队的台柱人物黄听，六二届高中毕业生，精通多种乐器，尤以扬琴、小提琴见长。七十年代初油茶场文艺宣传

队到县公开演出三场，表演唱《炊事班的小晚会》中有一段引起轰动的碗奏曲《我是一个兵》便是黄听的杰作。另一位后台骨干刘与文，文化不高却聪慧过人，擅长民乐器和演反派人物，是不可多得的多面手。靠此专长，他最终成了福州火车站工会副主席。蒋桢，满口京腔普通话、扮相好、善表演，在《沙家浜*智斗》中，他饰敌参谋长刁德一，与柳珍妮扮演的阿庆嫂唇枪舌剑，出色的表演博得满堂喝彩。

与此同时，一支文学爱好者队伍也在悄然形成。他们与市图书馆挂钩，办起工区图书室，传阅中外名著。反映革命青年生活的小说是他们心爱的读物，并影响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欧阳海之歌》《牛虻》等。他们自办墙报周刊《山茶花》，吸引了不少热心的业余“作家”和读者。有人不满足于作品上墙报，尝试文学创作，经过努力耕耘，终于有所收获：林涵、张亚淦、邹海秋、高士中等先后在《福建日报》副刊、《福建文艺》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曲艺作品。工区学习风气浓厚，常常就某一问题、某一观点争议甚至公开辩论。有一次辩论“旧文艺形式能否用以反映新生活内容”，辩论双方在墙报上各抒己见。有的知青为了让自己的见解抢先与读者见面，彻夜赶写文章。由于缺乏文艺批评的理论知识，双方辩词往往从意气出发，说服力不强，使辩论不了了之。

1966年初，全国在“口诛笔伐三家村”声中，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也许外界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地处山区角落的徐重会“紧跟形势”，在工区食堂四壁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墙报周刊上的一篇“反党

反社会主义毒草”。一个月后，大批判演化成阵线分明的两派对立，展开激烈的文斗。不久，许多知青纷纷离开林场去大串联，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初，文化革命趋于平静。此时由于林场经营困难，下放给县管辖，知青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命运以及林场的前途。其时有三个问题迫在眉睫：一是工资低、生活艰难；二是多数知青尚未成家；三是最核心的，不安心林场工作，想调动。调动工作，一直是知青们的心中梦想。林场有过两次重大的人事调动：1965年11月有18人调往三线工厂，宁化县建设机器厂；1967年又有一批知青调到福州市八一拖拉机站。两次改变人生命运的调动，令许多留场知青羡慕不已，但没有造成很大的思想波动，大家都在盼望着自己的机会。待到不少知青迎来“而立”之年，而成家立业还遥遥无期时，人们开始有了危机感。1970年7月，一百多名知青走访省接待站，提出三个要求（增加工资、场建制转为林业、知青调动工作到工厂）。省领导黄亚光接见了职工代表。知青们返场后，省委派了一个由省、地、县三级组成的调查组到油茶林场，明确表态：“将考虑困难，逐步加以解决。”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罗源县有关部门将近八十多名知青调往或借用百丈水电站、造纸厂、车队、粮站、商业局、供销社、邮电、松山围垦等单位，体现了罗源县人民对知青的关心和爱护。此后又陆续安排了一些。直至1984年8月，经省政府批准，一揽子解决了油茶林场问题：撤销霍口油茶林场，场大部分林地归县城关林场经营，隶属县林业局管辖；原后洋工区茶园及部分林地划给县叠石茶场；其他人员由福州红庙岭、优山、恩

顶各农场接收；有路子的自己联系调动，原来借调罗源的由所在各单位消化安置。我在县领导陈作兴和县农委副主任、原场支部书记官德宝等帮助下，结束了八年的借用生涯，正式调入电力公司，实现脱农进厂梦想。我的不少同学、朋友也先后跳了“槽”。林涵，罗源女婿，后一家三口迁往福州，任职福州市委组织部；邹海秋，福州二中高中六三届高材生，在市工商银行任储蓄处副处长任上退休，是市政协委员；陈国瑞，知青出身的副场长，后在市绝缘材料综合厂任厂支部书记；刘兆驹，原场生产员，1986年调市国家标准局工作，后提前退休进了一家外资企业；黄昕，凭借其音乐才能调入县剧团曾任团长，后调市文联；孙朝和，凭着精明的生意头脑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完成了人生“三级跳”：1975年调往松山围垦工程，1981年跃出“农”门，进县化纤针织厂、烟草公司，1990年调到省烟草公司任仓库主任。高士中，自学英语成才，1980年经福州市教育局考核调入省师大附小教英文，后成为高级教师。林发仪1986年进县水电局，1987年当选县政协委员，11月调省协和医院；杨光中，文艺骨干，有一副柔和、动听的歌喉，1965年与一批知青转福州北郊开办寿山果牧场（今优山农场），后调入永安市某煤矿任工会主席；彭潭安，喜欢文艺，却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脱颖而出，后成为福州某公司的业务骨干；孙攸生，原徐重工区主任，场里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儿，厦大毕业后先后在西兰中学、罗源一中教历史，后到福州杨桥中学任教务主任……我的不少朋友，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受家庭问题影响失去了念大学的机会。“四人帮”倒台后，他们通过电大等成人教育，圆了大学梦，

成了经济师、会计师、工程师，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入了党。他们曾经失去许多，但怀着-颗火热的心，在人生道路上，意志不衰，奋斗不止。

1993年10月2日，100多名老知青携带妻子、儿女相聚在油茶林场，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对这片我们曾经奉献火热青春的土地表达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军工足迹

林有庄 高娟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在西南建设“大三线”，彭德怀元帅是总负责人之一；各省的“小三线”，由省国防工办负责。福建的三线就定在三明，龙岩一带。1965年10月，我们18名知青，经政审、体检，幸运地被兵工厂选上，成为霍口场第一批被割走的“韭菜”。

从出工到上班，从农场到工厂，从拿锄头到看机台，从上山知青到正规军工，大家的心里，充满了期待、自豪、喜悦和向往。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兵工厂所在地，比霍口场的山沟沟更山沟沟。

从福州乘火车走走停停6个多小时到三明，在厂招待所过个夜。第二天清晨乘长途汽车，在山沟里转5、6个小时，转得头晕脑胀，在清流与宁化县的交界处下车，有人吐得一塌糊涂。要是没有厂车接，就只能徒步登高百米，翻山越岭近一个小时到厂区。真不比从飞竹到霍口轻松啊！毛主席诗曰：“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是真实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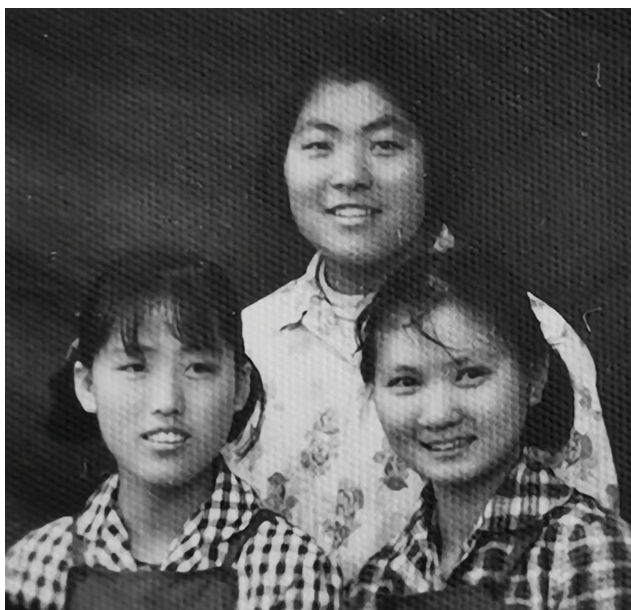
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建起来的兵工厂对外叫福建建设机器厂，内部编号为944厂，还有一个宁化5101信箱的邮寄代号（大家习惯叫01厂），真够神秘的。工厂建在一条大山沟里，原始森林就在附近。厂区离宁化县城35公里，离清流县城7公里。

我们算是比较早去建厂的一拨人，同批的还有从红庙岭、恩顶、鼓岭、寿山等农场及福州各街道来的年轻人。厂里中层以上领导多是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文革中、后期是现役军人任厂负责人，厂总工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厂里的师傅多是从东北沈阳老厂来的，还有很多退伍转业军人，鼎盛时期加上家属有两千多人。刚进厂时我们的工作 是搞接待、搬机器、安设备。后来慢慢地厂房盖好了，宿舍楼也建起来了，一切都走上正轨后，我们就被分配到各个生产车间。每天听军号起床、上下班，真有点身处军营的感觉。

很难想象在一个深山老林里，竟然存在着一个“小社会”（当然是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这里有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有邮局、医疗所、银行、粮店、服务部、招待所、农场、澡堂、图书室、理发店、灯光球场，有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还有个不小的车队（有拉货的解放牌卡车、救护车、消防车、北京吉普及接送职工的大客车）。

在那个年代，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待遇也很好。子女入厂里的托儿所、幼儿园一天 5 分钱，家属区的水电也不用交钱，只规定厨房用 25 瓦、房间用 40 瓦灯泡。省委及军区非常关心我们，建厂初期省委叶飞书记亲自来指导。福州军区卢胜副政委曾对宁化县领导说，你们就是饿肚子也要把这兵工厂供应好。原我们场徐重工区的林美英因为翻车骨折，那天刚好福州军区邓克明副司令来厂里视察，他下令调来直升飞机把美英送到南平 92 医院。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能有这样的待遇，足见当年对工人的重视与关怀，要放现在真是不可想象的。

厂里的文体活动还是挺丰富的，经常与附近的兄弟厂进行篮球、乒乓球比赛。我们厂每年的“五一”乒乓球赛冠军几乎都被陈德包揽，他还多次获得宁化县乒赛第一、二名，三明地区进入前八名。逢节日有兄弟厂文艺队交流演出，俱乐部每周放映一、两次电影(票价5分)。



省体工队的著名运动员也曾来厂慰问表演。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工余单身女工们多一边打毛衣，一边看书。男孩子跟霍口场差不多，有打牌、下棋、吹牛、喝酒的，也有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

那年代物资匮乏，为了职工的健康，厂里也设法从各地拉来猪肉、鲜鱼及水果。要是有肉片汤供应，人们会兴高采烈敲着锅碗往食堂跑。假日或空余时间很多人(特别是成家、带家属的)自己动手种菜种瓜，上山砍柴，抓泥鳅，摸田螺，种香菇，养鸡养鸭，个别人还养猪，种水稻。我们场的陈德，脑子灵活，手脚麻利，夏夜能在山涧溪谷中抓到很多棘胸蛙(谷冻)，令众人好生羡慕。汪望钦会过日子，租住在农民家，砍柴，种菜，做饭，什么都干，晒得黑黑的，跟在霍口场没什么两样。东北师傅刚来南方没见过荔枝，连皮带肉放嘴里啃，还说：“很扎人！”偶尔有红鲢鱼到，鱼头都贱卖，老师傅说，“那都是骨头有啥吃得呀？”结果都被我们南方人买了。有师傅假日到河边钓鱼，钓上个甲鱼，立马丢掉，嘴里还要嚷嚷：“今儿够倒霉，钓了只王八！”

厂里的客车，每周一、三、五去清流，二、四、六去宁化，一两毛钱车票。碰到十天一次（逢5号）的墟日，山货很多，鸭子（半番）最便宜，三、四毛一斤，鸡蛋一块钱七、八个。常常还会有野生的香菇、棘胸蛙、山龟、雉鸡、甲鱼、溪鱼、河虾等山区土产。“老鼠干”是宁化特产，田鼠烤制的。一只一片叠起来，金黄色，油光发亮的，很诱人，按串卖。我们不敢吃，也没买过。当地人说有“补科”（宁化话，滋补的意思），现在挺贵的，还很难买到，据说都出口换外汇了，不知是否属实。顺便说一句，进厂一两年后，我们的工资是三十七块五，再后来涨到四十七块七，在那山旮旯里这些钱能买不少东西哦！

宁化地属闽西北，冬天很冷，时尔下雪。有次看电影，进场时天气还好，出来已是白皑皑一片。雪化时更冷，屋檐下的冰条子几天不化，顽童们会把它敲下来当冰棍啃。东北来的师傅按老家做法，在屋里砌个大热炕。宁化的夏天早晚凉快，中午也热，当然比福州还是舒服些。

说到生产，出于有关规定，具体就不说了。当年抗美援朝，我们日夜三班倒，产品一车车拉到前线。主席说了，他们要多少给多少，不要钱。哪里想到，几年后越南跟咱翻脸，倒过头来，拿着我们的武器弹药打我们。咱们勒紧裤腰带支援的大米成了他们的掩体沙袋，真是无语！

改革开放后，国防工业“军转民”，按上级部署我们几个兄弟厂都搬离了三线，有的迁到县城，有的搬到马尾，我们厂于1985年起至1990年花五年时间完成了从宁化到莆田涵江的搬迁工作。此后，

军品基本上就停产了。很多老师傅退休后就留在涵江的厂区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们厂的下一代人有出息的很多，艰苦的生活，让他们很早就知道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从六十年代在山区隐秘建厂，到八十年代搬迁繁华沿海，二十几年来工厂的变化太大了。宁化深山里的兵工厂，早已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办公楼、学校、宿舍等设施几乎白菜价地卖给当地的山民，偌大的礼堂成了他们的竹编工场。跟大家时常回霍口一样，我们也时不时地回到奉献了青春年华的地方。有些东北来的老师傅还安息在那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之中。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想想我们从霍口场到兵工厂的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好的工作单位很不易。奉献、忠诚、勤奋、上进是我们的本色。在这样的军工单位，没有不好好工作的理由。这辈子我们为国尽忠，忘我工作，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为了三线建设，为了国防事业，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我们尽责了。祖国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



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愿我们都能记住“三线建设”，记住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难以忘怀的大山里 01 厂的历史。

痛苦的回忆

刘树业

1964年8月上旬，一个令人难忘的悲伤日子。上山不到一年的福州女中学生林美英，我们的知青挚友，在收工途中，不幸落水罹难。年仅十七岁！

场部一队 在罗溪对岸有大片的班地，平时他们出工要撑竹排过溪。遇到水流平缓，天气暖和，他们就抄近路，在溪水不及膝盖的地方，踩着光滑的鹅卵石，杵着锄头，趟水二、三十米到对岸。要是夏天，收工回来，大家会顺道在溪边洗洗泡泡，会游泳的男孩子们，趁机下水嬉闹一番。

这日，正是八月暑天，收了工的知青们，浑身汗渍，恨不得早早赶回洗漱。走得快的已过了溪，美英和几个走得慢的女孩刚到溪边。但见溪流缓慢，清澈见底，她们禁不住这蓝天碧水的诱惑，纷纷卷起裤腿，趟入水中。夏天山区的溪水，清爽透凉，沁人心脾，带走了人们一天的劳累辛苦。几个女孩子在溪边有的洗脸洗手，有的洗毛巾手绢，还有的埋头水中学习游泳憋气……“我的斗笠！”有个女孩叫了一声，小小的斗笠漂在水中，美英转身伸手想勾，但是够不着。缓缓的流水把斗笠渐渐带离……美英快趟一步想抓住它，可是一脚踏入深水区，人漂起来！不会游泳的她，顿时紧张万分，在水中慌乱地拍打着，张嘴呼喊，又呛了一大口水。旁边的女孩见状想去拉她，不料也滑入深

水……等另外几个女孩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呼喊“救命啊！”“救命啊！”场面万分危急！听到叫喊声，队长吴明焯沿岸边飞奔而来，拉起挣扎在最外边的一个，回头再看水面，只剩下漂移远去的小斗笠，美英已不见了踪影！岸边的伙伴个个脸色煞白，吓瘫在地上……



消息很快传到场部及其他工区，人们匆忙赶到溪边。场部和其他工区会游泳的都赶到现场下水摸捞，不会水的站在岸上盯着水面，希望能见到她的身影，祈祷她平安归来！

直到深夜，溪边的木柴燃尽，除了悲凉的溪水无情地流淌，除了深夜呜咽的山风灌满耳际……“美英！”“美英，你在哪儿？！”……人们不断地呼唤，望眼欲穿地等待，等待……除了寂寞空山隐隐的回音，便是无奈的叹息！

第二天黎明，在离她落水百米开外，人们发现了趴伏在鹅卵石上的美英遗体——一个青春年少、家里的宝贝独生女、我们亲密的知青朋友，就这样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告别了人世！

人们在场部给美英设了素雅的灵堂，各工区送来花圈、挽联，并派代表为她值班守灵。

次日，美英的父母由场部人员用轿子从飞竹抬到场里。望着悲痛欲绝的憔悴老人，大家潜然泪下，不能自己！

美英的遗体被安葬在场部山坡的班地里。后来在墓地四周，大家种上了许多果树。每年清明，在山花烂漫的时节，场里的同事、好友

都会来到她的坟前献上鲜花，以悼念这位我们一起上山下乡第一个献身的年轻人，愿她安息！

即将竣工的霍口电站蓄水将淹没罗汉洋场部，根据我们的要求，美英的遗骸将迁移到水库上方的指定地点。她会看到霍口山区天翻地覆的巨变，她将与霍口永生！

美英，我们怀念你！



辛苦运输队

许如基

上山头几年，公路只修到飞竹，场里的生产物资、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都要从飞竹挑进来。为此，场里成立了运输队。运输队成员必须身强力壮，更重要的是不怕苦不怕累。那些缺少毅力的、身上只有四两肉的、耍赖偷懒的肯定干不长。记得如下这些都是运输队的干将：

陈东锦、陈幼敬、陈友庆、郭佳官、陈志良、陈顺盛、洪挺秀、王力夫、许如基、陈永健、周瑞华、郑时武、阮家和、王连陞、黄敦景、齐传正、阮克振，队长是黄敦景。

场总务从外边采购的东西在飞竹分装打包。运输队员们清晨出发，每人带着扁担、绳及一罐饭，翻山越岭 30 多里路，中午抵达飞竹。匆匆地吃了带去的冷饭（地瓜米饭加块咸带鱼），绑好包就上路往回赶。登上“啼哭岭”，便是“风流坪”。坪中大树干上红漆草书打油诗一首：“人在林场心在家，家中妻子一支花”，想必是场里某位老哥的心迹吧！坐下歇歇，看着这环境：古树参天，地上几块石板供过客歇息，还算平整的空地四周环绕着茅草，灌木。山风阵阵，树叶沙沙，一缕思绪掠过心头：怪不得这里叫“风流坪”，尽想美事！下到溪前村，前边便是较平坦的路了。大家喝了几口甘甜的泉水，顿时来了精神，“嘿哟呵”“嘿哟呵”加快了脚步，往霍口进发。搭竹排，过岱江，穿王廷洋，经“双龙抢珠”，直奔罗汉洋而去，赶着天黑前交差……

一天的奔波，最终熬到场部总务处。双肩红肿，身上盐晶点点。辛苦劳累，总算结束，记入计工员的册子：点工一次。我是六级工，在场里算是高工资了，月资三十二块二，这样跑一天赚一块零七分。

若是化肥、农药、种子，或吃的粮、油、咸鱼、咸菜什么的还好挑，要是分配挑水缸、杂物或是拆散的不规整的机器就难办多了。

有时，为了赚点外快，利用星期天给粮库挑谷子，从场部到霍口一百斤赚六毛八。我体力比他们差点，就挑六十斤，赚四毛八钱。要是在霍口饮食店吃个馒头加碗扁肉，这四毛多辛苦钱差不多就报销大半了。星期天不休息跑三十多里山路，吃个点心剩下一两毛，要搁现在谁肯干？

每晚早早睡下，明天照样煎熬，飞竹或者霍口的担子还等着我呢！认命吧……我常常这么安慰自己！

几年后，场里成立了综合队，有种菜、牧羊、碾米、运输、发电、饮食、养猪及加工厂等等，我们运输队变成其中的一个小组，我被调去加工厂。在运输队那段辛苦的日子至今难忘啊！



知青与桥牌的故事

邹海秋 张亚淦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抓革命”冲击一切，“促生产”成了一句空话。霍口场的生产活动处于半停顿状态。知青空余时间很多，下棋、打四十分、搓麻将（自制），消磨时光。

有人从福州带来新的扑克游戏——桥牌，不久，场里就有了 30 多名桥牌爱好者。其中水平较高的有林孔森、陈长金、邹海秋、官希宣、王石宁、刘一敏和黄礼坦等人。从 1981 年开始，他们分别代表宁德、福州和福建省参加各级桥牌大赛，成绩斐然。1981 年 8 月和 1982 年 2 月，他们代表宁德地区两次参加省赛，分别获亚军和冠军。上场队员是林孔森、陈长金、邹海秋和官希宣。桥牌与其他球类比赛不同，球类比赛以胜负场次多少论英雄，桥牌却以胜利分总和排名次。1981 年第一次参加比赛，知青队 8 胜 1 负，厦门队 6 胜 3 负，但冠军却是厦门队，原因就是胜利分总和不如厦门队。比赛不看胜负场数，只看胜利分总和。1982 年，代表宁德地区出征的霍口知青队在最后一轮之前，一路全胜，但只领先厦门队几个胜利分。也就是说只要战平厦门

队，便能夺冠。也许是求胜心切，也许是技不如人。36 副牌之后，知青队居然落后 51 分。看到败局已定，带队的罗源县委委吴干事到建阳县邮电局打长途电话报告“又是亚军！”电话那头的体委刘主任问：“比赛没结束怎么知道是亚军？”吴干事回话：“已落后 51 分。”“抢回来不就成了！”“不行啊，就像足球比赛，只剩下 10 分钟，还落后 4 个球……”

赛场这边休息时，知青队决定背水一战。无论什么神剑、妖术通通使上，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做一万分努力。15 分钟后重新上场，孔森、希宣那边上演了“草船借箭”和“空城计”；长金、海秋这边一个“挥舞罗源锄”，一个“抡着大劈刀”，一时间杀得天昏地暗，场面惊心动魄，厦门队被打得人仰马翻！12 副牌之后，知青队居然扳回 56 分获得冠军。那一时欣喜狂欢的情景无以言表！福州二队的几个队员高兴地把海秋压在地上，差点没把他压得憋过气去。毕竟都是福州人。体委吴干事从电话局回来傻了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旁观的其他代表队有人说：这明显是厦门队有意奉送！有人说宁德队有如神助，大家公认宁德队全胜夺冠，不得不服，不像去年厦门队 3 败还能夺冠。

晚上闭幕式后，吴干事又去邮电局，这回是报喜。那边问“不是输了 4 个球吗？”“是啊！最后十分钟我们队上演‘帽子戏法’，连进 3 球！”“那不是还差一球吗？”“对方‘乌龙’送了我们一球！”第二天罗源城关县政府宣传栏上报道了这件事，虽然不知道什么叫桥牌，但罗源能够在全省体育比赛中拿冠军还是少有的事。市民们兴奋

了好一阵子，感叹霍口知青真了不起。

知青队这一场胜利意义非凡。因为按当时的惯例，只有冠军队有话语权，省队人选由冠军队说了算。但此时，邹海秋和官希宣为了不耽误借调县城单位工作，退出了知青桥牌队，林孔森只好突击培训桥牌天才王石宁上岗。两位霍口知青与福州一队的三人组成福建省队，在天津的全国赛上福建队从乙级队杀进甲级队。



1982年林孔森与三明一桥手参加全国十五单位桥牌比赛，获双人赛东西组第二名。1983年，林孔森和王石宁参加省队，在宁波和杭州全国桥牌大赛中皆取得好成绩。同时在杭州，林孔森、王石宁获双人赛东西组全国第二名。没有知青队在省赛中夺冠，就没有后来强大的福建队。知青桥牌队功不可没，应该写入福建省桥牌史。

1985年，林孔森，王石宁参加省队在厦门夺得全国赛团体第二名，林孔森获男子双人赛第一名。

桥牌是一项汇合数学概率、逻辑思维、信息处理、运筹技巧、心理战术和时空概念的体育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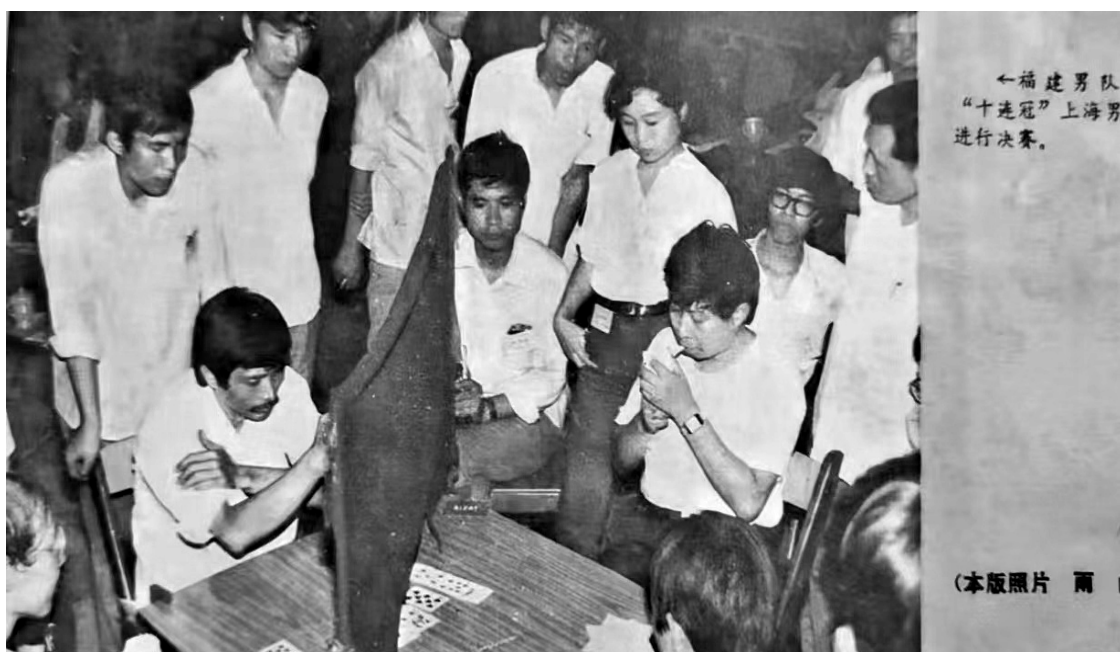
桥牌不是单打项目，就像乒乓球和羽毛球双打比赛那样，每次上场的双方都必须是两个选手。桥牌团体赛每队上场四个选手（即两对双打选手）。

双打选手之间必须配合默契。选择桥牌搭档是件非常关键的事。在霍口知青中，林孔森发现了王石宁。虽然他书读不多，却绝顶聪明、悟性高，学习桥牌对他来说居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没有几个月牌技就突飞猛进，超过学习了几年的其他主力队员。



林孔森与王石宁组对不到一年，就取得全国双人赛东西组第二名的骄人成绩，前程不可限量。可是好景不长，王石宁为了家庭，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桥牌。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孔森无比惆怅。

不久，一个福州人出现在孔森眼前。他叫陈秋官，他不就是当年共同闯荡桥坛的三个好伙伴**陈长金**、**邹海秋**、**官希宣**的集合体吗？林孔森决定与陈秋官搭档。



在厦门全国桥牌锦标赛福建队取得第二名后第二天，林孔森与陈秋官搭档又参加了男子桥牌双人赛。林孔森对这场比赛踌躇满志，胸有成竹。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和桥牌比赛的磨练，他对各路诸侯的实力了如指掌，更对自己的牌技信心满满。如今有了陈秋官，更是如虎添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相信，这场比赛将是他桥牌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他们这一对组合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怎么赢的问题。战事开打之后，赛事如预料之中顺利。有的对手简直不堪一击，更增加了林孔森的必胜信心。他甚至开始提前陶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比赛结束，林孔森、陈秋官一举夺得全国男子桥牌双人赛冠军。

福建桥牌队沸腾了，队友们为冉冉上升的双星、省队的光明前景欢欣鼓舞。林孔森很快从喜悦和激动中平静下来。他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不满足于险胜、小胜，他要的是全胜、碾压对手的绝对优势。他检讨比赛中点点滴滴的失误，不满陈秋官犯下的几个低级错误，若非这些错误，他们本可以非常轻松地获得冠军。陈秋官是名优秀选手，但他心态不够稳定，在关键时刻会技术走样，影响成绩。林孔森下一个目标是世界冠军，陈秋官不是理想的搭档。

图片笔记

棋牌项目之最

光绪年间，广东商人郑洋经商，曾在外国轮船上与过国际象棋。

桥牌

★人物篇

1. 第一个男子世界双人军：福中、赵杰。2006年6日，意大利维罗纳，第十二桥牌锦标赛公开双人赛。

2. 第一个全国男子双人军：陈秋官、林孔森（福建1985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一厦门。

3. 第一个全国女子双人

来自华为备忘录

林孔森作出冒险的决定……

“林孔森和陈秋官分手了！”很快，比他们获得冠军更具爆炸力的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哗然：有人吃惊，有人惋惜，有人试图劝阻。但林孔森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自打学会打桥牌，林孔森就与桥牌结下不解之缘，桥牌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全部，给了他一般人所没有的欢乐和荣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林、陈分手后，林孔森从桥牌爱好者的视野中慢慢消失，他再也没有参

国家体委关于授予沈小农等154人桥牌技术等级称号的通知

根据《中国桥牌协会会员技术等级标准》经审核，批准沈小农等20人为中国桥牌特级大师；石正钧等57人为中国桥牌终身大师；张强等77人为中国桥牌大师。名单如下：

一、中国桥牌特级大师：

北京：沈小农 侯允彦(女) 阎茹(女)
董水灵(女)
上海：鲍婉娴(女) 刘逸倩(女) 胡基鸿
朱萍 徐红军 沈福庆
浙江：曹建康
广东：古玲(女) 张亚兰(女)
四川：李新 张少林 黄郁 姚向平 刘川
云南：蔡友云
煤矿体协：邵子健

二、中国桥牌终身大师：

北京：石正钧 福中 刘杰 陶建华
汪若治 田杏树森 钱尚武
胡黎明 吴尚杰 龚启英
天津：陈喏 汤耿良
上海：温矜(女) 谭宗尚 王为民 郑卫国
朱敏荣 霍克师 王明明 庄则军
李劲 姚关林 周维卿 孙惠娣(女)
何苏莉(女)
江苏：王晓静 何振翼
浙江：陈少华 张鸿康 章燕(女) 王季斌
孙银萍(女) 朱律平 姜介女(女)
安徽：郭辉 陶嘉生
福建：林孔森
河南：杨广生
湖北：于振海 陈德勤
湖南：郑克明 赵强 陈宗祥 沈明坤
广东：杨业芬(女) 陈洁芳(女)

四川：严谨 吴坚 陈华
云南：马耀星 俞光斗
煤矿体协：龙浩 冉静蓉(女) 王文霏(女)

三、中国桥牌大师：

北京：张强 王旭光 李睿 周青宏
张韧 裘宗沪 陈泽兰(女) 林向东
仲江(女) 高飞 汪若冰 刘建波
程维舟 孙砚慧(女) 王艳鸿(女)
天津：伍岷
上海：卞锦胜 丁人侠 田足强 施豪军
曹文达 周松鹤 汪纯清 周咏梅(女)
戴建明 张孔武 张仁达 荣仁杰
沙毅中
江苏：任军 罗绍新 顾晓华
浙江：陈玉仙(女) 沈明芳 张磊(女)
王杭平 李志芳(女) 郭心碧(女)
徐建国
福建：许德彬 陈秋官 李天和 王石林
河南：刘豫平 曹小州 曹德义
湖北：汪曙 李景水 李智刚 杨丹霖
刘有杰 王汉杰 宾斌
湖南：杨金英
广东：马志威 杨小光 何美华(女)
汪敏(女) 郭洁(女)
广西：黄健强 彭健锋 周飞卫 黄厥柳
四川：冉勤(女) 甘霖(女)
张玉兰(女) 周锦国 胡文浩
张惠(女) 牟位学(女)
云南：范文辉
银鹰体协：张智康
煤矿体协：董军(女) 刘晓琼(女)
朱莹琳(女) 赵永波
轻工体协：唐文渊

名的福建桥牌队落到乙级队，从此再也没有翻身。

不知不觉十一年过去了。这十一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他都在脑海里分牌、叫牌、打牌。他也试图发现培养几个人才，却不想偌大的福州城，竟找不到一块可雕之木。

十一年没有参加任何大赛，就凭借 1985 年前积累的大师分，1996 年林孔森被国家体委授予中国桥牌终身大师称号，王石宁被授予中国桥牌大师称号。

五十五年前，海秋把桥牌带进场，原只想拉几个玩伴，改善一下单调的业余文化生活。没承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几名有天赋的知青把 52 张扑克牌玩出花样，玩出水平，竟把桥牌重新带出霍口，冲进地区，冲进省城。驰骋桥牌界，转战南北，在桥牌界成为一匹黑马，连连取得佳绩。最后以林孔森领衔，登上全国男子桥牌双人赛冠军宝座收官。霍口知青没拿政府一分钱补助，仅凭个人喜好、执着和天赋，成就桥牌国家终身大师、国家大师称号。这几位知青的不凡经历，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说他们是霍口知青的骄傲。

一场生命的接力

赵振华

一九六四年夏天，后洋工区，天刚蒙蒙亮，随着起床哨子吹响，大家像往常一样洗脸，刷牙，吃饭，出工。这一天，谁也没想到一场事故悄然而至。

傍晚收工后，18岁的陈耕畬像往常一样拿着脸盆毛巾到食堂，准备打水洗澡。由于他来得迟，很多人都洗完了澡，桶里热水已不多。他拿脸盆在大木榧里兜热水，一下、两下都没兜上水来，他觉得奇怪，便探身往里一瞧，水位已降至桶底，啊！怎么这快就没热水了？为了能拿到剩余热水，他爬到灶台上，双手托着脸盆，弯腰探到桶里。由于他个子矮又掂着脚，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整个人翻进了大木榧热水桶里！这时锅下虽没大火，但余炭仍然炙热，水温很高。可以想象这么烫的水给人的伤害有多大。当人们将他拉上时，眼前的一幕使人惊呆了：手臂及胸部以上全部严重烫伤，通红通红的一片，人已奄奄一息，令人万分惊悚！

为抢救生命，在后洋工区迅速掀起了一场抢救行动。时任后洋工区卫生员的俞美荣护士得讯后立即赶来，见状也是大惊失色，她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烫伤！她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就冷静下来，迅速地作了创面的简单处理，说：“尽快送场部医疗室！”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刻不容缓！在工区干部指挥下，紧张的护送准备工作立刻展开。

这时夜幕已渐渐降临，后洋到场部可不是一般的山路，山高路窄很难行，何况是在漆黑的夜里，又抬着担架多人同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能再有过多的考虑与耽搁，必须尽快出发。这时工区里已有多人顾不上一天的劳累，争相报名，待命在旁。“出发！”陈由贤主任一声令下，由林忠荣、林镇国、郑庆中等十个壮小伙组成的担架队很快带上手电筒踏进了夜幕。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一支生命接力队在急匆匆行进。夜，是那樣的宁静，然而这山间能平静吗？没人顾得上说话，只听见阵阵喘息声，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为了同志的生命，他们不顾眼前的困难，奋力向前！向前！奏响了一曲不朽的战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本该要一个多钟头的山路，他们仅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安全地将伤员抬到了场部。早已等候的场部领导及医生周祖民、护士游永碧迅速展开救治……夜已深，四周只有蟋蟀和青蛙的鸣叫交响乐，人们多已进入梦乡。然而在后洋工区，还有好多人难以入眠，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场部的消息。艰难困苦中兄弟般的同志情谊使大家彼此牵挂！

电波随着夜色把这突发消息传到了百公里外的福州，家人闻讯真是着急啊！现在怎样了？有生命危险吗？孩子的安危时刻牵挂着父母及亲人们的心。

所幸耕畚的母亲是医务工作者，在市一医院任护士长。在医院通力协作下，清晨，一辆搭载着耕畚父母的急救车从医院疾速驶出，朝罗源急驰而来。

这边场部领导也迅速地雇来当地年轻的农民，组成了担架队。安

顿好伤员，立即上路了。三个多小时奔波之后，他们终于在飞竹将伤员送上了及时赶到的救护车。拉着警笛，车子向福州急驶而去……一场抢救生命的接力井然有序地延续着。

由于抢救及时，处理得当，加上市一医院的精心治疗护理，几个月后二度烫伤的陈耕畬康复出院了。消息传到场部，传到后洋工区，大家一片欢腾，为了挽回同志的生命，我们努力了，我们做到了，再苦再累也值了！

不久，我们迎来了愈后重返后洋工区的好同志——陈耕畬。



逮鸭记

赵庆森

1964年春节临近，林场决定放探亲假，让我们上山下乡知青首次回家过年。我们该有多高兴、多兴奋啊！于是大家都忙着准备回家的年货。带些什么好呢？对，山区农家的土鸡土鸭最好了，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散养、走地、吃稻谷、野虫，喝山泉长大的。这纯天然绿色的土特产带回家孝敬父母，他们一定高兴。分别五个月，我真想家人啊！

傍晚收工后，我跟几个男生到离场部五里远的大王里村农民家买年货。这家阿婆养了几只鸡仔，可个儿都太小，我看不上眼，正想转身离开，一只白白胖胖的大番鸭摇摇摆摆地从后厅踱出来。嘿，这头不错，红鼻子，白羽毛，还有金黄色的脚丫子，太漂亮了！个儿也够大，就是它了！可阿婆说，这头不卖，要留着作种的。磨了半天，还添加买了她家的几斤地瓜粉，才勉强同意把鸭子卖给我，称了一下，呵！有5斤重！花了4块多，这4块钱放现在就一把青菜的价格，可那时我得干五、六天活啊！鸭子到手，阿婆用稻草捆住它双脚，我小心翼翼地抱回了场部。先把它关到宿舍的楼梯间里，便忙着去找竹篮子。待我把篮子找到想把鸭子往里装时，谁料到鸭子挣脱了稻草绳子，跑到操场上。我急忙追上，正想一把将它抓起，这鸭子抖了抖翅膀，竟然噗嗤噗嗤地腾空而起，飞得无影无踪！我在城市里长大，从不知

道鸭子还能飞得这么快、这么高、这么远！我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看着鸭子飞走了，我无能为力，怎么办？急得我都快哭了。这时一队的队友们听说我买的鸭子飞了，顾不上吃晚饭，都跑出来帮忙。有的到附近农民家询问，有的到田地里寻找，可鸭子就是无影无踪。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也只好无奈地叫大家回去休息。那一夜，心疼的我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清晨，炊事员连德宽到溪边挑水做饭，发现溪中有只大白鸭，悠然自得地在水中游着。他赶紧放下水桶，跑到宿舍，大声喊道：“快起来，鸭子在溪里！”我们队里的男



女同学一窝蜂冲到溪边。有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比较有经验，他把我们分成两拨，一半人守在溪这边，另一半人撑排赶到对岸，大家手拿小竹竿、木棍一边大呼小叫，一边严阵以待。也许是动静太大，那鸭子一转眼窜到溪边草丛里不见了。还好队友陈永健拿着长竹竿在草丛里扑打。一会儿，鸭子被逼出来了，它扑打着翅膀朝对岸飞去，对岸的人“哦！哦！”地吆喝着，用竹竿拍打着水面，鸭子见势不妙，转头又飞了回来。这边队友也挥舞着手中的棍子、竹竿高声呐喊，鸭子在溪的两岸来回飞了几趟，终于体力不支，瘫趴在水边，被几个快步赶的男生死死地摁在沙滩上。

鸭子找回来了，我拿了根小麻绳，把它结结实实地绑在树下，上

边扣着压了块砖的箩筐，这下它跑不了了。两天后，我高兴地带着这只大鸭子回家过年了。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事我总是难以忘怀！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虽然生活很苦，但它让我成长，让我见了世面，更让我感受到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姐妹的知青情谊。



踏遍青山

陈浩胜

霍口场人都有一双飞毛腿、铁板脚。每天上山下岭，挥锄劳作，肩挑背扛，无不需健壮有力的腿脚。经过几年锻炼，个个都是身轻如燕，步履矫健。

1967年临近国庆，外边的“革命”轰轰烈烈，有关“文攻武卫”的消息甚嚣尘上。福州到各地的长途汽车已被迫停运。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留在这场里也没什么事干，受好奇心驱使巴不得马上回去看看这“热闹”的场面。



单孔拱桥——霍口久安桥

当时有点无政府，离场也不必请假。沈植孙提议趁着现在行动自由，回家玩玩也看看国庆如何？好，一拍即合，我们没有做什么准备，第二天下午4点，吃过食堂蒸熟的半斤米饭和“铁片”海带汤，我和

方高登、王石宁、陈大淞、沈植孙、吴榕生等六个人便踏上了回福州的征程。

从罗溪工区出发，划竹排到对岸，路过场部，不走操场，从农田边的小道直奔霍口而去……一路无语只顾埋头疾步。一小时后，岱江被甩到身后。大家的心情也很放松。跨过古朴的单孔拱桥——久安桥，开始攀登霍口岭。千级石阶坎坷不平，比起所谓的飞竹“啼哭岭”，其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才九月底，但山区的傍晚，秋风瑟瑟已颇有点凉意。登到半山，内衣已渐湿，竟觉冷了。大家相互提醒趁着天没全黑快点翻过山去，走慢了会着凉生病的。大伙紧赶慢赶，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往上爬……

天黑得很快，瞬间窄小的山路已被黑暗吞没。夜幕下，只好放慢脚步。我们带了两只手电筒，一只在前边引路，另一只在后边压阵，这就是“前照一，后照七”。走着走着，前边突然停了。只听“啪”“啪”两声！原来是领头的王石宁打死了横在路上的一条青竹蛇。几年山区生活，知道出门要带根竹子，就是对付这爬虫的，不然被咬到可就麻烦了。山间不时出现的野兽的各种叫唤声，也让人心惊胆战！

翻过霍口岭，走过大片开阔的农田，已近夜深。身边也没水壶，口干舌燥，便在路旁捧着岩石缝隙滴下的泉水喝上几口，顺手也洗了把脸，顿时倦意消退，精神抖擞。

往前不远有个叫“梓山”的自然村，隐隐约约能看见昏暗的灯火。大家心里明白，千万不能打手电筒，别让村里的看家狗发觉，必须悄无声息地通过。因为当时“武斗”厉害，农村也是草木皆兵，万一被

人当作“对立派”给扣下，说不定还有性命之虞。几个人蹑手蹑脚，“做贼”似地匆匆溜过。顺便说一下，这个村的民兵警惕性很高。有一次陈大淞与林家泉回福州半夜经过这里，民兵喝道：“哪里来的？”家泉答：“基隆！”“哪里基隆？”“台湾基隆。”结果被扣下。第二天审完才放走。平日爱信口开河的家泉，这次可是自找麻烦，没事找事啊！

紧张过后松懈下来，大家开始感到饥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才后悔事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若是出发前，从农民家买些田埂豆，炒几把放兜里，也不至于现在饿肚子了！

夜半时分到了店坂桥（即状元廊桥，俗称多桥亭）。这是一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廊桥，全长 32 米，是福州最大的木质古桥。在桥上

歇了一会儿，有人用电筒照了照亭边的碑文。我又累又晒，眼都难睁开，也没心思凑前去看写的到底是什么文章，靠着柱子差点睡着了。



“嘿，嘿，走了！”我迷迷糊糊起身又跟着走。没多久，不知是谁“扑通”一声地摔到地上……大家都像梦游一般，昏昏沉沉，脚酸疼得也不怎么听使唤，只是惯性地往前移动。

天蒙蒙亮，我们到了日溪乡。这里古木参天，溪水潺潺，农家的

炊烟袅袅，梯田上飘着一层薄薄的白雾，雄鸡的啼鸣犹如赛歌，一声高似一声，真是仙境一般的村庄！

饥肠辘辘的我们经村民指点找到了供销社。大家打算买点吃的填一下肚子。可惜来得太早，供销社还没开门，我们就在店门口坐等。令人扫兴的是：等了半天店门打开，里边竟然连块饼都没有！只好忍饥挨饿继续往前走……

半小时后，来到黄坑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吴榕生忽然席地而坐，有气无力地说：“走不动了，受不了了。”“宁可死在这里！”真有点“躺平”的味道。无奈，大家只好连拖带拽地把他拎起来。此时天已透亮，和煦的阳光洒在翠绿的草地上，林中画眉鸟悦耳的歌声，回荡在静谧的山野。或许是过饥失饱，或许是临近故乡的喜悦，此时的我们竟已不觉得饥饿，也不在意裤脚全被露水打湿，沿着村道边聊边走。在一个叫“下寮”的村边小店，每人花5分钱买了块大饼充饥。大家狼吞虎咽，三两口咽下肚去，榕生还差点噎着了。我从没想到这糠饼竟会如此美味，至今还念念不忘！大



约十一点钟到达了岭头——福州公交区间车车站——也是我们辛苦跋涉十几个小时徒步近80公里的终点。想到马上就可以坐车回到福州，大家都很激动，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从岭头到福州乘公交车只要三毛六。如果从县城走，飞竹到城关

九毛五，罗源到福州二元四毛五，而且每天上午只有一班车，我们必须和县招待所过夜，住一晚八毛，加上吃饭，又要一元多，算下来总共要多花四、五元。一天辛苦换来五天工钱，值！后来岭头公交车延伸到日溪，到福州车费九毛六。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少走20多公里，即便多花六毛钱，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更多的场知青回福州选择了以步代车。这是后话。“没走这一程，不算霍口人。”有人如此评说。

中午在岭头饮食店吃了一毛五一碗的兴化粉，虽然只撒了几粒葱花，没多少油水，但大家仍吃得津津有味。等待的时间很是难熬，幸好没什么生意的店二娘跟我们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半左右，破旧不堪的区间小公交终于姗姗而来。乘车1小时到福州茶亭公交总站，时已四点多，整整24小时的爬山涉水！

出了车站，迎面走来一队年轻的游行示威者。领头的人高马大的壮汉，挥舞着红旗，旗上是几个飘逸苍劲的黑色大字：“xx战斗部队”，后边的人涨红着脸振臂高呼“革命无罪！”“毛主席万岁！”队伍里时而有人将小传单抛向路边人群……南门兜沿街用粗木板钉成的栏板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厚厚的一层盖过一层。

挤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我们这些从寂静山沟里回来的人，一时还缓不过神来。大家相约：回家好好休息，后天上午九点在东街口相聚逛街再慢慢看。正说着，突然高楼上“啪”的一声枪响！抬头一看一条打上腥红X号的巨幅标语从天而降：“有来犯者，自备棺材！”吓得我们赶紧散了，头也不回地往家奔去……

我为围垦出过力

陈行焄

70年代初在“农业学大寨”的大环境下，罗源县委提出向大海要田，规划在罗源湾松山迹头，通过尾屿、二屿、三屿到巽屿，围垦造田3万余亩，其中农田2万多亩，其他为水产养殖用地。

县委一声令下，从各行各业抽调人员组成罗源松山围垦工程指挥部，并从全县各公社大队组织农民工参加围垦劳动。

1975年初，霍口场抽调领导欧鑑干及部分员工参加指挥部组建。林发仪被分配到施工科，我被分配到办公室，陈世清、孔永生和邵吉生分配到后勤采购组。几年后又陆续抽



调了孙朝和、施琯榕、林则禹、郭葆玉、阮家和、郑珅、陈燊、陈新学及许琛等同志加入围垦指挥部工作（时间长久，名字已记不全了）。指挥部设在巽屿，组建之初生活艰苦，吃大食堂、住庙宇、打统铺，一两年后建起工棚，条件逐渐改善。

围垦期间，平均每天投入民工两三千人，最多时达到五千多。当

年没有大机械作业，都是肩挑手刨外加货船、板车。国家给民工每天4毛钱的补贴，报酬是实行工地记工评分，回队参加分配。经过全县上下五年多的艰苦奋斗，于1980年围垦初具规模。二屿中间已开挖十几米深、几十米长的闸基，准备修建排水大闸门。迹头到巽屿几个小岛屿开挖填海大部已连成片，只剩中间100多米缺口未堵上。期间，令我难忘的是那年夏秋之际强台风来袭，各部门都在防台抗台。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和工地林宇从副总指挥穿着雨衣顶着狂风暴雨从巽屿经三屿到尾屿检查抗台工作，在尾屿安排好人员离开后我俩前脚刚离开，围堰在强风袭击下突然决口，一、二分钟时间海水灌满了十几米深的基坑，我们为此惊出一身冷汗！要是迟离开一会儿恐怕就葬身海里了。

迹头村原意为人迹罕见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改名为古蹟的蹟，叫“蹟头村”。巽屿与北山是闽东地区红色革命根据地，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志士被残酷镇压。开挖三屿时发现众多无名尸骨，指挥部专门派人买了很多金瓮收拾遗骨。在向着大海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建了集体墓地，我也参加过这项工作。这些被残杀在三屿乱葬的革命先烈遗骨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安置好。

我在围垦工作五年，尽心尽力，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经因劳累过度导致胃出血，输了1200CC血，还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胃，这也算是我为罗源县的建设付出的心血吧！

1995年6月在宁德水利水电工程处机械施工队帮助下，历经二十年的罗源松山围垦工程终于大功告成，胜利竣工。2400米长的围堰大

堤围出了闽东地区最大的 3.46 万多亩人造平原。

改革开放以来松山围垦的数万亩土地经招商引资建成了省级经济开发区、可入住十万人
的海滨新城及闻名省内外的罗源湾海洋大世界等旅游景点。迹头这个小渔村也建起了海上餐厅、水产
养殖基地及鱼货码头。
松山围垦及其后来的发展是罗源县改革开放成果的真实写照。



罗源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已旧貌换新颜。“十三五”期间，罗源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 316.6 亿元，连续迈上两个“百亿元台阶”。获评“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魅力示范县 200 强”“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县”“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等称号，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和跨越。我们霍口场人，在这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变革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将永远记载在罗源发展的史册上。

我这六十年

张亚淦

一九六三年我二十岁。九月一日我没能如愿到大学报到，是和几十位高中同学以及学弟学妹一起，到闽东一个不出名的山旮旯——霍口务农。这一天成了我一生分界线，前二十年我成人不成才，后六十年我踏入社会，阅尽人世千姿百态，尝遍生活酸甜苦辣。我的故事就从这后半生说开去。

霍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破落的农舍，半荒的农田。四、五岁的男童还光着腩，露出两条脏兮兮的小腿。不论大人小孩，常年以番薯米为食，只有男人干重活时碗里才有薄薄的一层大米饭。我不知道，我们这些没有什么知识的“知青”有什么作为可以帮助农民。当我们身穿父兄褪下的衣服，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农舍时，引得农民惊呼：劳改犯又来了。在他们眼里，我们背井离乡，境遇不比本地居民强。

下工区不久，公布了知青的待遇。微薄的工资要花一半吃伙食，刨去买牙膏肥皂煤油，所剩无几，小心攒起来，留着春节回家用。对我们来说，春节回家意味着团聚、美食、逛大街。没有比这更令人心动的快乐了。一位姓来的小伙子，假期结束回场的第一天就开始下一次春节倒计时：还有 350 天，还有 349 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就在无聊、劳累、期待中流淌。忽然有一天，感到自己长大了，到

了恋爱结婚的年龄。这才发现，这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女比例5:1，有一半的姑娘外调外嫁，剩下的大多名花有主。小伙子们暗地里着急，盼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徐重工区还真有这么一位林妹妹，她叫林有庄，长相端庄，身材高挑，是业余的跳水运动员。她和高士中高中同学，两人一起上山下乡，同吃同玩同劳动，形影不离。一九六五年，林有庄调到兵工厂，两人社会地位悬殊，有人猜测他们的关系要黄。林有庄初心不变，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嫁给高士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霍口“知青”一段爱情佳话。在爱情力量鼓舞下，高士中奋发图强，自学成才，被调到师大附小，成为英语教师。不久林有庄也调回家乡，结束了十二年两地分居的生活。

一九七六年秋，我被调到百丈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时，工程已初具规模：水库、引水渠道、厂房都已建成，正在进行机组安装。水电站建成投产后，将是全县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年轻人以进水电站工作为荣。霍口一批知青先我进厂，正在大目溪水电站学习技术。他们是未来水电站的正式工人。而我是借用，实行三不变：知青身份、户粮关系、工资待遇不变。依我的条件，能让我一条腿迈进来就不错了，今后能不能和大家一样，就看我的努力了。霍口知青们在这里学习努力，能吃苦，广受好评。刘友萍通过其在福州自来水公司工作的先生，购置了市场紧缺的80公分大口径压力输水管道，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在工程上下造成很好的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条百多米长的钢铁巨龙，仍然昂首挺胸屹立在百丈的悬崖峭壁上，诉说着刘

友萍们的功绩。

一九七八年初，我二哥的同事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堂妹小吴。小吴在农村当播音员，并不介意我“工资不高成份高”，这令我感到意外并对她怀有敬意。我们很快结婚了。年底女儿呱呱坠地，只有6斤重。望着她营养不良的小脸蛋，给她起名“晴”，希望她的人生道路艳阳高照。女儿出生三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这次今后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重要会议，一般老百姓没有过多地关注。打击办对投机倒把照抓不误，农村对包产到户照批不漏。妻子农村户口，我的户粮关系在罗源。没有票证，不供给产妇一滴油一两糖。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妻子得了乳腺炎，女儿吸不出奶，遭受了人生第一次考验——断粮，饿得哇哇大哭。我跑了小半个福州城，从朋友家讨到半袋救命奶粉。关键时刻，娘家人送来蛋、鸡、线面等食物，解了燃眉之急。

进入八十年代，大地微微暖气吹。父亲平反了，过上正常人的退休生活。一九八四年我正式调入水电站，此后好事接踵而至：电大毕业、转干、妻女农转非、妻子安排工作、评经济师、分房……真像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我逐渐适应了电力公司的工作，从车间调到公司。

一九八七年电力公司走企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上等级管理。所谓上等级，就是要求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等在现有的基础上，登新台阶。公司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升级办，我任负责人。升级工作要求企业的发电量、供电量、利润、安全、设备完好率等达到新的标准。

对职工素质、规章制度、档案台账也有严格要求。比如规章制度要装订成册，有的要入框上墙，挂警示牌……最难的是生产经营方面硬指标的上等级。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还要投入较大资金。比如降低线损率，就要减少无谓的损耗，对内取消职工用电优惠，对外推广智能电表，防止窃电，这是要花钱的。公司决心很大，上等级坚定不移。经过几个月努力，上等级工作卓有成效，利润明显增加，各项指标也有进步。第二年通过上级部门考核，实现了上等级的目标。职工每个人增加半级工资。有职工给上等级编了个打油诗：

企业上等级，
机器刷油漆。
制度挂墙上，
工资加半级。

上等级完成后，升级办升格为企业管理股，我任股长。上世纪九十年代，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免去公司老经理的职务，换来化纤厂厂长任经理。新经理对老经理不待见，撤销了企业管理股，把我调回办公室干老本行——文秘。我的“仕途”就此结束。新经理还算给面子，保留我中层管理人员的奖金，“享受股长级待遇”。没有最好的工作，只有最适合你的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文字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没有什么压力，也比较自由。

我自小爱习文，梦想当作家。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后在《福建日报》《福州晚报》上陆续发表过三篇文章后，觉得当作家不易，还是做个文员吧！我每年要起草几十份通知、请示报告、公函、会议纪

要、工作总结等文件，处理百多份外来文件。我是《福建电力报》《福州电业局通讯》的编外记者，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我喜欢我的工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的论文《评价小水电应侧重考核投资效益》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电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应邀出席在四川省都江堰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处级领导、教授专家。会议接待规格较高：专车机场车站接送、住五星级宾馆、三餐丰盛、游览都江堰、青城山……让我这个来自基层的普通人大开眼界。



进入二十一世纪，电力工业开始进行重大的改革。首先实行“厂网分离”，发电厂、水电站从原来的电力发供销一体化经营中独立出去，与电力公司成为买卖关系。罗源百丈水电站等四个发电站组成发

电公司，原来的电力公司只经营电力供、销。“厂网分离”后，省网加大了对罗源县网的投资，建设了几座 35 千伏、220 千伏变电站。二〇〇二年底，公司经理因经济问题被免職，从福州调来新经理。新经理上任后，调整了领导班子，并接手农村电网体制改革工作，县里成立了农网改革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农网改革有两大任务：改造旧电网和建立新的农网机构。按改革要求，一个区域（县）只允许有一个供电机构，原来各乡镇的电力站被撤销，由电力公司的变电站代替，电力站的员工转为农电工，站长成为变电站站长。农网改革给农村和相关人员带来利益，受到广泛好评，顺利通过考核验收。电力公司挂牌供电公司，成为国家电网福建省网的下属单位。罗源供电公司归属省网后，职工的福利待遇有了提高。但我行将退休，赶不上这趟快车了。此时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启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离开霍口几十年，有几次梦见那里的青山绿水。最近几年关于霍口的消息越来越多，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建水库。一座拦河坝横空出世，锁住岱江两岸。不久以后这里高峡出平湖，会出现清粼粼的人工湖，变幻出美丽的风景名胜。我的富有想象力的知青朋友们，提出在上山下乡六十周年之际建知青林的倡议，得到广泛的热列支持。大家希望让年轻的林木，接替我们守望这片我们奉献了青春的山山水水。

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队

陈宝霞

1964年下半年，在肖锦华书记的倡导下，霍口油茶场的技术队成立了。成员是以参加福建农学院函授学习的知青为主体，抽调徐重工区各小队的有关人员组成。第一任队长是林世洛，他调往寿山果牧场后，由刘兆驹接任，我任技术队政工员。

技术队刚成立，全部成员都去参加位于福安社口的福建省茶叶研究所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一个月时间的培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有专家授课，又有技术人员带领参观及实际操作。培训时间虽短，学习内容却很丰富，我们获益匪浅。



培训回场后，技术队的同志如虎添翼干劲倍增，满腔热情地投入生产第一线。

当时，场里开垦新茶园都是雇用古田县的师傅，他们开垦出来的茶园，每层总是起伏不平，不利于水土保持和简单的机械耕作。技术队向场领导提议，自己勘测设计茶园。林世洛带领技术队“现炒现卖”，在徐重后山利用自制的“水平仪”，“两脚规”进行测量，设计出了标准的新式茶园，得到古田师傅的称赞和场领导的肯定。

当时，场里的种茶所需的茶苗，都是从古田县采购来的。由于山路崎岖，运输困难，茶苗从古田杉洋肩挑至罗汉洋费时费工，成本较高。技术队向场领导请战：自己培育茶苗。1965年春节后，技术队在罗汉洋摆开战场，建立了茶苗扦插基地，将培训班学到的技术原原本本地应用在茶苗扦插基地上。经过一年的精心管理，培育出翠绿粗壮的茶苗。队员们欢呼：我们成功啦！

技术队利用土壤速测箱对新开垦的班地做土壤酸碱度的测定，为场领导拍板是种茶或栽果，有了较科学的依据。对已种植的茶、果的地块，进行土壤微量元素的测定和分析。为合理施肥节约成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应用土壤生态理论和红壤改良利用相结合，为红壤的开发和改良做了示范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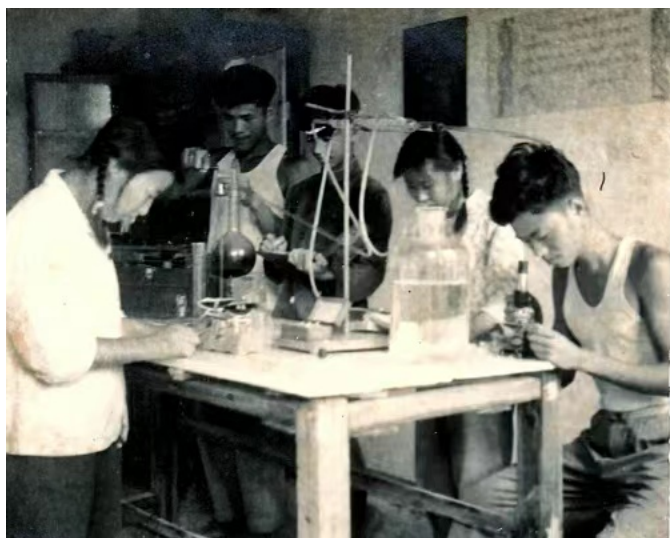
为了保持茶园的水土，技术队对茶园进行改造，在茶园梯层的后壁广种爬地兰。它藤蔓生长快速，能覆盖土壤，保持水分，防止土壤流失。在茶园梯层后壁的下方，挖沟蓄水保墒，防止水土流失。技术队还大力推广农家肥。上山采集绿叶野菜，与猪羊粪混合，放在土池中沤制发酵。沤制出的有机肥，富含腐殖质，施用在茶园或果园里，既增强了土壤的肥力，又改良了土壤。

老茶园经常发生蚜虫病害。技术队用从培训班学来的功夫，熬制高效低毒的石硫合剂。有效地杀灭了蚜虫，制止了害虫的肆虐，增加了茶叶的产量，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技术队还建立了小型气象站，在徐重工区后山架起了百叶箱。气象观测员由郑坤和我兼任。无论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都坚持每

天三次定时监测温度、湿度。重任在肩，敢于担当，踏实工作，认真做好监测记录。后来整理出了一套气象资料。我们还走访当地老农，搜集气候谚语。根据监测数据，结合谚语，做出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为工区主任安排生产作参考。

实践出真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践才能出真知，才能事半功倍。否则是盲干，是瞎折腾。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队员们，深感学习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白天劳动再苦再累，晚上都抓



紧时间，努力学习。从1964年春季农学院开办函授班起，在昏暗的自制的“煤油灯”下，我们常常攻读到深夜，以便迎接每学期半个月的面授和考试。特别是农学院六十年代唯一的女教授——蕨类权威李舜旬亲自

给我们上课（很多本科生都没这个机会），更激发了学习热情，大家都希望从函授学习中尽快地提高自己专业理论和技术水平。

然而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1966年下半年，已近两年的函授学习中断。1984年，随着科学的春天来临，函授学习恢复。大家参加了最后一次面授，每个人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兆驹、陈宝霞、翁尧坤、黄承东、林琴、林海、郑坤、谢劭生及薛聿彰九人经考试合格，领到三年制大专文凭。后来各自又获得了专业技术职称，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专业人才的聪

明才干。

技术队人数虽少，涉及学科门类却较多。他们科学为依据一直活跃在工区的生产第一线上，把学习的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对霍口油茶场的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科学经营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为指导生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技术队是一支很有特色的队伍！



怀念几位“先睡”的友人

意 戈

1963年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向邢燕子学习，走上山下乡闹革命的道路。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充满了对未来的好奇与憧憬，毅然决然地响应号召奔赴农村和山区的建设之路。许多人还背着父母迁移了他们的户口。我们怀揣革命的热情，决心在农村和山区大干一场，报效国家。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时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在那十多年的激情岁月里，我们遇到了很多相知、相识而成为知己的朋友，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我们有过美好的时刻，也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岁月，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这一辈人才有深刻的体验。

六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年轻人的影子，虽然依稀可见，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只留下片段深刻的记忆。我在脑子的档案里搜寻过去留下的记录，在这里我只有用伤感而又令人不可忘怀的言语来记述几位比我先“睡”的友人（基督徒通常称逝去的人为“睡”了）。

金铭，这是一个年龄小我两、三岁的活泼的年轻人，他体格健壮，喜欢游泳、打桥牌。人很聪明，性格开朗。我喜欢看打桥牌，与金铭经常会相处在一起。金铭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是因为他救过

我的命，而自己却在青春年华的 20 来岁先我而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我们徐重工区的山脚下，有一条不大不小清澈碧绿的溪流，我们大家都叫它“徐重溪”。这条流过徐重山脚下的溪水可以分成两段：上一段是比较湍急的部分，而下一段则是水流比较舒缓平滑的鹅卵石滩。上一段之所以比较湍急，是因为溪流当中有两块大礁石深插到溪底，这两块礁石在水中间隔约 20 多米，分别都有高低不平的部分露出水面。因此，溪水从这两大礁石中间流过的时候是很湍急的。

我们徐重的男女青年，到了夏天，收工或者周末休息的时候，就会来到这两个大礁石露出水面的部分晒晒太阳或者下水游泳。而那些水性好，游泳比较棒的，就喜欢在这两大礁石间穿梭来回，看看谁的次数更多。

更有甚者，那些水性特棒的帅男美女，在山洪爆发的时候，跑到上游更窄小的我们称之为“三亩三”的地方，纵身一跃跳入浑浊的黄色溪流之中，奔腾而下，畅享漂流之快感。

而我这个美男子——现在移居“美”国的“男子”，虽略懂游泳，但水性不是很好。偶尔也会随着大家在两大礁石间穿梭几次，在炎夏消暑凉爽一下。

有一天我随着大家在两个礁石当中游来游去，我不记得当时都有哪些人，总之大概有七八个吧，而其中就有金铭。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下水游一个来回就到礁石上面休息片刻。随后，我又扑通跳下水，游到当中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慌了神，手脚只会扑通扑通地打水

不会游了，水开始呛进了我的口鼻，同时也随着湍急的水流往下游飘去。我更加慌乱，开始呼喊：“快来呀，快来呀！”而坐在石头上面的那几个人以为我在开玩笑，所以并不在意。于是，我便急促大声地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声音已经凄惨到变样了，那些人仍然无动于衷。这时只有金铭发现我的喊叫声有点不对劲，立即“扑通”一声跳下水，朝我飘去的方向快速的游来，很快地就靠近了我，拉住我的手，这时已经离我下水的地方有几十米远了，他托着我缓缓的向岸边游去，不一会儿就游到了岸边，就这样我脱险了。

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驻扎在省农业厅办公室里面。不幸的一天突然降临：那天金铭在上楼时，被窗外流弹射中，子弹正好穿透他的心脏，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当我得知这个噩耗，来到他的尸体旁边，我扑倒在他的身上，摸着他的脸庞，呼天抢地的哭着：“金铭啊，金铭……”很久很久人们不能把我拉开。这真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往事，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叶与德，福州二中高三（6）班毕业生。这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是个思想敏锐、平易近人、办事沉稳、风度儒雅的人。他富有灵感、喜欢写诗、喜欢自由，对现实世界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也是一个对文学、电影，美术颇有造诣和学问的人。在徐重工区，我们两个人住在第一栋石头房的同一间宿舍里，成了室友，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学到了许多知识。比如说在谈论电影创作方面我懂得了什么叫蒙太奇等。他喜欢研究马

列，看《政治经济学》。有时也经常会与我研讨一些哲学上的问题，甚至爱情问题。而他更喜欢写诗，常常会有新的作品出来，几乎是每天一首，所以，我常对人说：“彼得（我对他的昵称）一天下一个蛋。”还记得其中有一首我较为喜欢的诗，是这样写的：

《维纳斯啊！》

心儿沉睡了，
他的心不肯醒来，
深深地刻着往日的悲哀。
它磨起了一层茧，
再不激动啦，
滴血的创口也盖上了疤。
它不会敞开，
封锁住一个世界，
把我关闭在门外。
柔弱的睫毛遮不住眼泪，
我哭泣着祈求你，
维纳斯啊，
让我去到它的梦中呼唤它！
它像汪洋中的礁石，
忍受我风吹浪打，
不幸使它坚硬得可怕。
维纳斯啊——

你万能的箭为什么射不中它？

转过你感动一切的眼波、张开致命的弓吧，

我每一滴眼泪都是为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们经常阅读的是世界名著，所唱的歌也是世界名曲，吟诵的是俄罗斯普希金、德国海涅和英国拜伦的诗集等等。我们也经常会探讨艺术文学方面的话题，在他的熏陶下，我也学会了写诗。用“意戈”作笔名，写了不少诗，赢得了当时徐重的美女之一、“健壮的像一匹母马”似的彭潭安（这是叶与德对她身体之棒的比喻）的芳心，终于成了我的妻子。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1975年正当他“而立之年”的时候，竟选择了了结一生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几种因素是可以肯定的：一、当时他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手术后的跛脚后遗症和痛苦折磨着他；二、迷茫的前途、失恋以及家庭方面的问题困扰着他；三、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世界理想化的破灭以至绝望，这只有了解他的我能够知道，但只能烂在肚里不便写出来。

我想，这几点应该才是促使他做出了结一生的决定性因素吧。而使我略感内疚的是，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但竟然没有看懂他这一决定的内心世界。如果当时能看懂，及时采取措施或劝说，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信的大部分内容我已忘记，只记得他本来对我的感情生活很看好，却在信中劝说“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而信的最后一句话是：“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

言也善”，让我感觉到他对人生的极度悲观情绪。遗憾的是，还没等我回信，就在县里收到了来自福州的消息：他竟选择了轻生，与我们不辞而别了。接到噩耗，我的心情无比悲痛，急忙赶回福州，含泪送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令人感慨的是，我们这一代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在那个年代，有时连生命都与时代捆绑在一起，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才能知晓。

林祖渝，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身体微胖、慢条斯理、不拘小节，而又不失风趣的一位朋友。他也是高三（6）班的毕业生，在学校时就是国家二级跳水运动员、游泳好手、物理学霸。

祖渝家境比较殷实，而且他喜欢阅报，加上家里的来信常常会有一些福州乃至国家层面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和新闻，于是每到晚上许多人就围着他，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国家大事以及福州等地的新闻轶事。

祖渝和我一样都喜欢唱歌，他可是我们林场第一男低音炮，那浑厚洪亮的男低歌喉无人能比。于是徐重工区喜欢唱歌的，都要叫上他一起唱四声部歌曲。我们当时唱的最多的是《外国名歌 200 首》，如《三套车》《伏尔加船夫》《灯光》等等，来消解夜晚寂寞的时光。正是由于有我们这些爱唱歌的骨干力量，使徐重工区合唱团在场部组织的合唱比赛中往往名列前茅。有一年更是在福州市农垦系统组织的合唱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以至于被其他农场质疑我们是专业的合唱团，可见徐重合唱团的功力非同一般。

祖渝性格特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豁达开朗、不修边幅、风趣幽

默。大事小事在他看来都算什么，以至于大家都叫他“M磊”，意思是整天睡眠惺忪的样子。有时晚上走路也闭着眼睛。有一次撞到石墙，碰破了上嘴唇，他就抹上紫药水。第二天一早大家见到他怎么留了个日本小胡子呢，他却不以为然地、讪讪地说了原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那是我与他成为室友后的一天，我在修理自己的手表，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手表秒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而这时林祖渝的肚子突然疼的厉害，大家就调侃他：“你有没有把意戈（那时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意戈）手表的秒针吃进去了？赶快吐出来，你的胃痛就会好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故作委屈的、无可奈何的尴尬模样，还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的！

祖渝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就调回省华福进出口公司工作，以后就比较少联系了。后来我和妻子也相继调到省造纸公司工作了，偶尔也会与他们一家见见面，上他们家做做客。我与他最后一次的见面约在1997年，我们与几位战友相约重返徐重工区，那是我们青春时期挥洒汗水而流下心血的故地。我们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在那里住了一夜，祖渝一家也在其中。我们在徐重溪撑着竹排，在溪中游泳，吃农家饭，感受当年的味道。在徐重工区我们看到原先的食堂墙壁上还留有当年邹海秋编辑制作的海报，真是感慨万千，思绪无尽！回忆着，谈论着，久久不愿离去。

在祖渝 61 岁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美国，忽然有一天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据说是心梗，令我不胜感叹，唏嘘不已。一个跳水运动员，

游泳好手，按道理心脏应该是强大的，怎么会突然心梗而去呢？！
看来世事难料，我们活着的，都要以健康为第一要务，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心，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掌控在创造生命的上帝手中。
愿这些比我先“睡“的友人，在美好的天堂里得享永远的安息！



罗溪琐记

高荣光

罗溪工区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岱江将我们与场部及兄弟工区分隔开。故此工区的“地安楼”有“独立山寨”之称号。

十几岁的我们，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锄草、开荒、种植，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于当时刚走出校门的我们，确有不少难度。因此那时很盼望下雨天，可以歇息歇息。

刚进场时我们被分配到仙洋。劳动中没有经验，锄草很吃力，想借火来灭草，留下草木灰又可作基肥，初看还蛮有道理的。当时是雨季，草湿，点着火并非易事。午后场友吴朱信

（上山不久他就退场了），不信点不着火，就想再试一次。嘿，着了！他挺开心，喃喃地说：

“这有什么难，我一点就着了”。当时大家还很高兴的，但转眼间，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顺着山势，火苗燃起数米高，这下大家有点怕了。“不好啦！火烧山啦！”“快救火！”带班的喊叫着。大家一拥而上，拿锄头的，拿树枝的，甚至脱下工衣扑打火苗。“拿锄头的把



火苗搅散，拿树枝的打下去按住在地上拖几下”，不知哪位有经验的这样嚷着。我们在陡峭的山坡上，追扑山火，跑得上气接不了下气，都快

要窒息了。经过大家奋力扑打，山火终被扑灭。但我们每个人的脸都被烤得通红，鼻孔被烟灰熏得黑黑的，加上赤黑的手往脸上擦汗水，个个都成了大花脸。



1963年9月，福州二中、七中、二十中及女中的知青进场，我们被调到罗溪。

每天早上出工，两裤脚全被露水打湿，班长带头走在前列，湿得更厉害。锄草铲山，汗流浹背，连裤腿也都湿透，浑身湿漉漉。十点过后，在阳光照射下，衣裤逐渐被晒干，但因还没收工，所以工衣工裤总是湿了，干些，再出汗又湿了。到傍晚收工，身上留下酸酸臭臭的汗味和结了板的汗盐痕迹。

晚上，罗溪俱乐部开启。打乒乓球的人最多，排队轮上，两人对抗，输了下台，换另一个上，谁乒乓球功底强或运气好，谁就坐庄。还有下象棋的也不少，特别梁庆良，高祥琛，王石宁等人，他们棋艺高记忆力强，能躺在床上下“盲棋”。

俱乐部有时还组织篝火晚会。大家捡些柴火，夜幕下点燃的熊熊火光照在年轻人的脸上，那光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大家围成一圈，击鼓传花，花落谁手上，总要来个节目……最让大家难忘的，还要算林家全自编自演的“卷龙铁砂掌”，他耍得那么认真，前腿弯，后腿蹬，“刹着矮马”，挥舞着铁砂掌，一付执着的模样，逗乐了全场不少人。

罗溪工区俱乐部的文艺节目多采多姿，有合唱、独唱、相声、话

剧、诗朗诵、小品以及样板折子戏等等。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为参加场部的演出，往往都比兄弟工区多花时间排练。当然经过大家的努力，在演技上也有很大的提高，每次演出都得到大家的认可。张永生，陈浩胜、王石宁，



方高登，及已故的毛文标、陈增官、周志雄、许绍宽等成为罗溪工区出色的演员。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岛风云》一剧中，张永生饰演“海老大”，至今大家还这样称呼他。另外，我与胡敏美表演的《逛新城》，附近的农民都称呼我“老爷爷”，如今偶尔遇上，依然称“老爷爷”。

当时场里孝宝和惠民，在各工区轮回理发，解决了大家理发难的问题。文革中他们无辜受到批评后就没来了。于是毛文标提议：自己动手，先在他头上试剪。我大胆地在他头上动剪，发剪子刚推入他的头发，只听见他喊：“唉！”理发剪被他粗厚的头发卡住了，不能进，也不能退。我赶紧停下，想退出剪子，他仍然“唉！唉！”地喊叫……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剪才勉强地结束。但他的头发被剪得“猫抓狗咬”似的。文标老兄还笑着说：“没事，没事，下次就好了。”后来陈浩胜也加入为大家理发的队伍，我们边实践，边总结，手艺也慢慢地提高了。

当时罗溪工区团支部书记王石宁，经常深入群众，做好思想工作，使大家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团结一条心，完成了场部下达的各项任务，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到了夏天，洪水突发，交通中断，平时虽然有准备，但断粮，断菜也会时而发生。记得有次因洪水断粮，仓管员陈浩胜带上几名职工一同去场部挑米。走到船头，竹排在对岸，只好往下走到“宽带”处撑排，几个人上了排，浩胜掌杆，竹杆刚插到水底，还没来的及撑开，就被压在竹排底下，拔也拔不出来，他不会游泳只好让竹排随流而下。幸好后来竹杆被捡起，他们顺流漂到场部才上岸。还有一回断粮，陈大淞走到船头渡口，发现竹排在对岸，他只好游过去，到了场部自己挑 100 斤米回到罗溪。

文革期间，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列队操练，恰似部队一般。当时罗溪民兵甚至半夜吹起哨子，紧急集合，拉练登上又陡又峭的“后门山”。因为指导员黄时开是退伍军



人，所以他以部队的方法训练我们。队伍在黑夜中行走，白天已走过无数次的山路，黑夜里还是显得很艰难。但我们都当作命令执行，所以每次训练都圆满完成任务。

为响应毛主席横渡长江，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的号召，我们工区也曾组织横渡岱江。但那次活动选择的时间不好。去的时候天气很热，下水后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瞬间，倾盆大雨。游到对岸时，雨水打在身上感觉还很爽。转眼，溪水暴涨！浑浊的山洪从上游汹涌而下，我们被堵在对岸。“快往回撤！要不然一会儿水势会更大，快走！”说时慢，那时快，大家扑通扑通地跳下水，游向对岸。这时江水已变



成激流巨浪，幸好大家奋力搏击，几番冲刺，终于游到对岸。我因水性没他们好，心里有些惧怕。见水位迅速上涨，他们都已到了对岸，我也鼓起勇气下了水。翻滚的山洪夹带着泥沙、树枝冲击着身体，水

温时而热，时而凉。原本紧张的我，突然小腿抽筋，心里更是恐慌！我极力稳住自己，挺起胸，鼓足气，用力划水，尽量把头抬高，呼吸，心里默念着：冷静！再冷静！顺着激流一直被裹挟着往下漂……忽然，奇迹出现，抽筋的脚竟然缓解了，我抓紧时间，拼命往对岸划去。当我抵达岸边，回头一看，天啦，我竟被冲下了五、六百米，水位涨高三、四米！真是万幸啊！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

这次活动，有惊无险，古语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八十，幸逢盛世，国家富强，百姓安居，能过上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幸福晚年，知足了！

难忘徐重

二指禅

人的一生，很漫长。在记忆的长河里，能留下难以忘怀的，其实并不会太多。我的脑海里最常泛起的浪花，就是霍口场，特别是徐重工区的点点滴滴。

青石砌成的宿舍

徐重的四座宿舍都是青石砌成的。工匠们就地取材，把山上一块块大青石劈开，打成各种规格砌墙盖房的材料，另外从溪边挑选大块的鹅卵石作为辅料。短短几个月便盖好了四座宿舍及一个食堂。1964年从仙洋搬到徐重，看到崭新的青绿色的宿舍，我很诧异。上山以来没有见到哪家农民的房子是石头盖的。更何况在我的印象里，青石都是用来打成石臼，或刻成镇宅的狮子什么的。没承想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青石砌成的，太漂亮了，太奢侈了。可惜的是我们走后，人去楼空，门、窗、房梁都被拆了，青石块也被撬去。再往后，茅草肆虐，山路消失，工区荒芜，成了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当年的喧闹声已被寂静的山野所取代，徐重工区留在我心中的只有遥远的幻影。

流淌的溪水

徐重山脚下静静流淌的溪水，是我们的最爱。春天的溪边有红杜鹃、野百合点缀。七班地畔水深林密，藤蔓缠绕，在这静谧的世外桃源里每年都有十几只美丽的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清澈的溪水中嬉戏觅食。到了夏天，天是碧蓝碧蓝的，水是翠绿翠绿的。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只要趟入水中，顿感凉爽。有时撑竹排到了“三亩三”，水深数米，竹竿捅不到底，水色更显墨绿，山涧滢泉散落，溅起阵阵水花，要是喝上一口甘甜的泉水，真是沁入心肺！在这蓝天白云下，坐在摇曳的竹排上，在轻轻柔柔的水上任由它漂着，周围安静而祥和。大自然的给予使我们忘却了忧伤与烦恼……会游泳的常会下水舒展一下筋骨，很多不会游泳的，也在这溪里学会了。

返城以后，多次回到这既爱又恨的地方，相当部分原因就是为邂逅这条流淌在心底的清流。



《外国民歌二百首》

徐重的歌声在霍口场是出了名的。很多下工区的干部都津津乐道于我们三餐前的列队高歌，其实他们不清楚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二百首”。工区里有几位嗓子很好，歌声动人的朋友。像亚淦、祖渝、海秋、文久，女生有珍妮、潭安、同清、立凯等。文革前，大家无所顾忌，选的多是《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经典歌曲，如：《深深的海洋》《三套车》《可爱的家》《多年以前》《红河村》《星星索》《苏珊娜》等等。我的音乐细胞很少，可是爱听，也就跟着唱，有时滥竽充数混在他们之间上台表演。慢慢地也提高了点歌唱水平。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是这些歌曲慰藉我的心灵，缓解我的忧伤。是这些歌曲陪伴我度过了不堪回首的漫漫长夜。有的歌，我会着意改动词语，如《红河村》，我唱的是“为什么不让我和她同去？为什么把我留在村庄上？”这些歌曲永生难忘，它寄托了我们的期望、憧憬、乡愁和爱情，也宣泄了我们的悲伤、忧郁、烦恼和愤懑。我要感谢这些经典老歌，感谢我的朋友们。

文革中，有些好友因为哼唱这些民歌被批判，想想那些没文化的愚昧无知的“革命者”，真是无语！

乌头山的“兰叹”

徐重工区的西边有座远山，不知何名，大家都管它叫“乌头山”。它突兀于群山之间，只要天气变坏，山顶便被乌云笼罩，不大一会儿，总有阵阵山雨飘落——这是当地农民的经验。所以，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西边的“乌头山”。早饭吃罢，要是看不见山头，大家便兴高采烈地鼓动工区主任翁爱诚：看见妹，乌头山山岗毛“兰叹”（罗源话）！爱诚看了看天，嘴里叽咕：哼！你们这些家伙又想偷懒！但见他举起罗源锄往石头上狠地一敲，大声吼道：“出工！”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哨子，鼓着腮帮子使劲“嚯嚯”地吹，一边只管低头迈着大步朝前冲。后边跟着一群拖着锄头心怀不甘的游兵散勇，嘴里喋喋不休地骂着：“淋死你！”“累死你！”……

“三十边”的人，成天想的是离开霍口场，回城，上调，成家，对出工除草早已没了兴趣。更何况，雨天工资照发，谁不渴望下雨？

后来，场部生产组为了各工区如何界定“雨天”，统一规定了标准：屋檐下有水滴。据说，这还是我们工区技术组的大专毕业生出的主意。从此，“乌头山气象观测台”完成了它的使命。“二赖盍”们的“好日子”结束了……

敏捷的与文

不记得那次演出的时间与地点，但事情却牢记在心。那是与文和

我合演的节目：“对口词”。这在文革年代很流行，一人一句，配上夸张的动作造型。蹦蹦跳跳，打打杀杀，风风火火，铿锵有力，这样的文艺形式现在是绝迹了。

甲：“看，红旗漫卷东风！”

乙：“听，惊雷响彻五洲！”

甲：“我们要超英赶美！”

乙：“我们要解放台湾！”

听到“解放”二字，后边声音有点含糊，忽见一排白色的东西从他口中飞出，啪，落在地上！我瞄上一眼，啊，是他的假门牙！演出哪能突然停下？我还是继续我的台词：“我们要大闹革命！”他猛地向前跳了一步，一把抓起假牙，瞬间塞进口中接上台词：“我们要狠抓生产！”这个“抓”字比平时排练时声音更响亮，时间也拖长……旁边的几个队友看得目瞪口呆，观众还以为这是为了演出效果特意设计的动作而热烈鼓掌！他们压根儿没有发现出了什么意外。演出顺利结束，他的沉着冷静，反应敏捷为队友们所津津乐道，长久不衰！

工区的狗儿们

我从小喜欢养动物，什么兔子、乌龟、鸽子、金鱼、猫头鹰、白老鼠、蚕儿、蟋蟀、八哥等等，只要家里不反对，我能搞到的，都会认真养起来。只有一样家里不让，那就是养狗。因为怕伤人，怕影响四邻休息。到了霍口，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我自主干的第一件事，就

是买条狗，以了却年少时的心愿。花8毛钱（大约一天的工资），从仙洋农民家买了只土黄色的“菜狗”，取名“沙巴嘎”（俄语，狗）。之所以叫菜狗，不是这狗光吃蔬菜，而是指它的智商太“菜”，太低下。长大了，只能宰了吃，如同“菜鸽”“菜猪”一般。不过，话说回来，在那艰难时刻，我们自己都吃不饱，拿什么喂它？说真的，我都不记得是否给它喂过什么，也没有准备属于它的窝，更没心思训练它。所以，它似乎不怎么认我这个主人，对待我跟其他人差不多，不冷不热的，连尾巴都懒得摇几下。一天到晚在工区里闲逛，不会惹事，不敢跑远。自己找吃的：老鼠、小鸟、蜥蜴等等小动物都是它搜寻的对象。自然，番薯皮之类厨余也吃。有次带它去溪边，想给它洗洗澡。怎想这家伙怕水，晕“船”，趴在竹排上，颤颤巍巍，肚子阵阵收缩，吐了一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家护院原是狗的本能，可是它不会，不知道是不是饿得叫不出声还是怎么回事。几个月后，长大了，进了我们的胃，我也不觉得太可惜。

工区里后来有人养了两只白色的小狗，瘦瘦小小的，不太可爱。有一天，被杀了，泡在热水里，瞬间变成白底黑点的花毛狗。凑近一看吓一跳，原来浑身是跳蚤，除了身上斑斑点点，水面上还漂着一些，太恶心了。难以想象狗狗平时如何忍受这群讨厌的虫子的侵扰。

不久，队友林淇从福州带来一只叫“Come in”的狗狗。它的品种不错，短腿，宽肩，舌头上有块黑斑。农民说这样的狗“有腊”，能狩猎。它总被拴在三座后边的屋檐下，很寂寞。看到我来，会站起来双脚抱着我的腿，猛摇尾巴，像是在恳求帮它解脱。它忠于职守，遇

到生人，狂吠不止。据说，因为品种好，被山下农民相中，换回几只老母鸡。至于“Come in”当了上门“女婿”后，生活是否幸福，有没有生子添孙，始终没有消息，但愿它一生平安吧！噢，狗的寿命只有十年左右，想必它早已化作徐重脚下的一抔黄土了。



夜闻虎啸

陈永健

大约是 1964 年的上半年，我们场部和船头工区的七、八十人奉命支援恩顶农场生产，为期半年左右。记得是张文勳同志带队。生活工作都有点准军事化管理的味道：起床、出工、熄灯等均以军号声为准。军号由我保管，因为我会吹号。

在恩顶劳动结束后，宣布可以先回家。大家归心似箭都急着想回福州。晚上 11 点多了，张俊辉、陈和生和我三人还是决定连夜一起下山。

走到了半山腰，突然听到不远的对面山上有老虎的吼叫声，因为天黑看不清楚，隐约能看见老虎眼睛闪烁的绿光。我们赶紧停下脚步，关掉手电筒，三人腿都吓软了。隔着山涧直线距离才几十米，要是老虎肚子饿，发现了我们，冲过来我们肯定玩完。怎么办？我心里砰砰跳。和生叫我快把军号拿出来，使劲吹，老虎没听过这声音，也许会吓跑。想想有道理，我马上脱下别在腰间的军号，刚开始因为紧张怎么都吹不响。听见老虎那低沉的振动山谷的吼声好像是更靠近了，心愈急手愈发抖，气都吹不出来。还好他们两个比较镇定，劝我莫急莫急。后来冷静一下终于吹响了！“嘟嘟”的军号声在山间回响。一路吹着军号摸黑连滚带爬跑到山下。也不知什么时候老虎走远了，吼声也渐渐变小，我们这才缓过神来，发现浑身冒汗，内衣都湿透了。“吓

死了！”“吓死了！”俊辉喘着大气说道。

就在我们遭遇老虎的前几天，恩顶场附近农民家的猪，晚上被老虎叼走，地上还留下虎爪印。所以，当时心里特别害怕，要是遇到别的什么动物，我们年轻力壮，还不怎么害怕，可老虎是兽中之王，会吃人的，谁敢惹它？唯恐避之不及，现在想起来还都后怕啊！

记得在霍口场我们也常听说附近农民家的猪被老虎（也可能是豹子）从猪栏里拖走。在五、六十年代福建的深山老林里，也许真还有华南虎的踪迹，不然农民怎么会在犁田时，牛若不听话，就大声喝道：“老虎嘎（咬）！”（罗源话）

事后，也有朋友质疑：没有见到斑斓的虎身，怎么肯定是老虎？说不定是山豹、野狼？可是，我们深信，就凭那让人胆战心惊的吼声不是虎啸是什么？若是一般的动物，我们不可能吓得腿软。兴许还想把它捉来改善伙食呢！但那晚遇到的确实是个大家伙，在我们心里，就是认定：老虎！

这次夜半的惊恐遭遇，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不寻常的外科手术

陈行焄

1972年，我，一个没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接手徐重工区卫生室。一天晚上山友阮家和从霍口挑担回来，饥肠辘辘，三下五除二吃了晚饭，就在食堂里冲热水澡。不慎“啪”得一跤，四脚朝天，摔倒地上，右手肘刮到大铁锅口，鲜血淋漓。他急忙左手抱着右手、湿淋淋地跑来找我。我一看，啊！真吓一大跳：伤口足有3、4寸长，肘关节骨头都露出来了。我脑子“嗡”的一下，这怎么办？我从没处理过这么厉害的外伤，又不可能连夜送到十几里外的场部。我说：“只能先包扎一下，明天早上再去场部处理。”家和不允，说：“不要等明天了，还是现在你帮我处理！”我说：“卫生室没有麻药，没有医用的缝针和线。再说，我也从来没有缝合过伤口，勉强上手会很疼的，搞不好发炎了，第二天还要拆了重缝。”家和说：“我活都不怕，还怕疼（注）？我相信你！现在毫无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大胆下手吧！”我考虑再三，只好壮起胆，借了隔壁女同事的缝衣针和线在酒精里泡泡消毒，再把针在酒精灯中烧好，然后消毒创口。我对他说：“咬紧牙关，我动手啦！”于是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无麻缝皮术”开始了。我按平时补衣服的做法，缝好一针，就打上结。两，三……总共缝了七针。啊！终于结束了。家和疼痛难当，人都针快晕倒了，可他一声不吭；我也紧张得精疲力尽，大汗淋漓瘫坐在板凳上。终于完成了这场永生

难忘的“手术”。心里也十分佩服这勇敢的小伙子。我交待他明天一定到场部检查，重新缝过。可是，第二天，家和像没事一样，说：“不疼了”，竟也不去场部找正规的医生。两三天后，我给他换药，见伤口愈合还好，只一个针眼处有点发炎，换了药，包扎好。七天过后拆线，伤口居然愈合得很好，真不可思议！年轻真好啊，抵抗力超强！

我想，这也只有在我们那个年代，在那个处境才会出现的“奇迹”！当然，也证明当时我们“胆真大”，“命好贱”！

（注：“活都不怕，还怕疼？”当年生活十分艰苦，又看不到前程，于是自嘲：“生不如死”。所以才会编出“活都不怕，还怕死”这样的话。）



我成了一名知青

孙朝和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岁初中毕业后的我，休闲在家。由于家庭原因，我较其他孩子懂事，较早就为自己考虑生计和出路。在农村像我这样的孩子，根本无法招工就业或继续上学，就算自谋职业依然有诸多限制。

有一天，学校通知开会，由张益飞老师做罗源霍口油茶场情况介绍。我正忙着手中的农活，没有参加会议。晚上，我找当年的班主任林健老师，他看到我星夜造访很是惊讶！知道是为上山下乡的事情而来，他帮我分析：认为我会吃苦，家庭出身不好，父亲长年用药，姐姐已出嫁两年，自己是长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年幼，仅靠母亲一个劳力很艰难，应该尽早独立，为家庭分忧解愁，出去闯一闯，减轻父母负担。出于纯朴的师生感情，我很尊重他，他的话让我铁了上山的决心。家中缺乏劳力，父母亲是不愿意让我去上山的。报名那天，烈日下，我赤着脚，滚烫的沙砾公路，远远看去路上那袅袅的熏气，使人感到窒息，好像在考验人的意志。我瞒着父母亲偷偷将户口迁到罗源霍口油茶场。父母知道后也无奈，只能告诫我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后的路自己走下去吧！

九月三日拂晓，我们打着省、市领导授予的“山鹰”战斗队的队旗，步行十几里路，到达南门兜长途汽车站集中。不大的车站低矮的站房，早已挤满了人。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有送行的家长、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他们三五成群，或互道珍重，或相拥而泣。他们大

部分都是女中的知青和家属，我们因为住家远，怕亲人伤感，婉拒了他们前来送行。上车了，此时，没有什么声响，当车轮转动时只听到“哇”地车里车外拼发出哭泣的声音，年轻人第一次背井离乡，告别亲人，情不自禁地流着热泪。当车行驶到闽江口，有人说：“看，这就是金刚腿！”大家才缓了过来。老式烧木炭的汽车载着人和行李，如牛负重，喘着粗气盘旋在蜿蜒的山路上。汽车时而穿过树林，时而越过山谷，时而盘上山巅，坐了整整半天，临近中午，到了罗源县飞竹区公所。这是我们知青上山的汽车终点站，也是农场的接待站。没有什么丰盛的美味佳肴，只有红糖掺着屈指可数的花生米熬成的稀粥，接待饥渴难当的年轻人。虽是这样简单的糖粥，也是我们自公社化后吃得较好的一餐饭。饭后，福州二十中“山鹰”战斗队二十人和福州女中“邢燕子”战斗队二十七人，举着两面红旗，汇成一支队伍，雄赳赳、气昂昂的上路了。行李由三月份上山的老知青组成的运输队挑着。我的行李寒碜、简单，是我叔叔上学时用的藤木小箱子。里面装着我爷爷遗留下的一件短袖衬衣，两条由缝纫店下脚料缝成的三角裤，外加两本机械书。小箱子运输队挑走了，自己拿的是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全家唯一的换了木板底的搪瓷脸盆和上山时市政府发的喷有“劳动光荣，下乡为贵”字样的塑料提包，一个牙杯，一条毛巾，一支牙刷，肩上扛着一张全家最好、四边断了席草用布缝的草席，这就是我上山时的全部家当。走在盘山小路上，嘴里哼着：《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当年的流行歌曲。开始时 50 多人的队伍走得还很紧凑，头尾尚能互相呼应。从飞竹往霍口走了一段盘山小路后，

经过“风流坪”，接着就是从山顶顺着石阶一直到山下。由于多数人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有人腿抽筋、有人腿发抖，队伍渐渐拉开了距离，后面看不到前面了。夏天，正是雷雨季节，午后霎间乌云翻滚，雷鸣电闪，前面的加快脚步，躲进山脚下溪前村的民房避雨；后面的紧追急赶，依然没能躲过瓢泼大雨的浇注，到躲进民房，一个个也淋得像“落汤鸡”。三阵雷雨过后，还要加快行进的步伐，因为从溪前村，到目的地罗汉洋还有 30 多里路。这时大家的士气有点像烈日下的茄子——蔫了，两面旗子不像刚上路时举得那么高了。

沿着田间小路向前行走，随带路向导走了七、八里路时，见到小路的尽头好像是断头路，走到尽头了。下面是宽约五、六十米的大河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回路转，一侧是深十余米的悬崖，一侧是一米多深用于引水灌溉的水渠。水渠的护堤宽约四十多公分，我们战战兢兢，两腿颤颤发抖地走在护堤上。原先有序的队伍这时已经不存在了，头尾无法呼应。大约走了五、六里路，看到溪对面有白墙的双层瓦房，以为已到目的地，我们实在疲乏了，多么期望少走一段路，到了瓦房，才知道不是目的地。一路上老师善意地“欺骗”我们，下到山底下就是场部了，到了路尽头就是目的地了，到了水渠的水源头就是目的地了，过溪就是目的地了，这样骗了七、八次。在夜幕降临前，才三三两两到达霍口油茶场的场部——罗汉洋。这是罗源、闽侯、古田三县的交会处。也是叶飞书记当年打游击的地方。

山区的天气冷的快，没到深秋夜里都需要盖棉被，缺衣少被难住

了这批知青。带队张益飞老师怕学生冻出病来，找女中的陈素治老师救助。陈老师动员女中知青发挥互助友爱精神，陈必贞和谢雅娟、金翎燕和林敬锵两俩各合用一床棉被，腾出两床棉被支援二十中的困难知青，受助者一个是陈希勇，另一个就是我。当年我家六口人就二床棉被，如果我上山带走一床棉被，全家五口只剩一床被，因此我没带棉被上山。后来，场部赊销寒衣冬装、鞋帽衣裤、蚊帐棉被，以及饭盒等生活用品，待每月发工资和补贴费时扣还。刚上山时有为期一年的补贴，初中毕业生每月 8 元，高中毕业生每月 10 元。评工资定级时多发扬互相谦让的风格，把低职级留给自己，一级二十元，二级二十二元，三级二十四元二角，四级二十六元六角，五级二十九元三角。我们多数人定在二、三级没有争议的级别。女中和二十中编在一个生产队，脏活重活男的抢着干，洗衣刷被女的主动干。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的饭量大粮食定量不够，女的将自己省吃部分贴补男知青，这是多么纯真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当年知青情怀和气度。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知青”。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能有今天，离不开当年上山下乡的历练。历练也是财富。生活的风霜，是酸是甜，是苦是乐，现在全都融入“夕阳红”里，挂在闪烁着泪花的笑脸上。虽然岁月流逝，但只要当年的歌声响起，我们仍禁不住热血涌动。因为在这些旋律里蕴含着我们宝贵的生命赞歌，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的悲欢。这就是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回忆好友林发仪

孙天臃

我的挚友林发仪，出生于 1942 年，2012 年 5 月 31 日因病逝世，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周年了。

我跟发仪不在一个工区，由于工作需要时而到后洋了解生产情况，编写宣传材料，跟他有所交集。后来，因“三观”一致交流渐多，特别是调回福州后，我们在生活、工作上互相关心帮助，走得更勤，亲如兄弟。



发仪是出生在宝岛台湾的台胞，他一家于 1945 年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福州二中初中毕业后，发仪考入福建地质学校，一年后学校下马，他就在安泰街道帮忙当义工。1963 年 3 月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来到霍口场。

在霍口场后洋工区，发仪除了参加生产劳动还兼任司务长。因为在地质学校学习了正规的仿宋体书写，所以他的账目字迹工整，清晰，受到大家的好评。

1975 年作为霍口场第一批参加松山围垦工程人员，发仪被分配到指挥部生产组工作。十年间战台风、迎海浪，奋斗在围垦第一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入了党。他在工地上坚持原则，严格把关，曾查出弄虚作假、瞒报产量、骗取国家工程款的事件，追回了款项，

有关人员受到处理。他是发现问题并破案的主办者。

因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和同事好评，所以，他在松山围垦工程期间，应邀成为罗源县政协委员，1985年松山围垦工程暂停，发仪被调入县政协工作。

发仪的父亲自1945年回大陆后一直在协和医院工作直到1975年去世，老母亲是协和医院的临时工，几十年在药房熬中药。由于年老体弱，家里缺人照顾，1986年发仪父亲生前单位福建协和医院欲将其调入。因他在县里工作十分勤勉、出色，县政协领导很满意，曾一度不肯放行，后经多方努力于1987年底才调动成功。发仪调入协和医院后，任职总务科。后勤保障工作范围很广，从日常房子修缮、管道疏通、水龙头更换等等琐碎的事务，到招募安排临时工，最后负责协和医院外科大楼筹建施工，他始终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协和医院上上下下对他的为人、工作总是赞不绝口。在他因病去世时，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及职工赶来为他送最后一程。

从发仪调到协和医院起，霍口场周边的农民、围垦工地的工作人员及我们场里许多同志或亲属因病到协和医院找他，他不论认识不认识的，都会积极帮忙，找最好的医生为患者治疗，如果需要住院，他也会千方百计设法解决病床。许多得到他关照的人，至今念念不忘，大家一提到林发仪的名字，都会由衷地说：发仪是个大好人！对他的离世，深感惋惜。

发仪不仅对生病的同志关照有加，对那些因种种原因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也同样给予照顾。比如龚渝霖，发仪就把他安排到自行车

寄存处看管自行车，既让协和医院员工的自行车有了安全保障，龚渝霖也有了一定的收入。又如，我们场部原来生产组的老员工郑利利，由于霍口场撤销了，他没了工作，生活有困难，发仪也给他安排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此外，他还给许多罗源籍乡亲安排当临时工。

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作为霍口场联谊会主要负责人，多年来发仪都要筹备、组织春节聚会或返场活动，探望生病的同事，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即使自己重病在身依然忘我为大家服务，甚至跋山涉水拨开重重茅草，亲临倒塌的房屋拍摄各工区的旧貌。临终前一天，他一边喘着气，一边用颤抖的手在装有 500 块钱的红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交给场联谊会负责人孙朝和，以支持搞好上山 50 周年纪念活动，令在场的人们感动得落泪。

发仪去世时刚满 70 周岁，实在有些可惜。场里有同事对他的评价是：“生如盛夏之清泉，逝如深秋之红叶”。

今年是发仪逝世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中！安息吧，我难忘的挚友——霍口场的一大好人！

借用的日子

林 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易受幻觉和激情支配的年代。我们就是在这个年代的初期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的。那时绝大多数的知青都是满怀豪情壮志，响应号召去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上山初期，确实也过了一段激情浪漫的岁月，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流逝、苦难的磨炼，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洗礼，到了七十年代初，知青心中的革命豪情逐渐丧失，拓荒之梦也彻底破灭。加上年龄的渐大、工作、婚姻、前途等实际问题摆在眼前，多数知青从当初的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变成了寻找关系千方百计搞调动。于是，我就有了一段在罗源县借用的日子。

对于调动，上山下乡之初，有关部门曾经允诺过，艰苦锻炼几年以后，就会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把我们调走。对此，我个人觉得，上述情况只是针对家庭出身好且表现突出的人而言，对于我们这样成份不好的人来说，正常上调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也是如此，那时，从场里上调福州市直机关、县林业规划队、百丈水电站，都没有出身成份不好的同志。“调”既不能，我就想办法“借”。我凭借着自已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开始尝试着写小说，希望能借此出名，让外界知道我，把我借用出去。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九七二年，我的短篇小说《一根针》在福建日报文艺副刊《武夷山下》上整版刊出，同时被收录到省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色满园》中。我也被省文化厅抽调参加了文艺创作工作人员的短期培训班，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罗源县的文化人，如陈学举、林正让、陈进俊、余光临、兰珠珠、吴春庭等。逐渐地我在霍口场和罗源县有了一些小名气。终于，县林业局要借用我了。

和我一起被借用的还有叶与德同志。到林业局报到时才知道，这次借用的任务是把一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共同签发的有关林业法规的文件，用油漆抄写在七八片已经制作好的红色大铁皮广告牌上，准备立于全县各处。我们都没有学过美术体字，但为了珍惜借用的机会，我和与德同志决定绝不打退堂鼓。就满口应承下来。真可谓“三十除夕学拳术，正月初一使”。当晚，我们住进县招待所后，借来了一份旧报纸，因为报纸中的仿宋、隶书、黑体等字体一应俱全，只学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上阵写。我们决定用仿宋体写大标题，用隶书写发文单位，内容则用一横一划最好写的黑体字。铁皮广告牌很大，我们向木匠借了墨斗线打格子，先用粉笔把文件内容抄写在格子中，再用白漆往上写，幸好我和与德都有些书画功底，在擦掉黑线和粉笔痕迹后，竟看不出是两个人的字迹。红底白字很是漂亮，这样写了一个月，完成了任务，领导较为满意。刚好县上的林业普查、规划、播种造林工作要开始了，孟梦祥局长决定把我们留下，继续借用。

县上成立了林业规划队，队长王长美(林业局干部)，副队长葛善祥(原霍口场场革委会副主任)、队员是县各农、林场正式调来的职工，

大多数是各场的骨干，由于人手不够，又吸收了我、与德以及林业局干部家属等临时人员。先搞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规划。当首次领到雨衣、饭盒、水壶、胶鞋等林业野外作业的劳保用具时我激动不已，似乎自己已经成为了正式的林业工人。宁德地区林业局还在我县飞竹乡开办了林业普查培训班，学习实地对图观看等高线，在复制的军用地形图上色画林业小班、测量林地蓄积量等作业法。培训后就在斌溪村实习。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行政村，座落在文溪和武溪的汇合处，故称斌溪。这个村山林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林业资源丰富，所以选作我县的实习点。为测量一个山头的林木蓄积量，要走很远的路，爬山越岭，过溪涉水是常有的事。有时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个小村落，依山傍水，几间瓦屋，几个村姑，心情豁然开朗。队里有一个叫依齐的干部，经常谈些笑话，念些小诗活跃气氛。当时，他高声吟诵了一首数字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去二三里，前头四五家，茅屋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引得大伙哈哈大笑。

实习后，分组深入全县十个乡镇进行普查。我们都住在村干部家里与他们同吃同睡，生活十分艰苦。竹笋苦瓜酸菜、腌制的烂鱼烂虾是经常的下饭菜，能得到咸虾苗炖蛋，再配上地瓜米饭，便是美食。当然，偶而也能吃到各乡镇的特产：如碧里的麋尾羊、中房的水牛肉、松山的跳跳鱼，还有深山老溪的溪滑和石鳞。有一次在霍口东园亭少数民族村，打猎队围捕到一只大山猪，吹着角号，浩浩荡荡地扛回村里。当时少数民族尚保留原始社会均等分配的遗风，每家每户都分一份，我们普查队也分到一份，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野猪肉。为了赶时间

抢进度，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得上山作业。工作虽然艰辛，心情却十分愉快。借此，我们走遍了罗源县的山山水水，取得了宝贵的林业资料。

外业完成后各普查小组就集中到城关汇总。把分散的地形图再拼接起来，绘成全县带有林貌特征的林业普查地图。并把林木班块、种类、蓄积量等有关资料填写到各种表格中去。由于内业要花费较长的时间，需要较大操作地点，林业局领导把位于县招待所后面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仓库作为我们内业整理的工作地点。与德和我就搬到这一间小屋中居住。闲暇时坐在阳台上看罗一中学生放学，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嘻嘻哈哈，熙熙攘攘，也不失为一道风景线。有时，也到城关十字街郎官厨师开的餐饮店里小酌，两人点一盘荔枝肉，再一菜一汤一斤老酒，一元不到即可酒足饭饱。之后，再泡壶清茶，边品茶边看着出城进城的人群，不时一二个美少女飘入眼帘，真是心情舒畅。

普查完成后接着进行规划。因人手短缺，我一人包了鉴江镇的林业规划工作。鉴江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临海小镇，有独立的小城门。当时未通汽车，交通闭塞。从水路登岸，风高浪大，异常险恶；陆路走，坐船在碧里乡上岸后，翻越高耸陡峭的三十六曲岭，得花上5、6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很少有人来，俨然与世隔绝。该镇海产品丰富，站在海边放眼望去海上飘着一朵朵雪白的水母，非常美丽。似乎只要伸手就可捞到美味。小海产出奇地便宜，镇上的全书记说：“花五毛钱让通讯员到镇上买三碗小海鲜——虾蛄、章鱼、螃蟹，还可余下几分钱，再添上一壶清酒，足以待客。”由此可见那时罗源偏僻小镇的物

价水平。那时候，鉴江镇的林业技术员是吴章钦同志（后来任县林业局局长），农业技术员恰好是我初中同学，叫洪时亮（后上调省农业厅成为农业专家，曾参加援非农业专家团）。他们知道我要去，非常高兴，准备了一面盆的海鲜，烫酒待客，高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天晚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菜，在豪情下，白天翻山越岭的劳累一扫而光，饭后呼呼大睡，第二天即投入工作。当时局领导允许我雇两名当地的高中生当助手。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林业局副局长兼城关林场场长的尤庆良同志。他们与我一同翻山越岭，涉溪过河，走遍鉴江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林地，帮助我画好规划图，做出规划报告，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林业工作虽然很辛苦，却很锻炼人。调县规划队工作的各场职工，后来都成了罗源县的林业骨干，许多人还当上了县中层领导干部。如李光明同志曾任县政府办主任，林业局局长；黄德旺同志任过县供销社副主任，审计局副局长；还有陈存捷同志调回福州后，成为福州物业管理创办人之一，经营某物业公司得心应手。

山林普查规划都完成后，规划队的临时人员解散，我又面临着返回霍口场的困扰。幸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县委副书记李如昌带财贸口工作队进驻洪洋乡皇万村，他想要在皇万改溪造田，因缺乏绘图人员，就把我借用单位改在商业局，让我参加驻皇万村的工作队（由于各种原因溪没改成）。驻村工作队完成任务后，让我去县百货公司上班，还是借用，先后担任物价员、文书，这样过了两三年，才将我的户粮工作关系从霍口场迁出，正式调入县商业局百货公司。此后，我

参加了电大学习，毕业后转为国家干部。再后来，调县委党校任语文教员、调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员，1991年，选调到福州市委组织部挂职锻炼，被留下后，任组织处副处长，后任电教办主任，直干到退休。

当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霍口场许多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都是选择先借后调的方式。我的朋友张亚淦先借用百丈水电站，后调入县电力公司任秘书；邹海秋先借到人民银行，正式调入后，先后任连江县工商行副行长、福州市工商银行储蓄处副处长，应邀成为福州市政协委员；孙朝和1976年借用松山围垦，1981年调罗源化纤针织厂，1983年参与组建罗源县烟草专卖局(公司)，1990年调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任仓库主任。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调回福州市，在福州市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借用期间，都经历过各种困扰，其中是非曲折、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中明白。虽然如此，在罗源县被借用的日子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和留念的，我想他们或许也有同样的感受。

百里骑行归家记

高荣光

1974年，我托在罗源县城的霍口场老朋友张利清，好不容易买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霍口场此车无用武之地，怎么运回福州？一天，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何不骑它回家？对！年轻力壮的我，没有犹豫，立即着手筹划：时间、路线、路上吃喝，最重要的是新车要“整一整”。后洋工区有个外号叫“依车”的行家——王乾森，花了半天时间帮我整好车子。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九月的一个凉爽的黎明，月牙还挂在天边，农家雄鸡的报晓声此起彼伏。我匆匆地吃过早饭，带上一盒炒饭和一军用壶开水，踏着露水，推着充足气的新车，

雄心勃勃，从场部出发了。今天，我要骑车回家！

当时罗汉洋到霍口的公路还只是个路坯，我担心路上的碎石会割破轮胎，于是骑到崎岖不平的地方，我都下车，推着前行。

天已渐亮，清爽的晨风迎面吹拂。路途虽坎坷，但我心情特别舒畅。因为，今天我是骑着自己省吃俭用、辛苦积攒下的170元血汗钱购买的车子回家，这内心的喜悦与自豪，无以言表！

车子在沙包土粗糙的路面上疾驰，车轮与沙石不时地发出“沙沙”

的摩擦声。忽然，前边急弯下坡，我猛刹后轮车闸，车子歪斜地滑出五、六米，停下！啊，旁边就是十几米深的山崖，吓得我一身冷汗！真要感谢“依车”啊！要是刹不住，车子和我恐怕都报销了！

一路精神抖擞，行过飞竹，平路直奔丹阳，骑至潘渡，时已过午。快快地扒拉了炒饭，又继续赶路……

前边就是最后的难关——大北岭，望不到顶的大山！已经骑了七、八个小时，可谓精疲力竭。小坡勉强使劲走Z型迂回路线，可是这样骑行，路程要多不少。到后来，气喘吁吁，实在骑不上去了，只得下车，拖着铅一样沉重的双腿，推着沾满尘土的新车，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行走……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北峰红旗茶场。

转过一道弯，隐隐约约万家灯火映入眼帘，啊！见到福州了！顿时来了精神，沿着下坡山路，体力超支、疲惫不堪的我，适时松开车闸，飞驰滑下，只有临到弯道口，才稍稍拉把车闸。山间凉爽的晚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骑着我的飞鸽，时而腾空跃起，时而疾驰飞奔，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身后有部货车一路喇叭，就是赶不上我这“坐骑”。到了山脚，我停下车，长长地舒了口气。看看表，真不简单，二十分钟从北岭山顶到新店街头！

一整天的艰难跋涉，到了久盼的故土，瞬间感到双腿发软、臀部发烫、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带着的饭吃得干干净净，壶里的水也早已空空如也。

咬牙坚持，穿街走巷，在拥挤的城市里又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姐家，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

这趟超过十二小时的百公里长途骑行，是我平生空前绝后的一次！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几十年过去。我用这辆自行车载儿子上学，送夫人上班，用它驮米买菜……这辆车承载着我的幸福、我的艰难、我的生活记忆……可惜的是，某日，这辆车子被小偷骑走了，从此结束了它在我家的历史使命。



老赵二三事

张亚淦 孙朝和

赵富存走了，他因突发心脏病在盐城市水电局宿舍去世。几天后，远在福州的孙朝和接到电话，来电显示江苏盐城城区号“0515”让他产生一种不详预感。听了电话，他呆站着，潸然泪下。



2010年秋，孙朝和受联谊会委托，带着鱼丸、肉松、礼饼等福州土特产到盐城探望赵富存，受到老赵一家热情款待。席间，赵富存用一贯的快言快语问道：“小孙，我没帮过你，你为什么来看我？”孙朝和说：“你在军宣队时，为改变知青的命运做了很多工作，功不可没。我代表老知青们感谢你！”并约定翌年在福州，联谊会将为赵富存庆贺82岁生日。

1963年，福州市两千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380多人到闽东山区罗源县霍口油茶林场务农。他们立下誓言“扎根山区干一辈子农民”，却忘不了福州市农垦局一位领导的说话：“以后象割韭菜一

茬茬地把你们收回来。”或许也是当时的“知青梦”。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处境依旧的知青开始上访。1970年7月，一百多名知青致信省、市领导，要求解决知青的“无米之炊”。副省长黄亚光接见了知青代表。上访人员撤回林场后不久，省、市、县组成三级调查组进行调研，随即军宣队驻场协助新班子工作。军宣队队长便是赵富存，时任解放军某部驻连江留守处营级团协理员。进场前赵富存了解到不少关于这个场的情况，以负面的居多。为防不测，按照部队领导指示，军宣队掖着手枪进场。知青们也道听途说了这位队长的传奇经历：机灵乖巧的他，曾当过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将军的警卫员，后来军装多了两个口袋提了干，三十几岁就当上营级。待赵富存“亮相”时，大家不免有些失望：他个子不高，脸胖耳大眼睛小；整个看上去，威严不足和善有余，如果不穿军装戴白帽系围裙，活脱脱象一名大厨师傅。知青们叫他老赵，背地里也有叫赵胖子的。

老赵心里明白，无论军宣队还是上级领导，眼下都没有为知青解困的方案。军宣队的任务是：以阶段斗争为纲，密切注视场内阶段斗争的新动向，稳定知青思想情绪，恢复林场正常生产。但经过一段共同生活，老赵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即使与一般老百姓相比，知青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工资20多元，最少20元，是城里工厂学徒工的水平，而且多少年了没有调整过。老赵跟过两次班，工地远的要爬几里山路，他体胖，差点儿跟不上。因为路远，午饭在工地吃，打开饭盒只有一块两指大小的咸带鱼。边远工区条件更差，不通公路不通电，半个月难得吃回肉，一年看不上一场电影。就这样的环境，七年时间，

知青们挺过来了，没有人当“逃兵”，没有人向家里要钱。物质生活匮乏，唯一不缺的是歌声。知青们爱唱的电影《刘三姐》插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每个工区都有一两名大家公认的“歌手”，组织合唱队，教唱歌。大家出工唱，收工唱，晚上宿舍唱，开大会拉歌唱。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的歌曲比较受欢迎，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胆大的也会哼哼“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小河边”。有的工区有不成文的规定，吃饭列队唱歌，迟到的罚唱。被罚者多选短的唱：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还有更短的：“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古巴必胜美帝必败。”被戏称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徐重工区（这里应届高中毕业生占一半以上），文化生活更多彩一些。他们有自己的小乐队，一批业余演员，开晚会时自娱自乐，有时举着松明灯到附近农村演出。农民很喜欢这种不收费的“戏班”，杀鸭子煮粉干招待演出队。

有一次座谈会上，有知青很羡慕当兵的。老赵说：看到你们我经常想起我的战士们。和你们差不多年龄，同样优秀朝气蓬勃。只是机遇不同，你们没能穿上军装。还是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你们创造光明的前途。场领导换过两三任，各级首长也见过一些，还未曾有哪位领导如此推心置腹，知青们感到和老赵的距离

近了。

入秋之后，就到了油茶果收获季节。油茶是一种多年生灌木，其果实大小如核桃，暴晒开裂后，取籽榨油，当叫“槽”油，可食可入药，价格也比一般食用油贵。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年疏于管理，有些场属林地被周边农民占用，油茶成了他们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这一年正值油茶大年，军宣队和场部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油茶颗粒归仓”，早早安排人员封山把路。农民采不到油茶果，便在半路上设伏，抢夺，引发斗殴，双方都有人受伤。县、驻军派人到霍口公社进行调解，其间一名公社领导骂知青是“打砸抢”，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并赔偿医药费。老赵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知青保护国家财产何罪之有？”手心手背都是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调解不了了之。而后抢油茶果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一年油茶大丰收，老赵心情不错，趁农闲从各工区抽调30名知青，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任领队兼指导员。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断断续续排练了几个月，1971年夏，带着表演唱《炊事班小晚会》、折子戏《沙家浜-智斗》、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台十几个小节目进县城。县领导审查演出后，“油茶场带来好节目”，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当年，不到三万居民的小县城沸腾了。分配入场券的宣传部被围得水泄不通，晚上县电影院更是热闹非凡，甚至有人举着钱要买票。演出时场内座无虚席，两边过道站满了走后门入场的热心观众。消息滞后的附近部队、公社群众闻讯赶来，希望一睹为快。经请示又加演了一场，满足了各方要求。

此次演出让县文艺队（县剧团）的指导员（也是军人）薛其良感到压力，他对老赵说：“你把我搞得灰溜溜的。”老赵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薛其良开口要借用六名知青演员，老赵说：“要借没有，调给你可以。”结果县文艺队调走两男两女。后来有人发议论，说被调走的四人中有三个出身不好，赵富存违背了阶级路线。老赵说：重在政治表现，谁能挑出他们政治问题，我立马叫老薛退人。

军宣队在油茶林场待了两年多结束使命回部队。在军宣队驻场后期，老赵借用与县委书记石左、县委常委蔡树杞良好的私人关系（二人系军人），以知青在县城成功演出为契机，在政府机关及相关部门大力宣传推荐，使人们对油茶林场知青的认识和评价有了根本改变。罗源县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由电力公司、车队、造纸厂、粮站、工商、松山围垦等十多个单位或部门，从场里调动或借用了近八十名知青。他们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不少人还入了党，当了干部。油茶林场的人事变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场撤并，大多数知青得到妥善安置。老赵回部队后没多久就转业了，任盐城市水电局副局长。后来他回忆说，除了军旅生涯，我在霍口油茶林场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2008年，老知青们集中罗源县，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在议论对知青最有影响力人选时，大多数人推荐好人赵富存。

回眸霍口场

黄 听

徐重山外山重山，
后洋嶺下洋连洋。
罗汉洋里藏罗汉，
仙洋深处隐仙乡。
罗溪晓雾开霁色，
西峰烟霞伴晴岚。
船头津渡凌波俏，
火水双龙共腾骧。

题注：霍口场原称“福州市霍口油茶场”简称“霍口场”。后变更划归罗源县。场部设在罗汉洋。

后记：山区的平地称作“洋”。徐重、后洋、罗汉洋、仙洋、罗溪、西峰、船头、朱山均为霍口场工区所在地，也是笔者上山时生活过的地方。霍口场 1984 年撤销，2005 年场部被大火焚毁。如今在“双龙抢珠”处筑坝建水库，场部被水淹没，从此消逝。霍口场历经火水的洗礼已超脱生死，化作永恒！

路遇“嫌疑人”

杨典炜 卓本文

1964年，上霍口场的第二年，大家生产热情高涨。传说溪边偶尔发现有坏人发信号弹，所以大家警惕性这根弦也绷得很紧。每天晚上值班，时刻严防敌特的破坏活动。

大约在5、6月份的一个周末，没下雨，天不冷也不热，我俩经仙洋去西峰供销社买东西。一路看风景，聊天。在仙洋与西峰间有座不大不小的庙宇，平时少有香客，人们为躲雨或歇息才在里边呆会儿。我们离庙不远就看到庙里有几个人，不知在做什么，自然也没怎么在意。走到庙前忽然发现门边还站着一个人，看他衣着不像当地农民的装束，再看一下他的脚，挺白的，这绝不可能是农民的脚步。不过当时，我们也没细想，就走过去了。从西峰供销社买完东西回来，又路过那庙，见那些人还在那儿。这时我们开始怀疑并认真地观察了一下：他们一共是六个人，庙里四个，门口一个，庙后边的土坡上还站着一个，手里还挥舞着什么，但看不清楚。“这人是不是在放哨？”“会不会是坏人？”“他们在干什么？”我们正交流着，庙里的人转头警惕地看我们。当时我们年纪小，心里有些害怕，赶紧开溜。大步流星奔回工区，马上向带队老师及何细细等工区领导汇报。头头们很重视，但采取什么措施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仙洋大队也接到上边电话通报，立马出动民兵把这几个“嫌疑人”抓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县里还是地区的记者来我们徐重工区采访了解情况。那篇报道把杨典炜写成“杨典伍”。队友谢筹也在场，他看后故意把“典伍”读作“典傻”（福州话）。“典傻”这个绰号就是这么个来历，后来在徐重工区被长久流传。

关于此事，罗源县的有关文献里应该会有记载，如有兴趣当能查到。至于那几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不知最后审查的结果如何。

几十年过去了，这事依然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福建沿海历史上是前线，情况复杂，提高警惕，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搏击风浪

许 琛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这消息传到我们工区，几个爱游泳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特别是“浪里白条”林祖渝更是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搏击风浪。大家商议我们也要学习主席，到大风大浪去磨练意志，锻炼身体，练练胆量。说来也巧，老天眷顾，没过几天，暴雨倾盆，山洪爆发，徐重山脚下的岱江，翻滚着黄色的浊浪，从上游奔腾而下！这等好机会岂能错过？祖渝说“莫急，我先去探探路！”说罢，光着膀子，快步流星奔向靠近溪边的七班地。有几个“好事者”，想看看究竟，也戴着“笠斗”跟着去了。此时，洪水已没过一人高的茅草，人很难涉入溪中。怎么办？但见祖渝身手还算敏捷地爬上一根长在水边的大毛竹，随着重心上移，毛竹渐渐弯腰，直弯到接近水面，他一松手，“嘭”地栽入水中，霎时不见了人影。正当几个看稀奇的人惶恐不安时，在七、八米开外，他已露出头来……两分钟不到，人已抵达渡口……“刺激！刺激！”上来后，他说。不过为安全计，他还是主张等明天水位降下点大家再去。

第二天中午一点多，趁着午睡时间，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其中还有本人——小女子许琛），匆匆来到溪边，换好衣裤，士中在前，祖渝殿后，我夹在中间，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涉入水中。洪水滚滚，撞击着，人都站不稳，虽然心中忐忑不安，但还是尽力往前挪

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口号没喊完，人脚已离地，被汹涌的浪涛卷走……一股不可阻挡的自然力往前猛推，除了竭力踩水，挣扎着探头吸口气，根本就游不起来，有人还喝了一大口水。至于受保护的我的命运怎样，根本已无人顾及。大家自顾不暇拼尽全力靠边游去，否则就被冲到下游去了。瞬间，我也连冲带划到了渡口，气喘吁吁地爬上岸来。事后知道，我们冲下去后，有几个吓得不轻，不敢游了，抓着手边的树枝爬上岸来。有人问：“有没有看见许琛？”有人答：“看到了，头露出来了！”刘一敏大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边喊边跟着跑向渡口。过后据爆料，有男生冲过“军舰”（溪中一块酷像军舰的岩石）时臀部被蹭了一下，青紫一块，几天不退。为保守隐私，就不报大名了。

工区主任翁爱诚事后得知，大发雷霆，指着不知谁的鼻子吼道：“说！谁出的主意？不要命了啊？不要命了？”“哼！出了事怎么办？谁负责？谁负责？”把几个胆大妄为者，骂得灰溜溜。过后想想，还真后怕！下列“好汉”参与了这次冒险行动：林祖渝、许琛、邹海秋、毛祚国、叶与德及高士中。

“天下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二十刚刚出头，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不敢干！

珍贵的记忆

彭潭安

当年座落在罗源霍口徐重半山腰的四座青石房，驻扎着来自福州二中和七中的八十几位上山知青，最小的几个才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而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1963年，为了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一脚刚跨出校门，一脚就迈进了山区。单纯的学生们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改造世界观的决心，踌躇满志地献出自己的青春，给寂静的山区注入了一股热情洋溢的活力，也开始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一段人生旅程。

从此，我们与罗源霍口油茶场这个名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共同的劳动、学习、生活中，脱去了稚气，锻炼了筋骨，沉淀了人生感悟。那一段纯真的青春岁月，相信在每一个徐重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回想起来，仍有些酸酸的，却也是甜甜的。

我的手边还留存着63年上山前，家人送我的一个日记本，里面记载着从63年到65年的日记片断。从已经泛黄的扉页中，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一个幼稚的积极向上的自己，往事如轻烟般又飘浮在眼前，想起了我所在的二队的一些人和事，也勾起了我对那两年工区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们八十几位徐重人以原高中的六个班为基础共分为六个小队，工区设有主任和指导员，每个小队也有队长和政工员，队长负责生产

劳动，政工员则负责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那年，工区领导提倡思想革命化、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我们听着哨声迅速起床，随着哨声集体出工，甚至到食堂吃饭也是排队唱歌后才开吃。开饭时，各小队的歌声此起彼伏，新歌不断，热闹非凡。

山区生活很艰苦，最难受的是这里与世隔绝的状态。因交通不便，几天才翻山越岭来一趟的乡邮递员，带来了知青们翘首以盼的信函、报刊，让大家一时忘记了与外界的隔离。大伙将邮递员团团围住，“家书抵万金”有人拿到家信心满意足，也有人盼望落空，黯然神伤。大家非常团结友爱，有快乐共享，有难处同当。记得三队有一位女生接到家信后，闷闷不乐，暗自流泪，政工员了解到原来她家中经济发生困难，母亲来信说冬天来临，在当铺的冬衣无钱赎回，难以过冬。不少人听说后，都慷慨解囊（虽然囊中羞涩，也毫不吝啬），以匿名的方式（好事不留名呗）3、5、10元地寄到她家，解决了困难。以至母亲回信说寄来的钱都已收到，冬衣已赎回时，她还莫名其妙，一个个问是谁寄的钱，却没有人承认（包括我），私底下都替她高兴。

当年，山区文化生活匮乏，没有报纸新闻看，更没有电视收音机。有的就是学校和慰问团送给的书籍杂志，由我负责办了个简易的图书室供大家阅读。还有的是各自带来的一些文学名著轮流借阅。（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名著，看过莎士比亚、约翰·克列斯朵夫，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泰戈尔等名家的著作）因为限定了借书时间，便有人养成通宵达旦读书的习惯。

年轻人在一起总是充满活力不甘寂寞，劳动之余，月光之下，只

要有一人拉起琴来，不一会儿，二胡、提琴、口琴、箫笛蜂拥而至，琴瑟齐鸣，组成了一场美妙绝伦的音乐会。我们都很喜欢唱歌，记得和我同寝室的好友柳珍妮也是个看着谱就能唱出词的主儿，我们常常凑到一块拿着歌本就唱起了二重，唱到和声共鸣处便不约而同开怀大笑，那种自娱自乐带来的舒畅之情至今难忘。带来的两本四百首外国名歌，都被我们唱遍翻烂了，可惜后来“破四旧”的时候，把它销毁了。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根据大家的爱好，工区组织了各类兴趣小组：有合唱团（我和张亚淦负责）、舞蹈队（林有庄负责）、

话剧组（毛祚国、柳珍妮负责），器乐组（黄听、刘与文负责）、《山茶花》创作组（张亚淦、邹海秋负责）、科技组（刘兆驹、陈宝霞负责），还有什么文学沙龙以及唐诗三百首研究小组等。各兴趣小组



开展的活动，既发挥了

大家的潜力，活跃了文娱生活，也展现了不少人的才干。如：一队的张亚淦有一副好嗓子又有一手好文笔，每期《山茶花》一出来，我们都伸长脖子争相观赏。他的文章优美犀利切中时弊，犹如他正直而坦

诚的性格一般；黄听拉得一手好提琴又会作词作曲，我们后来演出的《民兵舞》《采棉舞》《山区小唱》等等都出自他的创作；邹海秋那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和与文精美的画风在食堂的侧墙上，只用了几天的业余时间就合作了一幅醒目的墙报框。二十几年前，我与几位好友重返徐重故地时，几座宿舍和曾经热闹熙熙的食堂都已面目全非，却惊讶地发现，食堂里斑驳陆离的侧墙上居然还留有这幅壁画，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这座食堂，曾是我们填饱肚子的地方，也是见证我们成长的地方；是八十多人的会议厅，也是各小组的排练厅。记得每到周末，工区主任翁爱诚就吹着哨子把大家从各个宿舍“赶”到食堂，让我或张亚淦负

责教唱“每周一歌”。我们必须预先找好歌曲，用毛笔字抄在大张的纸上，然后贴到食堂的墙壁上。大家到齐后，便由一人举着煤油灯照明歌纸，一人则拿着细竹鞭教唱，底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一句一句地跟唱着……在这个“多功能”的食堂里，开过职工大会，开过团支部扩大会，开过小组民主生活会，这里曾是乒乓健儿的运动场馆，也是展现各类文艺表演的厅堂。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1964年的上山周年纪念晚会。

为了纪念上山下乡一周年，工区要求每个小队都要拿出二到三个

节目，最好是自创的。这下把大家忙活开了，早几个月，各小队就开始准备节目，为了保密，都私下找地方铆着劲儿地排练，免得演出那天失去新鲜感。

关于这天，日记本上这样记着：1964年9月1日 星期二 天气晴
今天是我们上山革命一周年的日子，工区里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气氛。男同学用十七张床板搭成个大舞台。前后幕帐是从霍口借来的，边幕是用大家凑起来的各色塑料布做的。舞台上的横额写着“纪念上山革命一周年”，正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像。一切都布置就绪了，膳厅成了临时礼堂，面貌焕然一新。

早在几天前我们就已经把膳厅的墙壁刷得雪白，邹海秋那漂亮的美术字写成的几幅标语，贴在墙的四周，显得格外醒目。在以前团刊的地方，也换成了“九一专刊”。一早上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节目，厨房也忙开了：切菜声、盘碗声、流水的滴答声、炒锅的噼啪声，交融成一曲美妙的交响乐。伴着那诱人的香味，刺激着人们的味觉和食欲……好不容易等到了开饭，哇，一共有14盘好菜，闻着喷喷香，算是上山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餐了。

下午是开全体职工大会，会上指导员作了一年来的总结报告，肯定了大家在劳动锻炼中的收获和成绩，表彰了不少的好人好事，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积极向上，多学毛著，扎根山区，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激动人心的晚会终于拉开了序幕。今晚的节目十分精彩，各小队轮番上阵，有独唱、小组唱、舞蹈、相声、快板、诗朗诵、小话剧等

等，且有三分之一是自编自导自创的。大伙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台上台下连轴转，忙得不亦乐乎，而又井然有序。今天请了十位来宾，还有一些徐重脚下的村民，他们都赞不绝口。晚会一直延迟到快二点才结束。今天我担任了四个节目，但舞蹈还欠满意，主要没有适合的服装，显得有些别扭，不自然，实为憾事一桩。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演得非常好，特别五队的小话剧演的就是真人真事，朴实无华，挺感人的。演出结束回到各自宿舍，大家仍兴味盎然地谈论着，而我就着煤油灯写了日记才躺下。据说后来场领导非常重视徐重工区的这批“学生哥”。觉得他们又听话，又肯干，又有才华，很好领导，以至后来各单位来招人时，场领导都不肯放手，一些知青失去了可以“上调”回城的机会，这是后话啦。

此后，我们的“演出”任务频繁不断。先是九月初接到场部通知，派毛祚国、杨光中、柳珍妮和我四个人代表霍口场到县里参加工会组织的“征兵宣传工作”。除了预备些小节目在征兵动员会上演出外，还配合其他演出队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我则背着手风琴一路弹拉着，虽自学的琴技颇为不堪，但夹在喧闹的队伍中，也就大胆自信起来。可能在那小县城里，手风琴显得新鲜吧，又是一个女的拉，因而博得一些围观路人的注目。以至后来上街时，常有人拽住我问：“你就是那位拉琴的吧？”弄得我好不尴尬。

为期三天的宣传任务结束时，我们都得到好评，每人还分得了一本“征兵积极分子纪念册”呐。

回场一个月之后，又奉命成立了“乌兰牧骑演出小分队”，增加

了张亚淦、黄听、邹海秋、顾同清四个人。我们带着自编自演的许多小节目，10月3号经场部——霍口——飞竹的长途跋涉，挤上了开往罗源的长途车，又一次待命在总工会。后来才知道我们将要代表罗源县去参加闽侯专区的文艺汇演。

那天的日记上写道：“今晚吴秘书跟我们谈了话，决定让我们在县里排练到7号，8号就要彩排，让县委审查。9号休息一天，10号返榕，11号（到螺洲）报到，12号演出。时间太紧迫了，但愿一切都能如意。”

我们回榕心切，不想多耽搁，苦练三天后，提前到7号彩排。当晚有关县领导、宣传部以及罗源剧团的都来现场观看，次日下午召开座谈会。“罗源剧团团长首先讲了话，想不到他对我们的节目评价还是很高的，说是思想性强，自编自演很不错，反映林场真实面貌，使人受感动。然而在艺术方面，也对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后来其他人也先后发了言……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一定要虚心接受这些宝贵意见，马上就进行修改。晚上的礼堂坐满了人，有三四百观众，大多是社教干部来看我们演出的。演员们情绪高涨，观众也很热情，一直鼓掌不停。今晚比起昨晚的彩排演得更加起劲和精彩了，这当然和下午首长们提的建议是分不开的啰”（64年10月8号日记）。

记得当晚演出后回工会宿舍的路上，我们仍兴奋不已，为着节目得到的好评，更为了明天就可以回榕了，心情特别地舒畅。不觉之间八人竟一字排开地昂首阔步，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开怀的歌声“肆无忌惮”地回旋在夜深人

静的街市上空。

据黄听回忆，那次到闽侯地区参加汇演，有所属专区的各县文艺代表队，而我们罗源县是最年轻的一个演出队，我们的节目也是最受欢迎的。哈，霍口场总算又给罗源县争了一次光。

令我最为怀念的还是我们徐重工区的合唱团，相信那一定也是很多徐重人的共同回忆，因为它是工区兴趣小组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个团（大约有五、六十人吧）。由于都是年轻人，没有几个不喜欢唱歌的。我和张亚淦等人商议，根据合唱的需要，由团员自报并鉴定音域后，分为女高、女低、男高、男低四个声部。每个声部都有几个能唱的骨干把关，让我们这些组织者很省心。当时的场领导看到我们工区的文体生活如此活跃，挺满意也挺重视，叫我们合唱团要好好地练，争取参加春节期间福州市组织的农垦系统职工文艺汇演。得知此消息，大家都兴奋不已，热情高涨，不但在出工休息时主动拿出歌纸就地练习，就是在收工后也会自觉地分声部找地方去练唱。直到每个声部都练得差不多时，再把大家集中起来到食堂排练，发现问题再分练，练好后再合排。大伙都唱的很起劲，也很服从安排，几个回合下来，四声部的和声效果相当不错。

当时的伴奏只是由我用半生不熟的手风琴定了音，再与黄听娴熟的小提琴和与文悦耳的二胡一起合奏，帮衬着还能凑合一下。但由于大合唱的指挥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懂行的黄听不得不放下提琴去作指挥了，伴奏虽然还有二胡在，然气势不够。此刻的手风琴凸显重要，再也不能“浑水摸鱼”了。在大伙的鼓励下，我只得赶鸭子上架，硬

着头皮撑起了伴奏的重任。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只是因兴趣键盘乐器而半路修行的我，实在是很大的压力。看到大合唱都已经练得那么好了，可不能因伴奏的失误而垮台，影响了整体。我无法推却，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收工后或休息日的我，一有空就背起沉重的手风琴，不练得腰酸背疼手发麻就不罢休。有时候怕影响别人休息，只得往山林深处去练，直到把几首要唱的歌练得滚瓜烂熟。唉，现在想起那时都觉脸红，那哪叫真正的弹琴啊，只不过会用右手弹个主旋律，左手按着贝司打准节拍而已，会弹的人一定见笑。而我居然还斗胆在福州的大汇演中献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还好当时众人气势磅礴，悦耳动听的大合唱掩盖了我的这点缺陷，大概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所以也不致影响到整体的效果，实为幸事！

这次的演出最令我感动的是合唱团员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以及服从命令（声部调拨）听指挥（黄听）的种种表现，以至于达到声部的最佳合一，不但唱出了歌曲的感情，也唱出了徐重人的水平，臻于完美。记得当时我们参演的合唱曲目有：《我们是党的忠实儿女》《啊，山雀！》《渔家姑娘在海边》以及《我们飞在云彩的身旁》等。当我们的合唱团以声情并茂的歌唱，在福州市农垦系统的职工文艺汇演中拿到第一名时，别的演出队中还有人怀疑我们是专业的，要不就有专业的歌唱演员混在其中。否则，怎么能唱得这么棒呢！哈，他们的“怀疑”证实了我们的水平，而作为实打实的知青合唱团成员，我们感到自信、自豪！

六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仍对这几首歌的旋律念念不忘，歌词虽已记不完全，也还能唱出几句。几次演出的印象已不太清晰了，而当年大家在徐重食堂里排练的那幅景象，却还深印脑海，历历在目。

记得事后张亚淦还打趣说，等到我们六十岁时，再一起来唱，也许没牙了，漏风了，但相信音准还能控制得很好。可惜六十岁的我们，虽然还有满口好牙，但都各奔西东，散居天涯，难得相聚，更难同唱。要不，凑在一块还真说不定能再次悦人耳目呢。

最近听到的一首歌，歌词让我颇有雷同的感触：

光阴一年一年在流转，
我们一年一年在变老，
翻看发黄的老照片，
不变的是那纯真的笑脸；

.....

打开尘封的日记本，
如烟的往事重现在眼前。
啊，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却留下了难忘的从前，
啊，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
却改变不了那份深深的怀念！

是的，青春是美好的，往事难以忘怀。愿时光如流沙般，滤去一切不愉快的过往，留下闪光的金子般的珍贵回忆！

我这一路

孙朝和

1976年，我被借调到松山围垦指挥部，领导分配我到机械组，主要负责采购。当时，围垦的资金比较紧张，省里按季度拨发的资金要匀着用。所以，我每个季度基本上都要出差，主要是去上海购买柴油机配件、凿岩机钻头及密封圈等易损易耗品。每趟出差，都要到省计委开具介绍信，上海才予以安排接待。在副省长温附山及马承岱等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我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围垦工地，我埋头苦干，风里来浪里去，工作了五年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罗源的工业比较落后。省计委主任，我们的老领导游德馨为罗源批准了三个项目：化纤针织厂、溶剂厂及畚山卷烟厂。罗源化纤针织厂筹办初期，各部门通力合作向县工商银行借贷16万元，准备购买涤纶长丝原料，以便生产市面上热销的蚊帐等货品。贷款到位了，货源还不知道在哪里。经过多方查询得知省华福公司有经营此业务，但4吨多的涤纶长丝已被长乐某私人企业订购。我陪同县委两位领导赶到福州，在温副省长帮助下，华福公司领导冻结了已预售的涤纶长丝，转售给了罗源这个地方国营化纤针织厂，解决了燃眉之急。我这个刚刚正式调到厂里的人员，也算是立了一功。1982年，我经考试，转为国家干部。

后来罗源化纤针织厂生产的“荷花牌”涤纶蚊帐，遇到竞争对

手，销路不太好。县委同意了我的建议，在福州各百货公司、商场寄售代销，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县里和厂里的好评。

八十年代初，各省市相继组建烟草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的精神，公司的人、财、物、产、供、销统一管理。县里很重视畚山卷烟厂的产品销售工作。经有关人员推荐，县里又把我从化纤针织厂调到烟草公司，参加公司组建并主要负责销售工作。我跑遍了宁德地区各个县城及广东各地，了解适销对路的产品。此时，公司业务股长涉事入狱，我挑起了业务重担，销售业绩（税收、利润、销量）同步增长了10%以上。

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口卷烟蜂拥而入，市场呈现复杂局面。省烟草公司销售部组织问卷调查。我在卷上写道：目前进口烟供不应求，只是现象，不是实质。烟民喜新心态不会长久，进口烟属于混合型，中国人的老习惯是喜欢烤烟型，习惯决定进口烟是短命的。销售部主任非常满意我的答卷，这是我上调省烟草公司的根本原因。1990年5月我上调省烟草公司，任仓库主任（科级），2004年我在副处岗位上退休。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这纷繁的世界里要能有所作为，我想：一要诚恳待人，做好自己；二要认真办事，遇到困难，百折不挠，咬住青山不放松。有这两条，很多看似奇迹的事情，经过努力总是可以办到的。这，就是我一路走来的总结。

忆朱山

鸣 虹

朱山，在霍口场算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原先是个护林组，后来提为工区。它很小，但“五脏俱全”：一座只有四、五间小屋的青石平房，房前一块可伸展手脚的小平地，一个能放下一、两张八仙桌的小食堂，自然还有一间不分性别的双坑小茅房。这个被霍口场员工称为“养老院”的护林组，人员不多，常住人口不到7、8个，多为“老弱病残”者。唯独有个较年轻的特殊人物——邱东华。他不是头头，但确实确实又是朱山的“元老”。这里人员时有流动，唯独他是“镇寨大王”。他熟悉朱山的每一块林地，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清楚哪里有可食用的竹笋，野菜，哪个山旮旯里有可饮用的泉水，甚至知道哪里能掏到野山鸡的蛋。黑黑壮壮的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指点江山，发号施令。职工熊铭英年纪较大，据说还是东华的娘舅。有一天东华分配他去某班地巡山，可能是那天雨后路滑，班地又较远，这老同志不高兴了

“干嘛让我去？你欺负老人！”“为什么不能去？这是工作需要。”“……你是队长吗？”“不去？算你旷工！”“哼，你不够大！”……两人怄上了。还好，刘依坤队长提着裤子从厕所赶出来，连忙打圆场，“别吵了，别吵了！我去，我去！”这舅甥俩的“干架”才算终了。

离朱山工区不远，有一片高大的松树林，因为枝叶茂盛，遮天蔽

日，树下已不长草。这里空气特别清新，举目能看到蜿蜒东去的岱江，听得见哗哗的流水声，风景可谓“上乘”。也许是松香的作用，这林子里蚊子、小黑虫较少。周末，我时常来到这片树下散步、看书。松林里有两户“居民”，很吸引我：一是，不时从身边跳过的小松鼠；二是，在福州很难看到的蓝尾喜鹊。它们和睦相处，从不吵架。可爱、活泼、漂亮的身影，常常慰藉我寂寞孤独的心，有时会痴痴地看上半天。

由于工作需要，朱山后来还增加了几个人，他们是刘祥仁、陈世清、林光华。有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从福州探亲回场。绵绵春雨，下个不停，天阴沉沉的，谁都没好心情。朱山不大，人又少，大家无所事事。打扑克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打麻将吗？记得，当时还没制作完（毛竹砍下，自己动手做）。只好都躲在房子里，或看书，或睡觉，或呆呆地想着不着边际的心事。这时，陈世清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像狼一样！”我噗嗤笑出声来，很对景。大家都被关在几间小屋子里，“走过来是七步，走过去还是七步”。这不真有点像动物园里的狼，走来走去地兜圈子吗？世清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还会发笑，当然，这是无奈的笑声。

我在朱山，大约有一年时间，还是干在罗溪时的行当——伙夫。不过，此时的我，已经能熟练地用湿柴火把饭做好了。但若遇到发洪水，运输队几天过不了溪，食物运不上来，我这炊事员就束手无策了。白饭配“盐水清汤”是常有之事。要是再没吃的，大伙只好各显神通，“走亲戚”到农民家蹭饭了。

朱山之后，我被调到场部，在那儿工作了四年左右。

1979年，经多方努力我调回了福州，结束在霍口场十六年漫长的知青岁月。如今，我是家里掌勺人，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手艺，还是从霍口场的罗溪、朱山学到的。如今的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再也没有无米之炊，盐巴当菜的事了！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但好像就在昨天。



蟒宴记

陈永健

1964年初夏，一天傍晚，雨后天晴。晚饭后场部操场上人们三三两两在散步，聊天。这时，从罗汉洋村方向来了两位农民，用高柄土箕装着一条奄奄一息的大蟒蛇抬来卖。不知谁喊了一声：“好大的蟒蛇呀！”霎时场部炸锅了！人们一下子围上来，好奇的，看热闹的，但面对如此大的蟒蛇大家都拿不定主意，买还是不买？这么大，怎么搞定？还是周瑞华胆子大，有气魄，从起价15块砍到8块买下，并当众宣布：“想吃蛇的都来帮忙！”

两位农民叙述，近来偶而发现有条大蛇在附近出没。当天他们在罗汉洋的梯田里劈草修田埂，听见附近草丛里沙沙作响，忽然从里边窜出一只大蟒蛇！说时迟那时快，蟒蛇很快就到了跟前。两人都慌了神，一位甩出田埂刀可没打中，正准备逃路，另一位出于自卫，举高田埂刀，大力劈下，正中大蟒的要害“七寸”。蟒蛇血喷如注，一下子瘫软在地，两人这才安全脱险。

话说买下了大蟒蛇，大家簇拥着来到操场旁边的桉树下。灵巧的林强爬上树放下绳子，人们七手八脚帮忙将蛇吊起来。几个胆大的卷起袖子，动手剥皮，先用“翻大肠”的办法往下剥，但在树上不好操作剥不动，只好改用开膛破肚翻过蛇皮才剥了下来。肚子空空的，难怪饥饿的蟒蛇向人发起攻击。

蛇的全身都是宝，蛇皮是做乐器的好材料，这条蟒蛇剥下来的皮有近三米长一尺多宽；蛇油是外敷消炎的极品，肚子上的蛇油有二斤多，后来送给了场部老中医开明伯；蛇胆有鸡蛋大小，这是好东西，胆汁清热解毒。刘友萍等三位女生吃了这“仙丹宝胆”后，不但脸上疙瘩脱光，而且从此皮肤变得滑润。

烹煮蛇肉是有讲究的。据说不能放在老旧房子室内煮，因为蛇汤的气味会引来房梁上的蜈蚣，所以要在空旷的室外烹煮。吃蛇也要很小心，要是让蛇骨刺伤了嘴巴，伤口不容易好。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言，没有实证。这只大蟒净重 45 斤，整整装了食堂四个小木桶。大伙儿用食堂的大锅在溪边架起炉灶烹煮。因为蛇肉很老，切得又大块，所以一直煮到半夜两点才啃得动。好几个人晒得不行，便撤了，能坚持下来参加蛇宴也就 10 个人。那乳白色的美味香汤几米外都能闻到。几个人坐在溪边的鹅卵石上享用着这从没尝过的美味佳肴，也顾不得已经是夜半时分，天亮后还要出工……第二天，剩余的蛇汤蛇段也让场部其他人分了一小杯羹。那无以言表的美味至今记忆犹新啊！

蛇皮凉干后，由周瑞华拿到福州卖给乐器店，除了报销旅差费，每个出钱买蛇的人还分到叁元钱。大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既享用珍馐又分到“曼尼”，真一个“爽”字！

现在蟒蛇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打不得，卖不得，更吃不得了！。当年没有这条，我们肚里也缺油水，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管它几条腿的，只要能入口，什么不敢吃？

往事几则

高士中

碘酒当糖浆

大约是 1964 年，有庄在徐重工区当卫生员，场里没有给各工区配正规的医务人员，工区领导指定谁当就是谁。有庄领命去场部受训，经医疗室周医生简单教授处理小病及外伤的办法后，便走马上任了。

一天她到场部领药，因为刚好没有碘酒空瓶子，周医生就顺手将碘酒装入贴有止咳糖浆标签的空瓶子里让有庄带回了工区。大约一两周后，队友翁爱诚因咳嗽来卫生室，有庄误拿这个装着碘酒的“止咳糖浆”瓶子给了他。爱诚急急忙忙打开瓶盖，仰头就是一大口。啊！火辣辣的！他十分机灵，马上做出反应，快步奔到门外，伸食指直抠喉咙，霎时一股蓝色的呕吐物喷涌而出，有人惊呼：“快来人啊！爱诚中毒啦！”有庄这才恍然大悟，糟了，吃错药了！当她踉踉跄跄跑出卫生室，但见爱诚眨巴着眼睛，呆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大概给吓蒙了。说来也怪，这一折腾，竟然咳嗽给止住了……不过，有庄从此拿药小心加小心，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福州话叫“惊入心”了。

捉蛙充饥

三月的春雨总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们的肚子也常常饿得叽叽咕咕叫唤不止。下午收工，5点不到，一盒稀饭三两口扒拉入肚，像跟没吃一样。要是再配上春笋，饿得更快。漫漫长夜如何熬到天亮？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沉闷的“呱呱”声，“青蛙能吃的！”室友宋杰大声喊道（当年他跟我们一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都敢吃，谁想到如今，竟然患上“洁癖”，春节聚会一口不沾，坐陪几小时，这是后话）。于是，说干就干，穿上雨靴，拿起手电筒，不畏刺骨冰冷的春水，踏入农民的水田。三月间稻秧插下不久，苗儿稀稀松松的，青蛙（我们管它叫“青蛤将军”）趴在水田里，只要一叫唤，一眼就能看到。拿电筒对着它一照，它就傻呆那儿，跟你“小眼对大眼”，轻轻走过去，快手一抓一只。那可不是一指大的小蛤蟆，它褐黄色，背上两道深色，个头大，一只足有一、二两重。直捉到附近没有了它们的叫唤声，才作罢。记得，每每都有不少收获，最多的一次竟捉到90多只。那天有个叫郑宗汉的老哥来工区串门，他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把青蛙破肚杀好，连蛙卵都舍不得丢，说：“这也可吃。”有室友拿出“土粉”，大家七手八脚煮了一大锅。当晚，美美地饱食一顿。纯天然鲜美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要是跟现在酒家的“干锅牛蛙”比，那真有天壤之别啊！

此外，我跟林祖渝在守夜看护油茶林时，草棚边上有个被水牛“泡澡”蹭出来的一汪坑水，里边生活着“一大家子”田鸡（俗称“水

鸡”）。为细水长流，我们隔天捉两只，撒撮盐巴，煮一锅“仙汤”，打打牙祭，其美味真不可言喻！可惜数量有限，十几天后，还是被我俩给打扫精光了。

现在回想，真对不住这霍口山田里的小精灵。在那特殊的年代把它们害惨了，罪过罪过啊！

粮仓捕雀

1974年下半年，县里按上级部署开展社会主义路线教育（简称“路教”），我被临时抽调到中房公社林家大队工作组工作，跟我同组的除两位县干部、当地的一名积极分子小林外，还有我们场的孙乐文大哥。在那儿工作了近一年时间。

中房是罗源县海拔最高的地方，山高水冷，百姓生活困苦，物资供应贫乏。我们成天吃的就是萝卜干、青菜、豆腐，极少有肉食。那年冬天特冷，已近年关，天上飘着小雪，地里农民的庄稼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成群的麻雀，列队蹲在粉干厂外的电线上，叽叽喳喳，等着吃地上的粉干碎。因为下雨，粉干厂有几天不生产了，这些鸟儿饿得不行。工作组成员小林神秘地对我说：“今天有好吃的了。”随后，他拿了个空面粉袋，领我上了粉干厂旁边大队二楼的谷仓。推开两扇合门，里边黑洞洞的，没有窗。他抓了两把谷子撒在门内，我俩一边一个，躲在门后。一会儿，呼地飞进七八只麻雀，边吃边四下张望，谷子没吃多少，一溜烟就飞走了。我有点着急，小林摇摇手，轻

声道，“不急，还会来，刚才来的是第一拨，公的，胆大。”话音刚落，呼啦又飞下十几二十来只，叽叽咕咕，边吃边交头接耳，像在商量什么，一两分钟不到，一阵风飞得一只不留。还不动手！我真急啊！小林自信地说：“刚才母的也来了，现在好戏快开演了，呆会儿它们的子孙来齐了，等我喊一声，我们同时快速关门。”果真如此，顷刻一拨接着一拨飞进了一大群，当它们吃得正开心时，小林大喝一声“关！”我俩各自从门后一跃而起，关上仓门。此刻，仓里的麻雀，东飞西窜，乱作一团。小林很有经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细缝，一道亮光射入仓里，麻雀见光，争先恐后朝着光亮处撞来，我们顺着门缝往下捋，也顾不得手掌被啄得生疼，一把一把地将这些逃命的小家伙逮进了袋子。呵！真没想到，竟装了大半袋子，足有6、7斤之多。当晚，孙乐文主厨，红烧，油炸搞了两大锅，还买了两斤青红酒，几个工作组成员关上门，偷偷干起杯来……这算违反纪律吗？那时没人宣传鸟是人类的朋友，但懂得麻雀肉是解馋充饥的美味食品，只是可怜了这些无辜的小动物了！

春天的野百合

窗台上的野百合，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春天来了！

霍口场迎来了一年中难得的热闹时光，一队队采茶女从周边的山村向我们的茶厂聚拢。有妙龄少女，也有半老徐娘，有穿花花绿绿的，也有着粗布麻衫的。某“和尚庙”清一色的性别格局瞬间被打破。工

区里充斥着女人们的嘈杂声，异样的气氛开始弥漫……有人忽然改变了平时的随意邈邈，有人注意起自己的言谈举止，有人进进出出坐立不安，有人四下寻觅：旧朋友？老相识？好邻里？还是……总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荷尔蒙分泌的缘故，不少“三十边”处在莫名的亢奋之中。有人甚至情不自禁地陶醉道：“啊！仙女！”我们这些从品种齐全的工区临时抽调来的人，常常感到困惑。有个知内情的挚友曾悄悄告诉我：“在这些人眼里，就是来头老母猪都是双眼皮。”真是太经典了！

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沉睡的山坳，白炽灯让长久适应了一灯如豆的人们有回归文明的感觉。

紧张忙碌的制茶开始了……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漏洞，与采茶女有关的主要是称重新茶环节。按量计酬，采得多，收入就多。所以负责称重的人就很关键。据说场里曾收到举报，有人因某种关系做手脚虚报数量，也有的采茶女会在篮子底放个石头什么的，这私底下的猫腻，人们难以言说。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

山谷里的野百合花期很短，不到一个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春茶生产也接近尾声。没几天，工区又恢复了“寺庙”般的寂静。采茶女们拿着辛苦得来的报酬，踏上回家的路，有人迫不及待，也有人依依不舍……许多人心中都期待着来年春天的到来。

我的两次患病经历

谢劫生

常言道，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在霍口十几年，这后一句话对我而言刻骨铭心。那时全场方圆十几里、三百多人就一名医生。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忍忍就过去了，遇到重病多受罪不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1966年上半年，一天傍晚，侨生陈顺和到宿舍要与我掰手腕。我刚吃饱饭，肚子有点撑，懒于应战。他求战心切，自认为比我强壮，想扳回前两次的败局。我再三推辞，他一再力邀。碍于情面，只好答应奉陪，双方在长条凳上摆出架势，展开角逐。他爆发力很强，欲先发制人，突击取胜。我早有防备，顶住压力，岿然不动，多番往来，不分上下，双方陷入拉锯战。围观的人们使劲助威，“加油！”“顶住！”的喊声不绝于耳。掰手腕，拼体力、比韧劲。我心里默念：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在僵持中发现对方稍微有点松懈，我立刻抓住难得的机会，摒住呼吸，用尽全身力气，使劲一掰，扳倒了对方！他悻悻而归……

当晚，感觉胃部有些不舒服，闷，但无痛感，以为平安无事。第二天照样出工，晚饭勉强地吃了一点点。晚上睡觉被憋醒了，起床吐了一些黑水。第三天清晨，想上厕所，刚到路边，一股腥气涌上喉口，一张嘴大口鲜血喷涌而出，踉跄几步就晕倒不醒人事了。醒来已

躺在床上，四肢无力，脸色苍白。躺了一整天，不见好转。工区领导翁爱诚闻讯赶来，确认病情危重，必须送医。他们用靠背椅和竹杆绑成“轿子”，抽调朱金华、王连陞、阮家和、吴圣锟四位壮劳力担任“轿夫”，另派郑坤、王家驹两人护送。第二天清晨，上“轿”起程。四个“轿夫”两两配对，轮流抬着翻山越岭，趟溪涉水，争分夺秒徒步50多里，赶到飞竹，搭上班车，抵达罗源城关。次日一早乘班车直奔福州，经协和医院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胃出血，需马上住院治疗。郑坤和王家驹连忙办妥了住院手续。接诊医生说：如果再迟些送医，造成大失血，我们也无回天之力了。由于治疗及时，加上双亲的细心护理，半个月后，我出院返回了工区。

1974年初夏，某日，天已昏暗。吃过晚饭大家在工区三座宿舍前的小道上散步聊天，突然脚下一阵刺痛，我“啊”的大叫一声，蹲在地上。在农村长大的室友朱金华很有经验，马上说：“坏了，被蛇咬了！”他立刻搀扶我到宿舍坐下，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看到两点红色的小牙痕。“是毒蛇咬的！刚才你踩到它了！”天黑，顾着聊天我也没在意路边草丛，更没想到这是蛇出没的季节。金华二话没说，马上俯身在我伤口处用嘴使劲吸毒血，吸一口吐一下，反复几次，然后拿出一粒蛇药叫我吞下，就这样我心跳仍在加剧，腿脚发胀并开始肿大。

室友吴圣锟见情况紧急，马上拿出手电筒摸黑往十几里外的场部赶。两个多小时后带医生回到工区，医生立即给我打针吃药，安抚我说：“处置及时，好好休息，问题不大。”我这才逐渐安定下来。可第二天早上发现左脚到大腿部还是肿得厉害，手指一压一个深凹，下

不了床。后来全靠金华、圣锷等朋友帮忙照顾。十几天后，慢慢地恢复，惊险地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现在人们爱说，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几十年前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时间就是健康，时间就是生命。回忆两次危险经历，如果没有知青朋友们不辞辛劳的真诚帮助，没有领导的关心支持，为抢救赢得了时间，强占了先机，要平安度过险关，保住我的生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朱金华，他遇事判断正确，处置得当。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顾自己可能中毒的危险，直接用嘴对着伤口吸吮毒血，大大减轻了我中毒程度。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两次生病的情景，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让我痛心的是：朱金华两年前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说，谢谢你，好兄弟！



天然的大学校

许如基

1963年3月，我21岁时上山。之前，书读到初二。因为家庭困难，我打过很多零工：挖土方、挑沙石、送煤炭、运砖头，还当过小水电工。爸妈加上我，三口人，一个月45斤谷子，怎么够吃？为了吃饱饭，我上山来到了霍口——就这么简单。

霍口场是个天然的大学校。我在这儿十年，学到了很多知识，学会了很多技能，交结了很多好朋友，为我的一生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场部，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我喜欢美术，常用炭精作画，用油画扁笔写隶书。也爱雕塑，用黏土加草纸捏人像，有时搞到深夜。有次肖书记半夜到我宿舍，我吓了一跳，以为会挨骂，没想到他很和蔼地说：“很迟了，快睡吧，明天还要出工呢！”我曾经塑了个20公分高的主席像，抱到福州，结识了民间艺人陈世善先生，并得到了他的指教。

我们场的才女——林足展的刻画剪纸相当了得，我很感兴趣，可惜她在场部时间不长，我没有太多机会学习。但她的制作方法，给我很多启发，对我后来在单位写写画画有帮助。

我也喜欢音乐，在场部跟邓友信学吹笛子。学会的第一支曲子是《苏武牧羊》，后来学《纺棉花》《紫竹调》。霍口场的歌咏比赛，篝火晚会上《要古巴 不要美国佬》等歌曲，余音依然缭绕在耳边。

在场部，我曾负责开柴油机。刚开始只有节日或重大活动才发电。记得有一次场里搞文娱会演，我忙着栽电杆、拉电线、布置舞台灯光。为保证晚上正常供电，白天先试机一次。晚上，当明晃晃的舞台灯光亮起，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很多人，包括周边的农民兄弟。我看到挤满食堂的观众，一个个“头光光”、“眼发亮”、脖子伸得跟鸭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看演出，我心里挺自豪的！

在霍口场，辛苦就不用说了，大家都一样。我们运输队也许会更累些。每天“嗨呵”“嗨呵”翻山越岭几十里，百来斤的重担压在肩膀上，吃冷饭，喝山泉……偶尔有人重病，我们还要抬着赶路，山路狭窄且崎岖不平，只能两人抬。难怪大家都说，霍口场这“火焰山”都过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真是练就一身铁筋骨！

场部位于溪边，溪水清澈，鹅卵五彩。我们常常收工后，坐在溪边聊天。夏天会下水游泳、嬉闹。我有时还跟场部王骥秘书、场友陈书钦及罗汉洋村民小孩去钓鱼。岱江水流湍急，自然生长的鱼虾，都结实有嚼劲，味道特好，但也难上钩。有时半天能钓7、8条，有时一晚上，空手打道回府。当地人不用鱼钩，用特制的“竹弹”，在溪里布网，每每总有收获，常常是一斤多的“鲢鱼”，这鱼特别好吃，连鱼鳞都能入口。有时，他们也用能进不能出的鱼笼抓鱼。在笼子里放块大点的鹅卵石，将其沉到溪底，笼里放些鱼虾爱吃的酒糟、黄豆，要是杂骨碎肉最好。黄甲鱼会叫唤，进去一两条，笼里“嘎嘎”声，会引来很多同类，收获多时一笼提上来，竟有两三斤！天然的溪鱼没有土味，特别清甜鲜美。食堂的菜，比较单调，不是卤豆腐干、海带，

就是榨菜、咸带鱼。钓到鱼，就是改善伙食了。

.....

坎坷岁月，内乱文革。上山几年后，大家都没心思在霍口场安心干下去，我也一样。当时，我哥作为援外人员到阿拉伯南也门工作，家里没人照顾。按国家政策，省组织部着手调我回福州。当时场里个别当权者以我在文革中有不当言论为由，百般刁难，万般阻挠，迟迟不让我调离。后来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下，拖了一年又七天，我才办妥了调离手续。1973年元旦过后，上山整十年，31岁的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调入福州电业局后，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开柴油发电机，这个咱拿手，在霍口场干过的，轻车熟路。再后来，开制冷机，帮食堂建冷库，冻鱼、冻肉、做冷饮、制冰棒、冰淇淋，人称“冰基”。每逢节日，还常被借到工会，写写画画。顺便说一句，我这喜爱艺术的基因，还挺强大，传到我孩子，现在他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院长了，真是欣慰！

在电业局，我最后的工作是大楼专职的空调系统维修保养技师，一直干到退休。我是匠人，二级技师，中级职称。我很快活，也很满足。

我的朋友很多，最铁的哥们儿还是咱霍口场人！

警惕的目光

刘兆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内经济困难。海峡对岸趁机鼓噪“反攻大陆”，时而派遣特工，趁着夜色摸上岸来。平潭、厦门等沿海岛屿都抓到过“水鬼”。

罗源与连江毗邻，隔海与马祖岛相望，是海防前沿。提高警惕，防范敌特是当时形势的要求。1962年福州市公安局八科接管的霍口场，作为劳改场所，由于战备紧张，不久就撤离转移了。

当时，场部门场长、赵书记下工区时常都佩枪。我们工区也配有步枪。场里组织有民兵连，还派骨干参加霍口公社的民兵排长培训，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用的都是真货。

我们徐重工区地处山腰，视野开阔，几百米外的山间小道、溪谷、稻田看得清清楚楚。那时风传夜里溪边有“敌情”：有人看到红色信号弹升空，有人看到手电筒一闪一闪的……



总之，形势紧张，周边有异常活动。于是，我们开始了夜里值班。两人一组（尽量做到男女搭档），每组值两小时，晚上第一班10点开始到12点，往下类推直到黎明。地点是二座的护栏角。开始几个月，

每个人都十分认真：扛枪（没子弹），兜里揣着哨子，不能说话，睁大双眼，盯着周边的草丛、树林，特别是溪边的动向。到了下半夜“眼睛打架”，要强打精神，生怕一时迷糊贻误了战机，不好交代。有时会产生幻觉，好像真看见红光闪烁有人走动，甚至还隐约听到打信号枪的啪啪声。值班的两个人常常不一致，一个说看到了，另一个说哪里有？夜里赶路经过的山民常被突然出现的扛枪年轻人吓得不轻。我们不论蚊虫叮咬，还是风霜雨露都坚持下来。

年轻人白天干活挺累，晚上睡得死死的，哪个不贪睡？要是轮到夜里值班，就早早躺下。有的还开着门睡，好让交班的走到床前，把自己推醒。

林祖渝，大家公认的“马大哈”，其实要看对什么事。轮到他值班可不马虎，交班的人到他床前，蚊帐拉开，不用叫他立马坐起来。他说自己有“生物钟”，时间一到马上醒来。

晚饭是5点左右吃的，到了半夜饿得不行。值班没有夜点，就忍着



吧，大家都是单身汉，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到了秋末冬初班地里的番薯长大了些，有人会挖出一两个。半夜三更，冷月高挂，寒风飕飕，一边啃着生地瓜一边值班。六队曾养过一只叫“沙巴嘎”的土狗，大家饥肠辘辘宰了，煮了一大脸盆。当晚吃不完，放在女生宿舍，第二天一早发现被吃得底朝天，可就是没

人承认。过后很久，才有人透露是他们几个男的后半夜趁着交班拿走狗肉给吃了。这悬案才告破，不然总是赖那几个女生，真是冤枉。

如此夜勤，大约两年时间，直到文革开始才終了。一个坏蛋没抓着，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磨练吧！这辈子虽没当过兵，但这站岗放哨咱也真真切切地干过，也算是亲力亲为吧！



扛管琐记

林有庄

1964 年底，徐重工区刚刚建立，各种设施不齐，特别是用什么作输水管犹豫不决。开始也想学农民做法：将毛竹两头锯开，捅掉中间竹节，一根一根串起来，把几里外的山泉引到食堂的大桶里。后来考虑到卫生问题，也为了从长计议，决定用自来水管。那时，交通不便，公路只修到飞竹，很多物资都要从飞竹肩挑背扛几十公里运到场里，水管自然也不例外。场里决定让我们工区派人从飞竹扛回来。时近年末，天黑得早，山区夜里冷。按计划那天水管中午前就能运达飞竹，我们走到飞竹差不多也是中午，刚好交接上，这样扛到工区顶多就是天黑而已。所以，工区主任让大家衣服少穿点，免得到时候热了累赘。吃过早饭马上出发，翻山越岭走了 4、5 小时，于中午 12 点多赶到飞竹。大伙饥肠辘辘，在路边饮食店吃了米粉。左等右等不见车来，起先年轻人蹦蹦跳跳也不觉得冷，还逛起了飞竹“京城街”……岂料，那破货车半路抛锚，修了大半天，到了下午 5、6 点水管才被运到飞竹。怎么办？山高路远，夜幕正降临，谁敢连夜赶路啊？万一出事，怎么交代？于是头头决定：在飞竹过夜。经交涉，飞竹区公所免费开了间房，里边除了稻草垫子，啥也没有。大家自觉地让身体较弱的人住进屋子，多数人留在马路上围成圈，中间烧堆柴火。刚开始感觉还挺好玩的：唱歌，聊天，嘻嘻哈哈像开篝火晚会。半夜过后，北风那

个吹呀，就差没雪花飘飘！大伙都穿着薄薄的单衣，身前被火烤得发烫，背后冻得发麻，只好不断地转身，一会儿烤前身，一会儿烤后背。有个外号叫M的，曾经因为挠痒痒，使劲挠还不止痒，再挠！“嘿嘿，干嘛啦？”回头一看，哦！原来挠到别人大腿上！从此被评为工区一号“马大哈”。那晚他衣服后背被炭火烧了个洞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猫在区公所房间里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冷得受不了就把草垫子拉着盖在身上，跟野人、乞丐似的挤在稻草堆里，蜷缩在地板上。由于衣服穿得少，被草杆子刺得身上这儿痒，那儿痒。更有甚者，时而又蹦出几只讨厌的跳蚤，咬得人一包一包的……大伙儿就这么艰难地熬到天亮。咳！那真是苦不堪言！

第二天清晨，稀粥入肚，扛管上路。身体好的，一人一根，差点两人合伙。那金属的管子，每根大约7、8米长，三、四十斤重。约莫走出二里路，便到了俗称“啼哭岭”的一片深山老林。攀爬半个多小时到顶上，然后再颠颠颠二十多分钟，颠到山脚下。刚出校门的少男少女，哪里吃过这样的苦？一路跌跌撞撞，连拖带拽的往前挣扎，女生们力气小，更是举步维艰。水管小，接触面也窄，压在肩膀上，疼得锥心。不到一小时，细皮嫩肉的学生哥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已开始抹眼泪……走在狭窄的山边水渠小道上，更是颤颤巍巍，生怕一不小心滑入沟里。遇到山坳拐弯处，几米长的管子，犹如福州话说的“舞蕉”一样，横竖过不去……千辛万苦，艰难跋涉，下午两三点终于踉踉跄跄陆续抵达工区，人几乎都散了架！工区主任“良心”发现，宣布明天休息。其实，他自己第二天也起不来了……

诗词几首忆当年

戈 宁

望 罗 溪

冷月深山万籁寂，
独有清溪声声急。
长夜难眠窗前立，
岁月青春似水离。

2010. 8. 31

当 年

孤盞青灯伴夜书，
春寒雨冷思故都。
百结乡愁何时了？
寂寞空山闻鹧鸪。

2012. 5. 24

清平乐

一一忆霍口

群山环绕，
溪畔青青草。
白沙鹅卵石翠鸟，
寂静村野真好。

当年东风浩荡，
挥汗造林垦荒。
无奈归心似箭，
作揖弃场返乡。

2020. 9. 27

相思

忧伤共睹一冷月，
孤寂同盼两地书。
谁怜少年相思苦，
独伴青灯待日出。

2012. 12. 1

中秋思乡

秋凉蝉音微，
露白黄叶飞。
浊酒三更醉，
月明魂梦归。

2015. 9. 29

卜算子

——为徐重工区女舍旁之柚树而作

屋后石阶旁，
翠影伴夜长。
又是一年春风至，
花开香四扬。

无畏苦藤侵，
笑傲天雷狂。
待到潇潇秋雨过，
金果任君尝。

2015. 6. 24

江城子

——忆上山下乡

离家农耕书渐荒，
不堪忆，数年长。
空谷幽林，
寂寞与谁谈？
呛天唤地无应答，
近癫狂，悔青肠。

风凄雨冷夜渐凉，
听东水，尤望乡。
岁月匆匆，
泪干心成殇。
待得蹒跚返故里，
人半老，鬓如霜。

2016. 9. 27

山恋

坎坷日如年，
相思松月前。
欣得鸿雁至，
心语慰愁眠。

2014. 2. 11

秋夜怀乡

江畔苇枯露成霜，
秋寒风冷菊已黄。
残月孤灯又一夜，
忽见雁行返南乡。

2008. 11. 6

春饥

空山鸟兽绝，
清江鱼虾稀。
三月黍粮少，
挖笋充肚饥。 2010. 5. 29

清平乐

——重返徐重

金秋白露，
云伴雁归路。
不忍忘却青春墓，
重返罗川旧处。

渡口竹排依故，
荒屋荆茅止步。
热血少年不再，
潺水如泣如诉！

注：余 1963 年 17 岁福二中高中毕业上山，滞留霍口油茶场达 17 年之久，历尽沧桑，于 1980 年回城。为找寻逝去的青春年华，为悼念过早离世的同窗挚友，在上山 50 周年之际，举家重返旧地。只叹息，人去楼空，茶果无踪。唯崇山依旧，岱江不息。想当年，少年意气，战天斗地，却如今田园荒芜，吾等老矣，不禁悲从心来！但愿社会进步，国泰民安，吾等牺牲换来之觉醒，亦算得有所补益。

2013. 9. 3

捕蛇记

壮 壮

一九六四年我们从临时居住的仙洋村搬到新建的徐重工区。新工区位于半山腰上，四座石砌的知青宿舍、一座食堂不规则地座落在一个山坳里。我们一队的男知青住在三座西头的几间房间里。三座宿舍屋前是靠山壁的小路，阴冷潮湿；后牆砌在高高的石基上，估计屋下是乱石堆成的填方。因此，三座不只是知青的家，也是老鼠、青蛙、蛇们的乐园，经常看到老鼠在门前沟里觅食。

某日，张亚淦在宿舍里看书，忽然听到门后有青蛙凄厉的叫声。走近看见一只小青蛙一半露在石缝外，两只小脚不停地划动。亚淦抓住青蛙头往外拽，没料想带出一条一尺多长的青蛇，小蛇死也不肯松口到嘴的美味，最后丢了性命。好几年后亚淦回忆说，他侵犯了蛇权。

大约搬到新工区的第二、三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也是在一队宿舍，黄承东、吴友信、张亚淦围在煤油灯下聊天，听见床下丁零当啷玻璃瓶响。承东在床板上拍了两下，床下响声不停。有生活经验的承东说，不是老鼠，是大家伙！就和友信拿着煤油灯往床下照，一看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蠕动。友信大叫，是蛇！吓得两人赶紧爬上床，手里的灯也灭了。承东说，脚不要落地就不要紧。亚淦忙把煤油灯点亮，三个人坐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宿舍之间在房梁处是相通的，很快，大蛇进屋的消息便传遍左邻

右舍。几个胆大的小伙子拿着扁担、木棍围在门前，为首的是陈顺和，印尼归国侨生，长得壮壮实实，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在国外与蛇打过交道，现在成了临时指挥官。他用手电筒往床下照了照，下了第一道命令：这是眼镜蛇！不要让蛇离开床下，不然它竖起来就危险了。说着让人用两三根木棍压住蛇颈部，拉住蛇尾慢慢往外移。因为受床脚羁绊，被蛇挣脱，从床板和墙角的缝隙中蹿出，引起一片混乱。幸好蛇身粗大，被卡住了。陈顺和重新部署，用木棍、扁担把蛇压在墙上，自己抓住蛇尾，一点一点往床外拉。等蛇大半个身子露出来时，他又有个更大胆的举动：用麻绳打活结，小心翼翼地套住蛇的七寸上。这样，蛇两头受制，没法折腾了。

蛇被挂在门框上，长两米多，胳膊粗。我和几个胆小的，摸了摸蛇身，冰凉冰凉的，令人毛骨悚然。大家讨论怎么处理这只蛇，有说送到动物园的，有说卖给马戏团的。工区主任赖桂贞闻讯赶来，指示说，不能让毒蛇在工区过夜，出了事谁负责？一旁的吃货早就按捺不住，剥皮、切块、下锅……不多功夫，一大盆乳白色的蛇汤便出锅了。按照“见者有份”的乡规民约，大家都分得一杯羹。蛇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柴且无味。而汤汁有鸡、鱼之鲜美，可口得很。蛇皮听说本可以卖给乐器店，但没处理好，扔了。

在罗溪的一二事

孙天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霍口场领导为了提高员工素质，改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各工区间的了解和团结，决定互派几个员工学习交流几个月，这就是所谓的派“留学生”，办“学习班”。自然，这些相互派出的留学生把在各工区的好办法好作风带回后，对全场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个别人还促成了婚姻大事。故有领导调侃道：“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1973年，场部让徐重工区主任通知我到罗溪工区报到，说另有安排。当我到了罗溪工区后，林德发主任说：“你的主要任务是为工区写写生产劳动及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出出墙报并在厨房当炊事员，附带喂头猪（食堂养了一只大肥猪）。”让我写写画画还行，叫我做饭、喂猪，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没办法，听从命令，服从安排，谁让咱是“良民”！

说到那花“八戒”，还欺生！第一次给它喂食，大概是我的动作较慢，竟然用它那长嘴巴拱了下料桶，溅了我一身泔水，一块“铁片”（海带）立马贴到我脸上，算是给我的“见面礼”！

报到之初，我到工区四周转悠，这儿青山绿水环境还不错。只是熟识的人少点。还好有个原工区嫁过来的女生，我也算是个“娘家人”，有空也聊聊天，到她家坐坐。她的宝贝儿子，红扑扑的小圆脸，外号

“小西哈努克”太可爱了！没想到几年后竟成了我辅导的“学生”。再后来，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是后话。罗溪工区人并不多，但都挺好。

工区种植管理的油茶林面积很大，有两、三千亩。在油茶果成熟采摘前，必须将班地的杂草锄尽。为把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成果收到手，场部调配劳力，让罗汉洋工区的几十号员工来到罗溪工区帮助。我这个初来乍到刚上任的炊事员，一下子应付这么多人吃饭，心里还真没底，我就请教这位师傅——我的前任：米量多少？水放多少？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把饭煮糊了或是做成夹生饭。在工区好心人的帮助下，每天午饭总算能按时备好，不然让这些“前胸贴后背”收工回来的人吃不上饭，是多大的失职！不被骂死，我自己也无地自容啊！菜，我不用担心，他们在出工时，已经把中午吃的什么咸带鱼、甜萝卜、豆腐干，还有卤鸭块等等都带来了，这让我省了很多心。每天吃午饭时我都暗暗观察，看到他们吃得正香，我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有天傍晚，大家都在乘凉，突然猪圈里，传来“二师兄”的叫唤声，还有什么东西被拆的声音。我一听，坏了！“二师兄”的“饭”还没喂！当我匆匆忙忙提着猪料赶到猪圈时，主任林德发已经站在那里，我看他直摇头，就想这下糟了，总得挨批。但他并没说什么，只是轻轻说了句：“快把猪料喂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整理被猪搞得乱七八糟的猪圈。我迅速地将猪料倒进槽里，这家伙狼吞虎咽一转眼功夫吃个精光。从此，我再不敢怠慢，每日三餐准时喂食，几个月后，“二师兄”已长得肥头大耳，走不动了。

时光荏苒，转眼过了近五十年。虽然在罗溪工区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书呆子在那儿当伙夫、当猪倌的经历总是久久不忘。有时回想起来还会笑出声来。借此，我要对给了我很多帮助的罗溪好心人，特别是我们“徐重的女儿”、罗溪的“媳妇”表示衷心的感谢！



火的考验

罗 文

那年我十七岁。记得那天下午出工，是要烧“火烧土”给苗木施肥。队长老王是位有经验的老职工，他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把干草堆起来，把山坡上表层颜色深点的有肥力的土连草根一起铲下，一层层盖在草堆上，点着火，让它慢慢烧上一两天，就成很好的肥料了。大家学着干，大约一小时功夫，两堆“火烧土”已燃起了袅袅烟雾，工作进展顺利，队长看了挺满意的。可是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负责的那堆怎么也烧不起来。我想肯定是这堆里的草不够干，或是土搁太多了。于是，我们又抱来了一大垛干草，添到堆里。我划了一根火柴，哈，火“噌”地一下子着了起来，我们高兴地再往上加草，添土。不料，一阵山风刮来，卷走了带着火苗的一把茅草，边上是几天前除过草的林地，忽地燃起了一片大火！慌乱中，我一边叫喊着：“火烧山啦！”“快救火啊！”一边举着锄头冲了上去……山区傍晚风大，借着风势，火越烧越大，风也越刮越猛，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我边用脚踩，边挥舞锄头，几个伙伴也迅速加入灭火。可是，腾空而起的两、三米高的烈火根本压不下去，反而越扑越旺，烟熏火燎得直流眼泪鼻涕，眉毛、头发什么时候烧了都不知道。“喂，你们快下来！”忽然听到队长叫声。大家气喘吁吁停下，“这样救不了火，还会出人命的！”他说：要辨风向，扑灭山火不能正面迎着风，要顺向跟着扑打。另外还

要看山势看火势，要是山高坡陡，山火上蹿的速度很快，人工灭火的速度超不了它。我们只能选择在适宜的地方开劈防火道，隔断山火的蔓延。你们注意安全，跟着我，看我怎么搞。小李，你快去场里报告，多叫些人来，这几个怎么够？队长说罢，小李奔下山，搬救兵去了。

熊熊烈火还在燃烧，队长告诉我锄头不好使，要用松枝打。就近，他用砍刀劈下手臂粗的几根松枝，现场教我们“一按二压三拖擦”，按压住火苗，使劲拖擦，年轻人一经点拨、幡然醒悟，个个奋不顾身举着松枝冲进了火阵，一边扑打着大火，一边拼命往山上冲，烟火呛得喘不过气来，手臂被烫伤，被划破也全然不知……方法得当，虽有一定成效，但毕竟人手太少，顷刻间，大火烧了半座山！我吓得双腿发抖，心里砰砰跳，今天可闯大祸了！

大约一小时后，场领导带着大队人马杀到，其他工区的同志也涉溪赶来。大伙挥舞砍刀，劈草砍树，奋力扒开厚厚的腐枝败叶，苦战三百回合，沿着山脊打通了一条七、八米宽，百来米长的防火道……终



于制止了火魔的肆虐。

灭火结束，人人精疲力尽，个个大花脸、黑鼻孔，口干舌燥，喉咙冒烟，声音都是沙哑的。

火是扑灭了，但我心里忐忑不安，默默地垂头跟在后撤的队伍里。身边有个平时爱编顺口溜的，张口说道：“城里人造林，十事九不成，一条自来火，烧去

百亩林（福州话）！”听了，我真是无地自容啊！

不过说实话，在保护国家山林的搏斗中，大家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经受住了火的严峻考验，谁都是好样的！

事后，场里没有处分我，只说要认真总结经验，好好学习技术，我打心里记住这次深刻的教训。



难忘 1963

彭潭安

那一年，高中刚毕业，高考未发榜，
讲台上，发誓言表决心，群情激昂：
考得上大学，就让祖国挑选安排；
考不上，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那一年，落榜者众多，退缩者不少，
校园里，扯起了横幅，鼓舞着士气：
我们决不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到边疆去，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乎，有志青年，热血沸腾，纷纷响应，
告别熟悉的校园，告别亲爱的家乡，
市民们夹道欢送，犹如战士上战场，
背起简单的行囊，奔向未知的远方！

那一年，中宣部长周扬《告全国知青书》：
你们是开路先锋，是全国青年的榜样，
你们冲破“三关”来到山区、来到边疆，
(三关即：思想关、家庭关、社会关)
你们经受革命熔炉的考验，百炼成钢，
又红又专的你们将是祖国未来的栋梁……

一席话，点燃了单纯的热情，增强了扎根的信心：

我们誓作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紧在那里，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好的前途，
建设好山区就是我们最美的理想。

于是乎，胸怀着革命大志，进驻了霍口场，
我们拿过笔的手，又握紧了镰锄刀枪，
从此，命运共同体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从此，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人生的重担，
从此，知青的岁月谱写着历史的篇章……

那一年，同学们初临山区气候变化的无常，
出工后时遭大雨瓢泼，时顶似火骄阳，
身上的衣服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大伙互相鼓劲勉励，没有人洩气退场。
劳动增加了革命情谊，艰苦磨练了意志坚强。

那一年，初出茅庐，年少气盛，心红志坚，
开荒造林，披荆斩棘，奋斗在第一线，
锯齿般的干茅草，划破了稚嫩的手脸，
流血的伤口，钻心的疼痛，彻夜难眠，
次日仍挥戈振臂，咬牙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那一年，第一次经历火烧山，那是一个夜晚，
尖厉的哨声响起，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揉着惺忪的眼睛，抄起家伙就奔向火场，
没有经验的我们，奋勇扑打着火苗直到熄灭，
有人烤焦了眉毛，有人烧坏了衣角，
互相望着黑不溜秋的花脸，我们捧腹大笑！
那一年，为了不让学过的知识淡忘、荒蕪，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集体挑灯夜读，
用学校送的仪器做实验，讨论和看书，
成立了图书馆、气象站、还有科技组。
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革命干劲十足！
那一年，为了丰富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工区组织了合唱团，舞蹈队，话剧组……
劳动之余自编、自导、自演，好不热闹。
另有文学创作组，《山茶花》编辑部……
墙报上抒发革命斗志，表扬好人好事无数。
那一年，同学们互助友爱，团结得像一个人，
体力强的照顾弱的，年龄大的体谅小的，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悲同苦同欢乐。
克服了生活的艰辛，锻炼了坚实的臂膀；
经受了困难的考验，收获了革命的情感。
那一年……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一晃六十载，
从青涩的懵懂时代到如今的古稀之年，

虽经人生的坎坷，事业的奋斗和拼搏，
沉淀下来的却是难忘青春岁月，
和那定格在记忆中的一九六三！



福州，我回来了

壮壮老太婆

1978年我借调到罗源县松山围垦工地工作。1984年霍口场撤销，我想趁此往福州靠拢。一为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二是孩子户口随我，迁入福州后入学读书这大问题就解决了。遇此机会，即使重拾锄头也不可错过。于是离开工作了五、六年的围垦工地指挥部，随霍口场人员调往福州北峰。

霍口场除留在县里工作的同事外，余下70多人被平均分到北峰红旗（红庙岭）、恩顶及优山三个国营农场。每个场安排两对夫妇及其他十几二十个单身。我分配到红旗茶场，当年11月报到。跟我一起到红旗场



的还有陈大淞陈茹夫妇、高荣光郑友同夫妇及陈浩胜、陈祖铿等人。

刚到红旗场也是扛锄头干活。霍口场人对付茅草很有办法，一片荒芜的茶园被我们用劈刀锄头三下五除二没几天搞得整整齐齐有模有样，令他人佩服至极。由于五、六年没拿锄头了，干起活来我又总是全力以赴，结果搞得浑身酸痛，周末回到家，要躺床上两天才缓过来。红旗场的生产还是比较正规的。主要的生产任务往往是承包给连

江一带的农民工，我们有些同志就负责检查质量验收。陈浩胜干得不错，他很认真、严格，先在生产组工作，后来调保卫科，任副科长，负责调解、治安等工作。他连年评上先进，很得领导赏识。陈祖铿心灵手巧在场里当木工、水电工。吴圣锟等会制茶，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茶厂工作。

红旗场生活条件比霍口场好多了：交通方便，有电，成家的还有套房，我与另一个女同志一间宿舍。工区有食堂，也可以自己做饭，我与楼下的大淞夫妇搭伙。农民时常会挑些蔬菜鸡蛋之类来卖。

红旗场离福州城区约 15 公里。场部规定每半个月休息一次，大家基本上都回福州休假。一周歇一天时，头尾在福州三天，后来双休，在家可达五天。就是周末下午收工后，乘场里的货车在鼓楼下车，上班的前一天傍晚也在鼓楼搭场车返场。这样，我们每月就可以两次跟亲人团聚，也可以常常从家里带些小菜、卤品上场。

红旗场位居北郊高地，夜里站在山坡上，福州城的万家灯火映入眼帘，一时看看确是美景，久了又会心生焦虑：什么时候能调到城里工作？跟在霍口场比那是离家近多了，



了，但人心总是不满足的，哪个不期望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在家门口工作？

幸好上天眷顾，由于我在罗源围垦期间学习了会计原理，上过财会课，1985年2月我被调到红旗场与恩顶场合办的华南塑料厂做统计和出纳。该厂建在五里亭附近，我每天都能回家，能实现多年来的愿望，知足了！在此期间，工余我还参加了福州市财政局办的会计班学习。一年后拿到会计证，成了合格的财会人员。

不久，一起从霍口场来的黄而香也调到华南塑料厂当仓管员。当时原材料很紧缺，我们小厂没有指标，采购员跑很多地方还都是买高价的。我得知后就到我二姐工作的外贸包装公司，买了几次“地下料”（散落在地上的原料），解决了厂里的燃眉之急。在塑料厂一年时间后，我又调到工贸纸箱厂当会计。在纸箱厂工作中发现仓库出仓手续不全，有漏洞，我审核后挽回不少损失。厂领导为此发给500元奖励（当时月工资才98元）。在厂里短短七年半时间，每年都有加工资。1993年9月我退休。

跟我同去红旗场的陈大淞、高荣光、郑友同、陈茹等人后来也陆续从场里调到市区农垦局所属的茶厂、蜡烛厂或乳品厂等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原罗溪工区的许绍宽打牌归来，走夜路不慎掉入山区小水库，酿成悲剧，时年不到50.....

其余人员均在场里工作到退休才回到市区。

恩顶农场有茶园数千亩，调到那里的王健生无师自通，干起销售得心应手。第一次跑展销会，17天就卖了50几担茶叶。还把参会的青岛市几个大厂供销员请到恩顶农场参观。他们很满意恩顶的茶叶，

当场买下 100 多担，还签下 3 年合同。健生就此帮助场里把积压的二百多担茶叶销售一空，为恩顶农场解决了一大难题。

林海、翁爱诚、程瑜端后来调市农垦局工作。爱诚在生产科，他曾到广东深圳为市农垦系统推销各种产品。人如其名，他爱党敬业、忠诚奉献，1986 年终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蜡烛厂任厂长，后调茶厂工作，埋头苦干直到退休。

在霍口场经历了 21 年艰苦岁月之后，又转场北峰，大多数人一直工作在农垦一线。这辈子我们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山区。有人耻笑我们傻，也有人评价我们是最勤奋、最辛劳的一代人。我只能说，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无法掌控自己。在共和国前进的航船上，只有同心同德，迎着风浪拼搏，才能到达彼岸。聊以慰藉的是，落叶归根，最终都回到了梦里的故乡。虽然退休金不多，但也和我们曾经羡慕的工矿企业千千万万退休职工们不相上下。

“七溜八溜莫离福州”。福州，这生我养我的故乡，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能在故土阖家团圆、安度幸福晚年，此生足矣！

从霍口到三尺讲台

高士中

“6391”，对于我们这批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是特殊的、终生难忘的一组数字。

1963年9月1日，不满17岁的我，提着一个小箱子，带着初中毕业在家无所事事的堂侄学平，走出了高家老宅。

“你们是新时代的红军，将来国家需要的人才都从你们中间选拔”……省市领导的话深深地刻在我天真幼稚的大脑里。上山头几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精神亢奋，无私无畏！记得曾和几个“激进”的朋友一起给省市领导写信，说：我们要到更艰苦的新疆去，到北大荒去，霍口场不够苦……

真是学生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饭前高歌，工余闊论，“革命热潮”差不多维持了两年多。文革开始后，霍口场也跟外边一样生产停滞，内斗不断。十年内乱，加上挂在空中的“后期处理”，让霍口场举步维艰，人心惶惶。随着年龄的增大，随着一拨一拨人调动离开，留在场里的“30边”们开始躁动不安。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托关系，找后门”，渴望早日逃离这“鬼地方”。我该怎么办呢？夫人有庄早于65年被调到了宁化兵工厂，孩子在福州、宁化两地间跑，小学都快毕业了。这样长久的分居何时是个头？可是因为家庭及社会关系等等原因，上调似乎跟我无关。纵

然上山以来“一颗红心跟党走”，服从分配听从指挥，从不吝惜过体力，从不畏惧困难，从生产小队长到工区主任，任劳任怨，也得了不少“先进工作者”“学习积极分子”之类牌牌，就是在文革最乱时刻，也自觉自愿地坚持出工劳作，不敢擅离职守。可是“上调”依然是望眼欲穿的白日大梦……这样下去，前程渺茫，团圆无望，该如何是好啊！惆怅、彷徨、悲伤、焦虑，挤满了胸腔……出于排遣积郁，也为消磨时光，在工余便拿起上山时带来的英语词典等书籍，翻翻看看，背些单词，句子。不记得过了多少时间，兵工厂的子弟学校因为要开英语课缺老师，校长找到有庄（她在厂子弟学校代课）说，希望能调我去。得到这个消息，我既意外又兴奋，但也难免担心。毕竟只是高中时期学了点皮毛，也不是学得很好，真要调去上课教不好怎么下台？从此，我有意识地抓紧时间学习英语。霍口场喧闹的牌局我从不沾边，木床是我的书桌，肥皂箱就是椅子，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寂静之夜。我珍惜每一天宝贵的业余时间，读书学习。还用纸条钉了个小本子，写上新学的单词和句子，随身携带，有空闲就拿出来看看念念。那时手边没什么英语书籍，我托人买了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慢慢学，慢慢啃。不敢虚度，不敢松懈，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做好了准备，机会才会邂逅你……

据说后来兵工厂调走了我的档案，可惜两三年时间过去了竟没有下文。事后知道内情的朋友告之，是上级主管国防工办卡了。原因还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1978年，我得知福州教育系统缺

英语和体育教师，经人介绍赶到市教育局。他们给了我一张介绍信，让我去福州师范学校找一个当时较有名望的英语组负责人（名字已忘）面试。大概是当时福州太缺英语老师了吧，他让我读了读手边的英文资料，然后又用英语跟我交谈了一会儿。一小时不到，便在公文纸上手书：“可胜任初中英语教学”。凭着这条子，市教育局让我在七中与洪塘中学间任选一个。我想离家相对近些，就选了七中。在七中，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课，就挤时间自学或到逸仙夜校恶补。这样的代课经历前后大约有两个学期。霍口场也不想回去，反正豁出去了……可惜，我们是归属农口，无法跳到教育系统，他们只是把我当“沙袋”临时堵堵缺口，此事无果而终。不过，这也为我后来在师大附小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教学基础，算是实习吧。八十年代初，改革浪潮席卷祖国大地，师大附小也在搜寻英语教师，校领导听说我已在福七中代课，就到我家游说，说福州市教育局调不来，我们师大可以调。我说七中把下学期的课都给我排了，怎么好不去？附小的书记动情地说：“还是去我们那儿吧，市教育局又调不来，拖着有什么意思？”那时，兵工厂为解决夫妻长期分居问题，答应有庄说：“爱人调不来，你就调过去。”此时我的关系还在霍口场，我总不能让她再回霍口场吧，所以最终同意调去师大附小，1980年10月师大人事处下了调令。至此，我才真正结束了17年霍口场“修地球”的艰苦生涯，34岁时走上了三尺讲台（我调入附小半年后，有庄也顺利调入省体工队，结束了我们婚后长达12年的分居生活）。这里还要插件事：福州市劳动局当时出台了一条政策：凡是外地国营农

场职工调入福州市其他单位的，必须把编制从“国营”改为“集体”，而且还是我们“自愿”的，否则不给办户口迁移等等手续。这是什么条条框框啊？无奈，为了回福州，“生羊肉”也得咽下去！只好同意转“集体”。可师大附小是国家事业单位，哪有什么集体编制的教师？于是，师大人事处跟附中的校办光仪厂（集体所有制）商量，把我的关系挂在光仪厂。人在附小上班，工资每月到工厂领（光仪厂的班我一天都没上，钱是师大转过去的），这样大约有近一年时间。后来，我在福州师范学校考过“两学”（心理学，教育学），取得了教师资格证。1981年师大人事处经有关部门批准把我从集体所有制编制的职工，转为正式的国家干部编制，从此再也不用每月跑到附中的光仪厂去领工资了。1986年我又加入了高等教育自考大军，边上班边读书，每晚都在12点后上床，12门课程，两年多考完，获教育专业大专文凭。

霍口场出来的人，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自然我也不例外。在附小工作26年，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从校英语教研组组长到市英语中心教研组成员，再到教材编辑组成员，我都恪守职责，努力工作，得到了同行及学生、家长们的好评，其间还入了党。85年第一届教师节我和老父亲（他当时已平反，恢复了离休待遇）双双被评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一家子照片还荣幸地上了《福建日报》头版。后来听说兵工厂里不少工人师傅看到报纸，埋怨上边没把我调去。自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去了宁化，说不定现在还“在异乡为异客”！2006年底，60岁的我在教师岗位上退休，结束了

从霍口场到师大附小 44 年漫长的工作历程。回顾这一生虽然命运多舛，坎坷跌宕，但也丰富多彩，趣味无穷！现在想想，恰如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诗里写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我们村的福州知青

万宜钦

据父母说，在我出生那年，老家仙洋村来了一批又一批福州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上百人。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不久，村里才刚刚恢复了一些元气。年轻的、充满朝气的福州知识青年到了村里，像一股激流荡涤着大山深处古老又沉寂的山村。

那是一个艰辛的年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们结队在村里举办篝火晚会，跳着村里的人们千百年来没有见过的舞蹈，唱着村里的人们千百年来没有听过的歌曲。

村里的人们充满热情地注视着他们，不断地讲述着他们的新鲜事。



平静之后，知青们也像村民一样，扛起开山铁锄，拎着锋利的柴刀，走进深山。在荒山野岭，他们硬是开辟出一片又一片的果园、茶园、油茶园，一片又一片的用材林……每到收获季节，一批又一批的劳动果实，不断地被运到城里。祖祖辈辈在大山里耕种的村民们看到这一切都赞叹不已。

从热闹的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山村，伴随他们的是艰难、苦涩、辛劳、眼泪和汗水。然而知青们坚毅、忍耐、百折不挠，面对困难时，如同我的父辈一样，从不退缩，生活如入锻造熔炉，人生如同脱胎换骨。

我三、四岁时，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记忆。

我们家居住的老房子，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在老屋的主座右侧，有一座与主座一样规模宏大的三层木质横楼，几百年来与主座老房子一起，营造着老屋风水。老房子里居住着近二十户人家，我的堂伯父就住在横楼的二楼上。

我的堂伯父是一个瘸脚老人，在他家经常会看到一个高个子的知青，每当知青来到家里，堂伯父就像接待贵客一样，迈着瘸着的脚步，忙前忙后。黝黑的满是皱褶的脸上，一下子会舒展开来。而这高个子的知青，在他家里就像一个久别归来的游子，静静地喝着杯里的茶水，尽情地享受着他的闲暇时光。他偶尔会摆弄一下手里的小盒子。老房子里一群小孩子早已不在意堂伯父在做什么吃的，个个瞪着眼睛，好奇地盯着高个子知青手里那会发出声音的神奇的小盒子。

在相邻的另一座老房子里，也经常会来一个知青，他看起来比其

他知青大一些，浓眉大眼，满脸胡子，神情严肃，我特别害怕他。他经常教一些比我大的小孩子，读着一本红色书皮的小书。但他老是吓唬我，记得有一次我被吓得提着开裆裤，跑了很远很远……从此以后，看见他来了，我只是远远地躲着，偷偷地看着。

可我也有“朋友”，他是一个和气可亲的知青，每次来到我们的



老房子，他总会给我带来一个或两个毛主席像章。我每次都像得到宝贝一样，看了又看，然后收集起来，装进小铁盒，藏在我与父母同住的幽暗的木屋的柜子里，那个隐秘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知青拿着从城里带来的一枝锃亮的打鸟汽枪，后面跟随着村里的二十多个小孩子，他站在高大的树下，对着树梢打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打中小鸟。人群中我的哥哥看着有点急了，说：“让我来打好吗？”知青说：“你会吗？”“我试试。”当时我的哥哥10岁左右，我哥哥一瞄准，一枪就中，过了一会儿接着一枪又中了，知

青服了。后来，常常看到我的哥哥拿着汽枪走在前头，知青带着一群小孩子跟随后面，到村头、村边树林里寻找小鸟去了。

我的两个姐姐，比知青稍小几岁。我常常跟着姐姐来到知青屋，在屋外的窗台边，伸长脖子看着女知青们教村里的一群女孩子学跳舞、学唱歌。《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你》《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优美动听的歌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流淌、回响。我遐想着：这群人从山外走来，山的那边一定是一个开满鲜花的世界。

童年时光尽管清贫，但也过得飞快。在父母和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终于走出了大山，到外乡读中学。临走的那天，沉默寡言的父亲，眼里似乎多了一丝亮光。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省城福州的一个学校，村里知青的往事在脑海里渐行渐远。

多年以后，回到村里，偏僻的山村已沧桑巨变，知青屋已人去楼空。我一遍又一遍地徘徊在知青屋前，久久不愿离去，我尽情地追寻



着他们遗落的歌声和远去的身影……

到城里参加工作后，逐渐了解到一批批知青早已进入城里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工作，他们都是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和骨干分子，有不少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上了企业的老板，有的还成为了专家、学者。

如今，自己已近退休年龄，福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村里，也已走过六十年光阴。蓦然回首，恍然如梦。偶尔再遇见他们，叫一声大哥，叫一声大姐，心中充满无限的怀念、感慨和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

是啊，在我的心中，福州知青是一首温婉而又壮美的歌曲，像泱泱的岱江水，永不停息地流淌、吟唱；福州知青是一座博大而挺拔的丰碑，像苍苍的牛姆山，永远耸立于群山之巅。

（作者系霍口乡仙洋村乡贤）



词二首

章 影

—

浪 淘 沙

记 1993 年 2 月 28 日与霍口油茶场知青西湖聚会

云气漫湖滨，
柳色重新。
映书楼上聚朋群，
谈古论今天海阔，
无限欢欣。

廿载断音讯，
不断情真。
今朝相会倍相亲，
万种离愁难细说，
黯黯伤神。

二

金 缕 曲

赠原霍口油茶场知青

辞别芙蓉浦，
正青春，雄姿英发，才情丰蔚。
广阔天地忠心炼，历尽寒霜困苦。
终不见，花红柳绿，
理想何时能实现？枉教人望断青云路。
空叹息，恨迟误。

年华似水惊匆促，
已鹅黄，粉金渐退，忽逢晴煦。
紫姹红嫣重争俏，各领风骚如许。
今只望，良机恰遇，
更得那东君眷顾，九霄降下甘霖雨，
滋润这，晚香玉。

《岁月如歌》节选

翁爱诚

站在探索社会进步改革最前沿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大多是悲壮的，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但大多数人只能成为社会进步正确道路的垫基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现实生活往往不能给他们适当的补偿。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哲人，但可以像哲人一样思考，面对共和国成长的历程，我们释然，面对前辈和后来者我们坦然。

2008. 9. 1





知青林碑文

历史的误会，让三百多位福州知青雁聚在霍口场，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六十年来，场运多舛，一九八四年农场停办，二〇〇五年场部毁于大火，如今又沉于湖底。几乎二十年一骤变，岂非天意？历经火水的洗礼，霍口场永远消逝。感怀触绪，长歌当哭。愿我们青春的虬根深植于这片沃土，让生命的末梢向着广袤的天空无尽延伸，闻听八达外，长留天地间！

原福州市霍口油茶场全体知青

二〇二三年植树节立

碑文点评

林 涵

以场运问天，天不我存也，是为悲；

逾稀老儿，逆天而行，植林勒石，尚希冀根扎沃土与天地同在，
是为壮；

场亡人去，究其因缘，一言以蔽之：“历史误会”！是为奇；

既为林记，通篇无一“林”字，而寓意尽在其中，是为妙。

悲壮奇妙四字尽占，可曰“嘉”文！





知青之家碑文

公元一九六三年，福州知青三百余人，别亲离乡，汇聚于霍口油茶场，开全省知青集体上山下乡之先河。

仙洋村是霍口场许多知青落脚的第一站。知青以场为家、与农为友，朝荷铁锄进荒岭，晚看月落听鸟啼。春风秋雨、酷暑严寒、含辛茹苦、如入炉锤！一体同心，筚路褴褛，历经二十有一载矣。百亩茶叶，千亩油茶、万亩林木，留下知青血汗硕果；百丈输电，碧海围垦，亦有知青参与之功！一九八四年霍口油茶场停办，现因国家水利建设需要，霍口场场部永远沉于水底。然知青之青春壮志已化作罗川彤云，

偕天风以浩荡；沸腾之热血已融入岱江碧水，吞海日而苍茫！

昔日春秋鼎盛，今已须发皓然，知青情愫，感喟绵念；幸蒙仙洋乡亲厚爱，辟屋为我纪念。桑梓之情，没齿难忘！时值知青上山六十周年，特于知青屋前立碑为记！

原福州市霍口油茶场全体知青

二〇二三年 立



知青之家展厅前言

六十年前，霍口油茶场福州上山下乡的知青分两批共百余人先后到仙洋村落脚，为时一年有余，随着各工区宿舍等条件的完善，除留下部分人员外，大多数人陆续搬离了仙洋村。

接触社会，认识农村，了解农民是从仙洋村开始的；蹉跎岁月，艰苦奋斗，脱胎换骨，也是从仙洋村起步的。仙洋成为深深打在我们身上难以褪色的烙印。

从一九六三年上山到一九八四年农场撤销，知青们在霍口山区度过了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几、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从青葱少年到人过而立，此间的期待、彷徨、焦虑只有亲历者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风雨过后见彩虹。霍口场的知青和全国千千万万的同命运者一样，筚路褴褛，经过血与火的历练，终于都走过来了。现在，留给我们的难以释怀的“知青情结”。

时光荏苒，转瞬一甲子。当年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耄耋之年。霍口场也即将因水库建设而消失。感恩仙洋村的领导、乡亲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房间以辟作展厅，让我们留住过往，留住乡愁。霍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仙洋是我们在深山里的第一处家。

展厅展示着我们当年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书籍、历史照片及知青们自己编写出版的回忆录《山茶花》，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们的真实生活与精神风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谨以此展献给仙洋村的父老乡亲及为建设山区砥砺前行、奉献青春热血乃至宝贵生命的一代人。

奔腾不息岱江水，群英辈出霍口人。

祝仙洋日新，愿祖国昌盛！

原霍口油茶场全体知青

二〇二三年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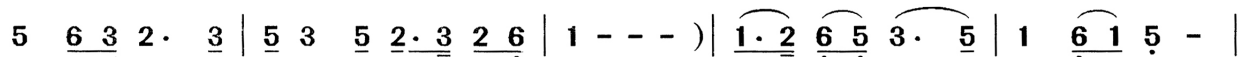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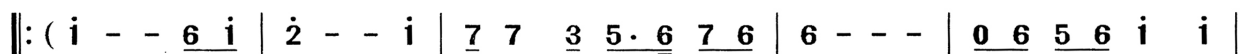
山茶花，藏在知青心里的花

1 = F $\frac{4}{4}$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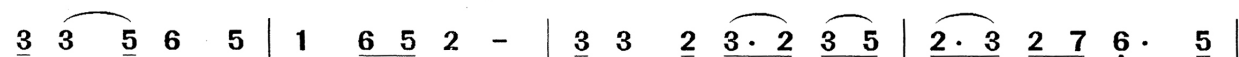
女声独唱

词 曲：刘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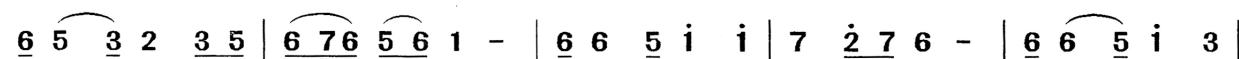
♩ = 100 稍慢，真挚、深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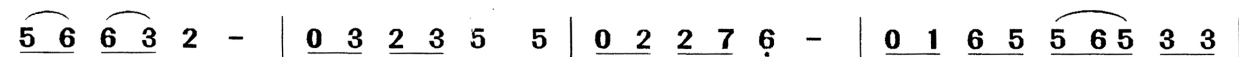
山 茶 花 山 茶 花
山 茶 花 山 茶 花
山 茶 花 山 茶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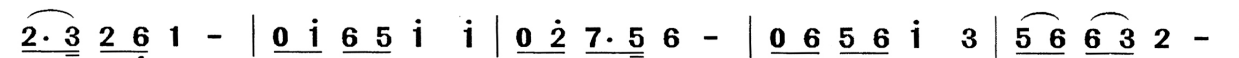
开 在 霍 口 班 田 的 花 洁 白 的 花 瓣 嫩 绿 的 芽 把
开 在 知 青 心 头 的 花 不 畏 严 寒 不 惧 酷 暑
藏 在 知 青 心 里 的 花 每 当 梦 中 遇 见 了 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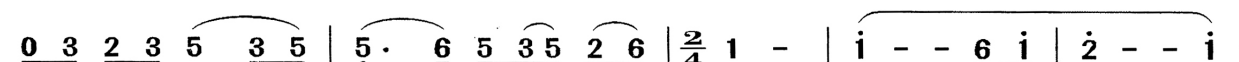
班 田 装 扮 的 美 如 画 育 茶 是 一 群 城 里 的 孩 他 们 都 是
顽 强 的 生 命 把 根 扎 育 花 是 一 群 城 里 的 孩 他 们 都 是
就 像 回 到 了 山 里 的 家 多 少 年 沧 桑 巨 变 而 今 难 觅



知 青 娃 一 瓢 瓢 清 泉 一 筐 筐 肥 一 担 担 黑 泥 把
知 青 娃 一 年 年 风 雨 一 载 载 过 一 片 片 茶 林
山 茶 花 一 次 次 返 场 一 回 回 空 一 阵 阵 心 酸



茶 苗 插 嘿 啦 啦 啦 嘿 啦 啦 啦 知 青 的 汗 水 没 白 流
瓢 芳 华 嘿 啦 啦 啦 嘿 啦 啦 啦 丰 收 的 喜 悦 把 歌 唱
如 针 扎 嘿 啦 啦 啦 嘿 啦 啦 啦 青 春 不 再 岁 月 流 沙



长 大 的 茶 树 开 满 鲜 花 啊
知 青 的 心 里 乐 开 了 花 啊
但 愿 山 茶 花 也 有 她 的 家 啊

7 7 0 3 5 5 6 7 | 6 - - - | 0 6 5 6 i 6 i | 5 6 5 3 2 - |
 美 丽 的 山 茶 花 金 色 的 茶 果 儿 压 树 桠
 可 爱 的 山 茶 花 你 硕 果 累 累 香 飘 四 野
 心 中 的 山 茶 花 如 今 只 有 梦 里 见 到 她

0 3 2 3 5 3 5 | 5 - - 6 | 5 3 5 2·3 2 6 | 1 - - - :|| 6·6 6 3 5 6 i |
 滴 滴 香 油 贡 献 国 家
 致 富 乡 村 誉 满 天 下
 只 有 梦 里 能 够 见 到 她 梦 里 才 能 见 到

i - - - ||

她



后 记

迎着兔年和煦的春风，霍口场的《山茶花》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面世了。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山茶花》是一首献给霍口场的青春之歌，它忠实记载了一群知青忘我奉献、艰苦创业的心路历程；同时它又是供奉在霍口场祭坛上一束洁白的鲜花。它寄托着我们的痛苦、心酸、哀思和深深的怀念！霍口水库的蓄水正在一天天淹没场部、工区，我们辛勤耕耘的茶山林地都将变成鱼虾游弋的乐园。不久，霍口场将彻底消失在高峡平湖之中。

六十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我们却是漫长的一生。而在霍口场的知青岁月则是我们这些亲历者最为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

霍口场已消失，我们这一代也将离开世界。但《山茶花》作为文物将有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愿我们的后人在闲暇之余能有兴趣翻开这本沉重的回忆录，能了解在那不可复制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里这群年轻人的特殊经历。

光明取代黑暗，文明战胜愚昧。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在社会进步、变革的大道上需要无数的铺路石，我们正是这小小的石头。

鲁迅先生说：“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让后人去评判我们这些从坎坷岁月里走出来的一代人吧！为了国家，我们问心无愧！

《山茶花》编委会

附件：

原福州霍口油茶场知青上山六十周年活动捐款名单

10000 元：

游德馨携夫人吴兰金

孙朝和携夫人陈国英

林孔森携夫人林木贞

5000 元：

许如基、顾同清、黄 听

3000 元：

王石宁、王孝培、文 久、孙攸生、杨典炜、邹海秋、陈浩胜、
林月婵、林敬铨、赵庆森、荣凯中、柳珍妮、黄雅贞、龚月英、
彭潭安、蒋 桢、赖桂贞

2000 元：

王一平、王金康、王祖贞、王乾利、危孝宝、刘与文、孙明沁、
何 畏、张亚淦、陈必贞、陈永健、陈明金、陈敦良、范光盛、
林 海、林 淇、林 涵、林有庄、林足展、郑君源、胡敏美、
翁天然、高士中、韩美琼、谢劫生、谢祥明

1963 元：

颜晓玲（翁爱诚遗孀）

1500 元：

吴榕生、陈宝霞、林秀珠、郑友同、高荣光、黄承东

1300 元：

蒋亨达

1000 元：

梁诗强（城关林场）、王健生、方高登、卢承国、叶启荣、刘兆驹、

刘树业 许 琛、阮家和、孙天幢、吴友信、吴明奇、张文勳、张永生、

张利清、张其木、陈 茹、陈元雄、陈行焘、林新官、欧圣流、金 琳、

郑 清、郑德麟、赵振华、钱景武、谢雅娟、魏兆清、毛祚国、郑 坤

累计捐款：190263 元